

紅會救護總隊

87

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二輯



红会救护总队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

主 编：章德华

副 主 编：朱崇演

责任编辑：黄鹤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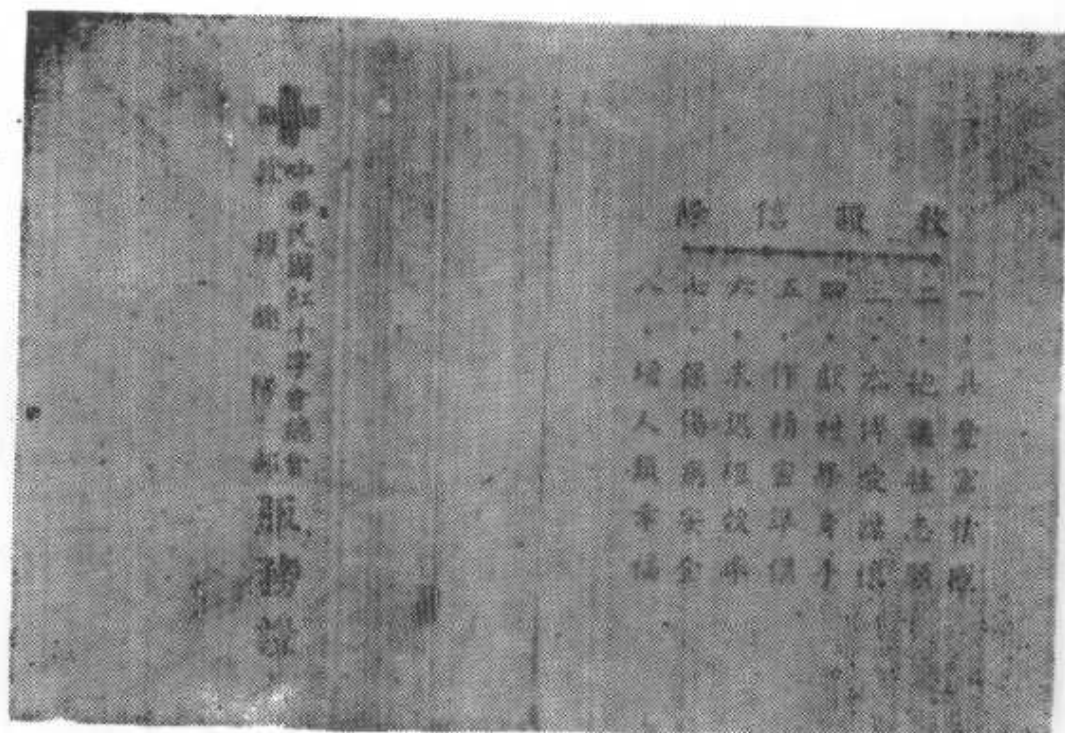
编 辑：雷启中

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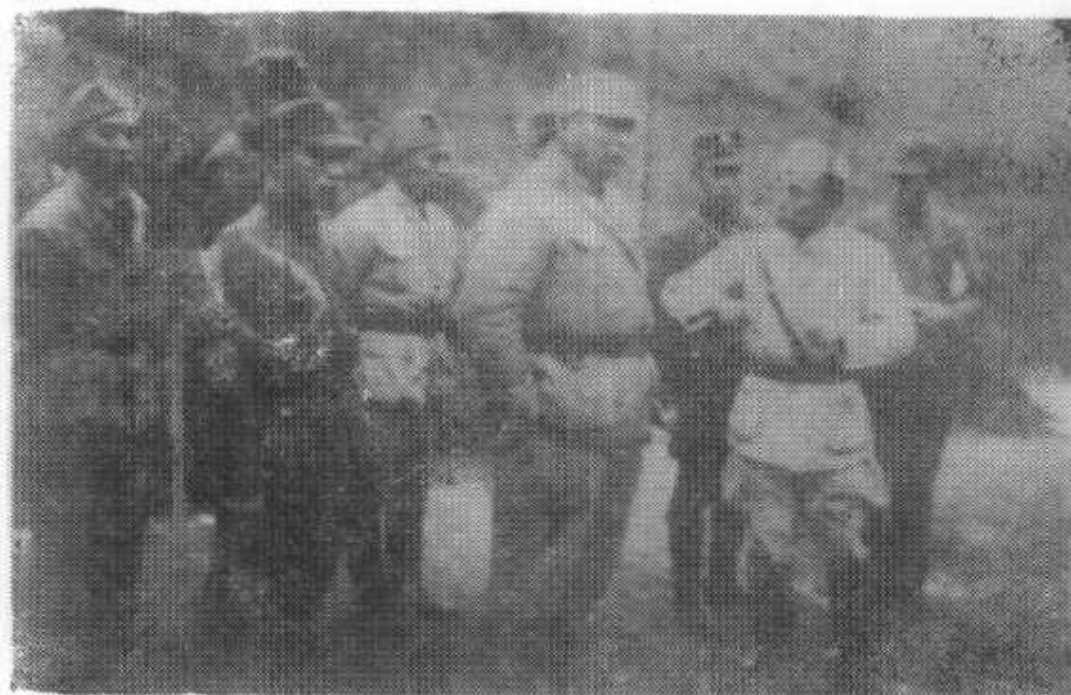
贵州省期刊登记证第086号

贵州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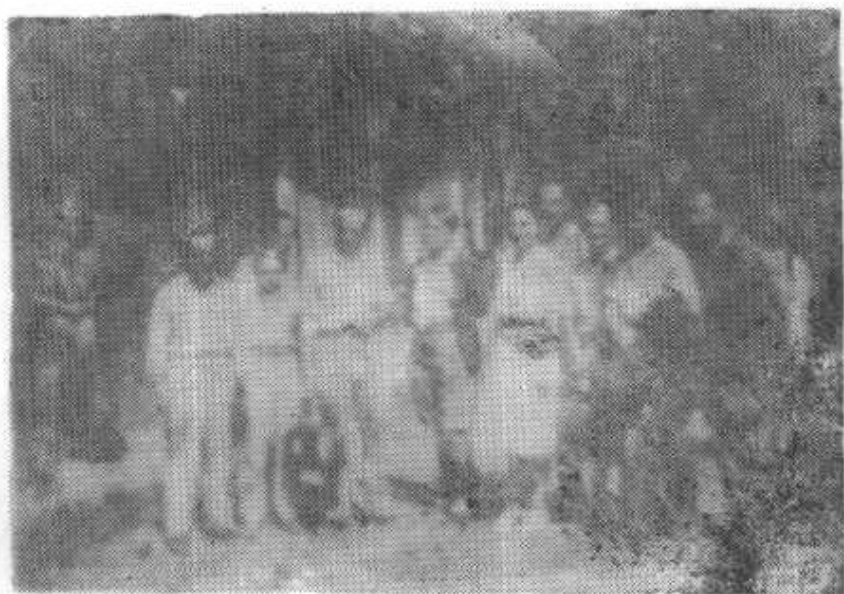
定价：1.00元



救護總隊部服務證



馮玉祥將軍(中)視察貴陽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施正信(左一)林可勝(左四)過祖元(右二)等陪同視察



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右六）与在华
外籍医生合影于图云关（1941年）



外籍援华医生在图云关红会总部山间合影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先生



林可胜总队长（前排左三）与部份工作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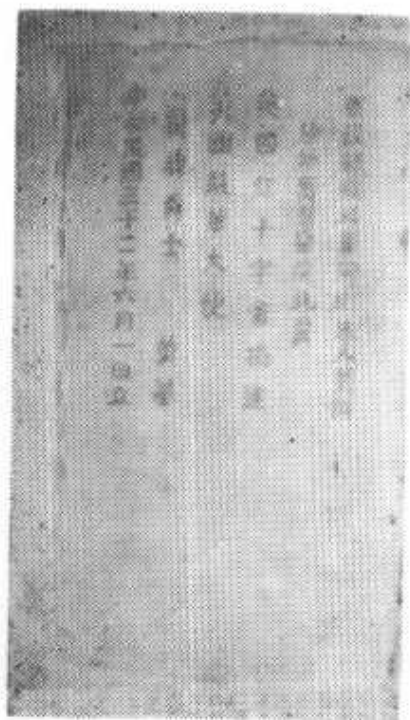


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药械材料库
职工宿舍等房屋（一九三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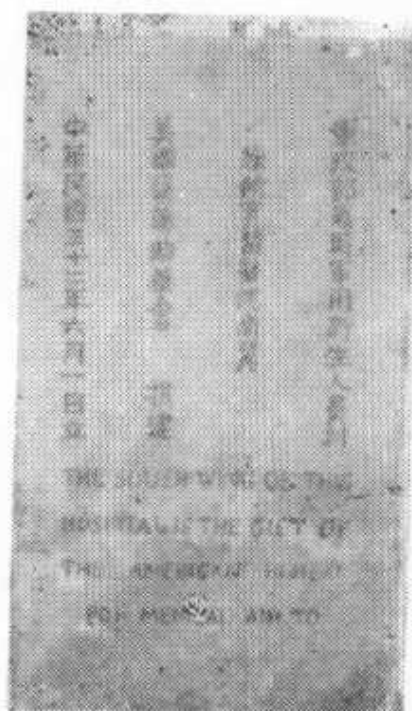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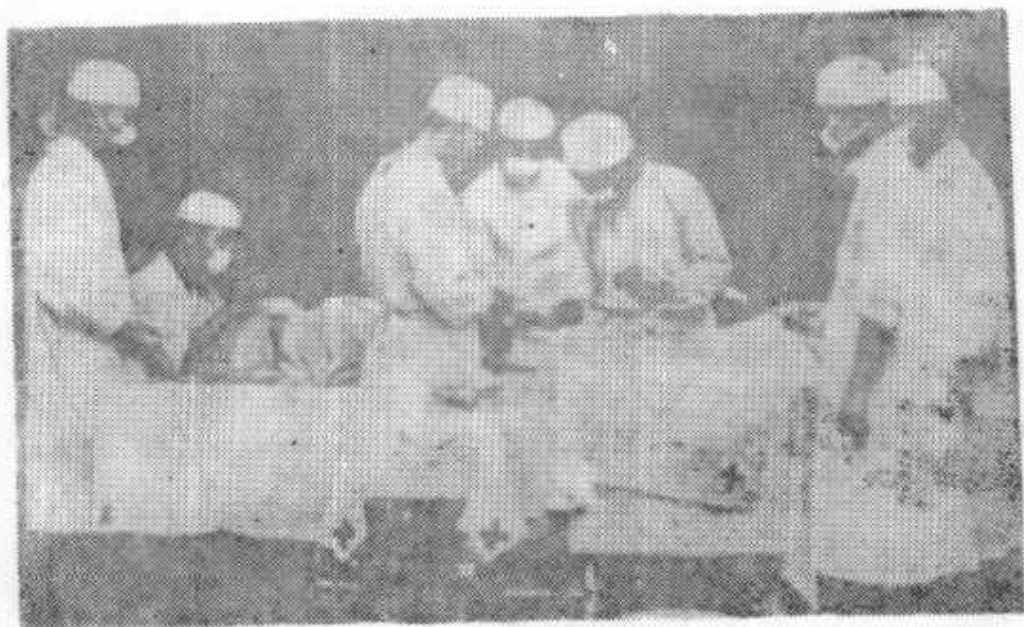
贵阳图云关上英国医生高田宜之墓

英国红十字会捐建的卫训所实习医
院奠基石（一九四三年）



美国医药助华会捐建的卫训所实习
医院奠基石（一九四三年）





1938年红会救护总队第35救护队在陕甘宁边区
做手术的情况。

35

目 录

回忆抗战时期党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	
.....郭绍兴 (3)	
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红会救护总队部.....	过祖源 (9)
抗战时期我在“红会”医疗队的一段经历.....	
.....梁钧铤 (11)	
去延安.....	姚浩然 (21)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孙 燕 (2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回忆.....	张荪芬 (26)
中国的红十字会(节译)(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	
.....声涛、柘舟译 (28)	
附录：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	(36)

* * *

在贵阳图云关的红会救护总队.....	薛庆煜 (38)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救护总队部.....	沈新路 (56)
参加红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回忆.....	林竟成 (64)
回忆图云关.....	施正信 (76)
荣独山教授谈红会救护总队.....	朱崇演 张建军 (84)
红会救护总队在贵阳.....	于怀卿 (89)
红会救护总队的组织简况.....	王化棠 (94)
在红会救护总队部的回忆.....	汪犹春 (101)
红会救护总队部的一些情况.....	余世法 (107)
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回忆.....	王春菁 (114)
我在贵阳图云关红会救护总队工作的经历.....	
.....利舜英著 施正信译 (122)	

抗战期间红十字会生活琐忆·····	陶天白(125)
救护总队部医疗队工作简介·····	王从炎(131)
红会救护工作拾遗·····	何 涛(134)

* * *

回忆我在红会医疗队的情景·····	许恩溥(139)
红会六十四医疗队情况·····	刘廷杰(142)
记六十四医疗队·····	吴宏宇(145)
我在红会救护总队的经历·····	徐 植(149)
救护工作四年·····	邓德尊(154)
红会救护总队与卫训所的培训关系·····	姚仁里(156)
救护总队卫生材料总库工作简况·····	于怀卿(160)
参加红会 X光队工作一点回忆·····	丁春华(164)
回忆贵阳陆军医院·····	杨锡寿(167)
难忘的岁月	

——记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医疗队在缅甸···汪犹春(177)

* * *

林可胜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卓越功绩·····	吕运明(187)
领导战时救护之林可胜先生·····	陈 韬(191)
回忆周寿恺主任·····	杨锡寿(199)

35

目 录

回忆抗战时期党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	
.....郭绍兴 (3)	
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红会救护总队部.....	过祖源 (9)
抗战时期我在“红会”医疗队的一段经历.....	
.....梁钧铤 (11)	
去延安.....	姚浩然 (21)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孙 燕 (23)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回忆.....	张荪芬 (26)
中国的红十字会(节译)(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著.....	
.....声涛、柘舟译 (28)	
附录：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	(36)

* * *

在贵阳图云关的红会救护总队.....	薛庆煜 (38)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救护总队部.....	沈新路 (56)
参加红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回忆.....	林竞成 (64)
回忆图云关.....	施正信 (76)
荣独山教授谈红会救护总队.....	朱崇演 张建军 (84)
红会救护总队在贵阳.....	于怀卿 (89)
红会救护总队的组织简况.....	王化棠 (94)
在红会救护总队部的回忆.....	汪犹春 (101)
红会救护总队部的一些情况.....	余世法 (107)
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回忆.....	王春菁 (114)
我在贵阳图云关红会救护总队工作的经历.....	
.....利舜英著 施正信译 (122)	

抗战期间红十字会生活琐忆·····	陶天白(125)
救护总队部医疗队工作简介·····	王从炎(131)
红会救护工作拾遗·····	何 涛(134)

* * *

回忆我在红会医疗队的情景·····	许恩溥(139)
红会六十四医疗队情况·····	刘廷杰(142)
记六十四医疗队·····	吴宏宇(145)
我在红会救护总队的经历·····	徐 植(149)
救护工作四年·····	邓德尊(154)
红会救护总队与卫训所的培训关系·····	姚仁里(156)
救护总队卫生材料总库工作简况·····	于怀卿(160)
参加红会 X光队工作一点回忆·····	丁春华(164)
回忆贵阳陆军医院·····	杨锡寿(167)
难忘的岁月	

——记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医疗队在缅甸···汪犹春(177)

* * *

林可胜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卓越功绩·····	吕运明(187)
领导战时救护之林可胜先生·····	陈 楷(191)
回忆周寿恺主任·····	杨锡寿(199)

回忆抗战时期党在中国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

郭 绍 兴

抗日战争时期，淞沪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红十字会向国内各界、海外华侨及国际上广泛呼吁援助，举办战时医疗救护事业。一九三七年夏，曾在南京办了一个收容五千伤病员的“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医院”。这个医院主要是收治由淞沪战场上输送来的伤兵。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动员全国军政医疗卫生机构中一批医护人员及一批卫生人员，参加这个医院工作。当时，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中的郭绍兴、薛宁人等几位同志也在这个医院。郭绍兴担任环境卫生股股长，在中央卫生实验处环境卫生系过祖源主任指导下进行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会将“首都医院”就地疏散，主要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随红会迁到武汉。一九三八年在湖南长沙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在长沙合办“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社会上医护人员及流亡青年，进行短期医疗救护卫生训练后，编成医护卫生队（每队二十至三十人不等），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兵及民众的工作。当时，郭绍兴任救护总队部的视导员及卫生人员训练班的教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形势下，鉴于抗战的需要，由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公开出面，与中国

红十字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队长、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主任林可胜博士（新加坡爱国华侨、生理学博士）建立关系。林赞成我党全面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我党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斗争。林可胜与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要求派人到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帮助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办事处叶剑英同志出面，介绍中共党员毛华强（又名毛维如）、冯骥（又名方纪）、黄群三同志，以非党流亡青年身份入班受训。两个月毕业后编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58队。这个队是训练班的教导队，负责辅导学员学习。毛、冯、黄三人任生活指导员，在学员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每天“朝会”时作时事讲话；课余时间举办时事座谈会；开展歌咏活动，教唱抗战救亡歌曲。

一九三八年夏，党为了加强对救护总队的领导，在我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指示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支部（以下简称红会支部），隶属于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郭绍兴任支部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领导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党交给支部任务，公开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壮大我党力量；动员医务人员积极投入抗战救护工作；组织和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药物资到解放区。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在林可胜博士的赞助和群众支持下，党支部的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不久，即发展了党员十余人，民先队员二十余人。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沦陷前，国民党中央命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及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由长沙后撤至桂林。从这时起，经徐特立同志与长沙市委决定，中共红会支

部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随救护总队部后撤。到桂林后，由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联络，在叶剑英、李涛、李克农等同志领导下，继续开展工作。

一九三九年春，救护总队部及卫生人员训练班又迁至贵阳图云关。二月，我先到达贵阳，持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吴奚如同志写的组织介绍信，按指定地址找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接上了党的关系。几天后，我把当时红会支部的党员名单交给了袁，并将过去的工作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当时，救护总队所属医疗救护卫生队已发展到六十余个，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我党华北根据地太行、太岳及延安，也派有医疗队。卫生人员训练班已完成了为救护总队培训人员和组队任务，改组为军政部、内政部联合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先后在陕西褒城（汉中地区）、福建邵武、湖北均县（老河口地区），成立三个分所。主要是轮训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和军医院的军医。这时红会支部党员已发展到二十多人，分散在湖南、桂林、救护总队运输部门、图云关总部和卫生训练总所。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袁超俊同志借口医治胃病，住进图云关红会的医院。在他主持下，秘密召开了红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后报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十字会总支委员会，郭绍兴任总支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又名章文晋）为总支委员；下分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分支部，分别由郭、高、章三位同志兼任分支书记。关于党的工作任务，会议决定：（一）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博士，在卫生人员训练所设立组织科，并由高级教官、民主爱国人士马家骥任主任，毛华强、黄群、李壬炼（又名李普）、查立平等同志任教官。在学员

中进行政治教育，课程内容是《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二）利用运输股汽车在大后方来往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红会书报供应站”，向分散在西北、西南、华中各战区的七十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主要是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的各种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及我党抗日主张，以争取群众。（三）在宣传教育基础上，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日战争前线参加救护工作，特别注意动员医务人员及输送医药物资到我党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去。（四）积极发展党员及民先队员。上述各项工作，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领导下，一直进行到一九三九年底。虽在国民党的监视、干扰和破坏下，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我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为红会大多数专家、学者、医务人员和职工普遍接受，从各方面不同程度地给我党以同情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先后动员了二十余个医疗队去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医疗、救护工作；陆续组织和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进步青年医务工作者及一些外国医生、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到我军工作；还陆续运送了大批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医药器材到我党抗日根据地。如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他们携带约十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于一九三九年冬由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部出发，由林可胜博士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名义，委派驻西北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并帮助该团经宝鸡把物品运抵西安。再由郭绍兴秘密与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伍云甫处长联系，共同与巴吉尔团长商谈，并对国民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胡宗南及兵站少将卫

生处长姚典进行周旋，做了工作，使这批医药物资在几经周折后，大部运到延安。

在上述这段时间内，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同志也在红会救护总队。一九三八年夏，她曾向中共长江局要求派党员去红会救护总队做教育工作。党派冯骥、毛华强和黄群三同志去红会，是和她的努力分不开的。武汉沦陷后，她以红会救护总队队员身份，奔波于新四军战地，救护伤员，帮助建立与健全伤兵医院。她还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药物资与捐款。在她的建议与支持下，红会救护总队派了两个医疗队去新四军战地做救护工作。

一九三九年夏，她从新四军防地到贵阳，在红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处找毛华强同志询问政治宣传情况，章宏道同志担任翻译。公开予我党以支持。史沫特莱同志热爱八路军、新四军，她在红会的这些活动，曾受到一些人的嫉恨，一九三八年底，红会救护总队在桂林时，她曾接到署名“铁血团”的恐吓信。对史沫特莱和当年在红会工作的其他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一九三九年冬，郭绍兴在党的指示下，接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委派，担任该总队第七十队队长，带队从贵阳出发，赴陕、晋、豫国民党第一、二、十三个战区做军队卫生工作。红会党总支领导工作，经袁超俊同志同意，先后由毛华强、高忻、章宏道三同志负责。

国民党对我党在贵阳图云关红会总部及卫训总所的活动早有注意，一九四〇年起，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例如：派中统女特务干扰破坏我们对红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派特务搜查红会运输股，抄走红会书报供应社发起人名单及一批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刊，当场捕走汽车

队长张世恩同志（未暴露党员身份，后经林可胜博士保释）。一九四〇年又派中统特务到卫训总所建立“政治部”，将我地下党员主持的组织科撤销。另在陕西褒城、福建邵武、湖北均县三个分所设“政治指导员”。从总所到分所，建立国民党分党部，发展国民党员，大肆进行反共宣传。他们还决定将担任政治教官的我党毛华强同志送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此时，红会总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袁超俊同志的具体领导下，鉴于形势逐渐恶化，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停止公开活动，疏散党员。具体措施是：将集中在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总部的一部分党员以总队名义，分别调到西北、华中、西南各救护队去工作；红会运输股各汽车队的一批清华大学学生党员，回到西南联合大学复学；政治面貌较“红”的卫训总所组织科的党员毛华强自行离职，秘密送往解放区工作；李壬练辞职，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查立平随组织科主任马家骥一同调往湖北卫训三分所工作。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红会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

一九四二年初，郭绍兴在西北向红会救护总队辞去第七十队队长兼视导员的职务，到重庆利用社会关系，先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和行政院卫生署工作。这时，袁超俊同志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郭与他接上了组织关系。于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根据党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由袁超俊、郭绍兴同志共同负责，对原红会党员，除党的关系早已转出或个别与党失去联系或自动脱党的外，其余坚持党的立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十二名党员，经考察后重新登记，并将名单上报到南方局组织部。至此，红会党组织完成了它在抗战时期的历史使命。

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 红会救护总队部

过祖源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理学教授林可胜辞去教职南下参加抗日，应卫生署聘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筹办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招收流亡青年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后，派赴抗日前线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工作。一九三八年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成立，并在长沙筹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后训练所搬迁祁阳，又在贵阳郊区图云关修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正式调训部队医务卫生人员。

我原在中央卫生实验院担任卫生工程组主任工程师。抗战初期，我随院由南京迁汉口，后调长沙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担任卫生工程学组主任。后又随训练所经祁阳到贵阳，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卫生工程指导员。在贵阳时，我除办理土建工程和训练学员工作外，还曾会同训练所防疫学组主任医师施正信赴西安、延安、洛阳等地区西北战线视察红十字会救护队环境卫生防疫和灭虱淋浴治疗站工作。一九四一年初，林可胜教授专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兼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长，卫生署另调朱章赓医师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长，在重庆·歌乐山修建新院，我才脱离红十字学会由贵阳调回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

一九四〇年冯玉祥将军视察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部时，我和施正信医师，随同林可胜总队长在现场介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在后方受训和前方办理救护医疗卫生工作，包括卫生防疫、环境卫生和灭虱淋浴治疗站等工作。

冯将军看了卫训所环境卫生组安排的一些野战区环境卫生设施如饮水消毒，钻空厕所，简易灭虱器等，并问了当前士兵们患些什么病，那些卫生问题比较严重？我们就根据红会派驻在野战区的医疗、护理、防疫、环卫等队送回的工作报告，向冯将军汇报了一些医生情况。当时军医院住的士兵大多是病兵多而伤兵少。病兵中最多见的是痢疾、腹泻、伤寒等肠胃传染病。它们是所谓污秽传染病，传染病的细菌污染了饮水、食物而致病。其次是斑疹伤寒，是由虱子传染的，尤其在北方气候寒冷的地方，士兵个人卫生差，衣服不常洗，身上长虱子而传播此病。谈到虱子与斑疹伤寒的事我们向冯将军介绍了虱子对历史起的作用。据西方历史的记载，十八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欧洲战争、包括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在内，不遭受这虱子与斑疹伤寒的影响的。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1918)，斑疹伤寒在东线战场十分猖獗，很长一段时间阻止了三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冯将军细听了我们讲的史实很感兴趣。所以他对红会的“灭虱、洗澡、治疗”的计划，对于简易灭虱器(木板制的、可以拆开而搬运的)的操作施用加以细致的检查和详尽的询问。过祖源在汇报驻地环境卫生方面着重说明(1)要保护饮用水源卫生，加强水质处理，改良水井和抽水设备，重视饮水消毒(2)要修建厕所妥善处理利用粪便和污水(3)要修建焚毁炉和垃圾堆放场，防止蚊蝇滋生(4)要修建灭虱淋浴治疗站，防治传染疾病，加强卫生保健。视察完毕后冯将军还

(下转20页)

抗战时期我在“红会” 医疗队的一段经历

梁钧铤

我原是上海的一名女工，“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一九三六年参加“三八”妇女节的集会中，听了关于抗日救国的演讲，使我认识到，退让改变不了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会后，我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大游行，并加入了“救国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爆发淞沪抗日战争，使我全家尝到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我们只好到难民所栖身，混一口饭吃。大约到了十月间，我和胞姐梁洁莲在上海红十字会十九救护医院当了助理护士，日夜看护从抗日前线运来的伤兵，亲眼看到很多伤员到达医院时因流血过多死在担架上。这使我认识到“救死扶伤”的意义和人活着的价值。我还听说，八路军坚持抗战，英勇杀敌，但又少医缺药，因此我很想去延安或北上抗日，为八路军服务。当时，十九医院的事务员孟燕堂向各界进步人士募捐到一批医药器材，并组织一些医务人员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医疗小组，准备去为八路军服务。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孟燕堂（领队）、马仁源医师、戴婉芝护士、谢丽华助产士、梁洁莲助理护士、梁钧铤助理护士、福奇事务员、朱文奎事务员等。

我们医疗小组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浙江宁波龙华寺，先

投奔中国红十字交通运输第一股，打算逐步往目的地前进。在此期间，我们除替上海运来的抗日将士治疗、护理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街头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股里的多数同志都自愿在每月的工资中捐出一部份钱，购买运输工具送给新四军。

同年六月，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知，要我们到湖南长沙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与内政部卫生署合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学习。七月份我们到了卫训班。郭绍兴是我们环境卫生课的教师，他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战地服务团常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地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被服厂的工人知道我们要上山西太行山为八路军服务，他们说那里很冷，我们的衣服太单薄，就精打细算给我们做制服和皮大衣。郭绍兴那时是“救护总队”的党支部书记，他暗地考察我们，决定发展梁洁莲、郭步洲和我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三人已在到长沙不久，在南区区委入了党。我们征得党的联络员同意，将我们的政治身份告诉了郭绍兴。

九月，红十字总会组织三个医疗队前往山西，郭绍兴将新发展入党的朱文奎与我们三人编在一起，组成四入党小组，组长是郭步洲。红十字总会的汽车把我们“六一医疗队”、“十三医疗队”、“驴马队”三个队的全体人员送往平汉路，乘火车去西安。我们抵达车煌店时，前面线路已被日军切断，只好折回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主任热情招待三个队人员，并派副官许光庭陪送我们返长沙，再由红会派汽车送到西安红十字会大队部。我们党小组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主任接待了我们，他将我们党的组织介

绍信交给组织科王哲然同志办理。

一九三八年冬天，党组织要我们利用大雪纷飞的有利季节，通过敌人封锁线。我们乘火车抵达河南渑池，在隆隆炮声中，越过日军封锁线，过了黄河，安全抵达恒曲八路军留守处。

我们在八路军留守处的指导下，穿过子弹乱飞的树林，走过结冰的陡坡，驴马驮着医药器材，老是滑跤，它们双蹄跪在雪地里不肯爬起来。大家怕牲口和医药器材滚下山，就用双手挽扶和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一步一步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迎着风雪爬越太行山。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们三个队抵达山西潞城。一踏进潞城境界，沿途贴满五颜六色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胜利必属中国人民！”……看见欢迎标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一个月来爬山涉水的疲劳立刻消失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唱起来：“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当我们到达八路军总司令部时，那里的同志列队欢迎，而且早就把我们的男女宿舍准备好了。吃饭的时候还为我们加了菜，我们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得饱饱的。次日，朱德总司令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既简朴又丰盛的午餐，并同我们队员合影留念。几天以后，朱总司令和康克清一道参加了招待三个队干群同台演出的文艺晚会。到达八路军司令部时，我和郭步洲还秘密地将党的组织介绍信交给了朱德同志和杨尚昆同志。朱德同志还介绍我认识了从上海来的陈若克。

我们“红会”三个队没有几天就被派到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为伤员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如：开刀剥取弹片，治疗骨折，为眼伤开刀以及其他伤残治疗、护理等等。八路

军野战医院的设备条件是很差的。给外伤伤员换药时没有金属探针，就用竹子自制探针，消毒后使用。一位伤员伸着手臂对医生说：“我被敌人弹片打伤后开过刀，但伤口老是化脓，大概还留有炸弹碎片在作怪，请再替我开一次刀，没有麻药也不碍事，我身体好，能顶住。让我早日痊愈重返前线。”医生解释说：“你的焦急心情我们理解，但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已经来了，他们的外科医生用麻醉替你开刀取出碎弹片不是更好吗？”伤病员们知道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来了都很高兴。这个医院还关心周围几十里的老百姓。我们队除在野战医院搞好治疗、护理、预防接种等工作外，还到村子里挨家进行预防接种。老乡们对八路军和医疗队也很关心和支持，腾出房子给我们住，远行时还借马给我们骑。

春节前夕，我们全队同志忙完工作后，开始赶写对联、赶画报头、赶出“六一”壁报。壁报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八路军英勇杀敌、野战医院艰苦创业、关心群众等等。并感谢朱德总司令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感谢八路军协助我们安全通过日军封锁线，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支持和关怀。这期壁报的内容，后来编印成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山西之行》，散发到西安各医疗队，帮助红十字会各队成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了解八路军和我们在野战医院工作、生活的情况。同志们还自愿拿出一些钱，买了毛巾和其他一些礼物，准备去慰问八路军伤病员。第二天是春节，清晨起来，才知下了一夜的大雪，全村变成白茫茫一片银色世界。积雪把我们的去路覆盖了，但却拦不住大家要慰问伤员的决心。我们抱着一包一捆的慰劳品，大胆地从山坡上滑雪到野战医院，慰问了伤病员，唱了慰劳歌和抗日救亡歌曲，分发了慰问品。

一九三九年的七、八月间，医疗队要返回西安红十字会大队部休整。我们几个党员爱上了八路军和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向党组织请求留下。但党组织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劝我们随队返回西安，争取更多的医疗队到敌后为八路军服务。我们党小组服从了这个决定，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

我们“六一”队返回西安后，在调整工作中，党小组的几个人分散了。朱文奎随二十三医疗队去延安；梁洁莲因患痢疾，留在大部队，后分配到别的医疗队。我和郭步洲坚决要求大队部另派医疗队到敌后为八路军服务。

一九三九年冬天，江涛声医师从德国留学回国经过香港。这时，宋庆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向国外募到一批医药器械，托江涛声护送至西安转送延安。江抵达西安后，便要求到山西五台山白求恩医院为八路军服务。于是，西北红十字会大队部大队长万福恩医师，把这方面要求去敌后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编成红十字会第四十医疗队，江涛声为队长。江是细菌学专家，他的爱人希尔达护理员是德国人。参加这个医疗队的，还有一个纪瑞德大夫，他是奥地利人、外科医师。他参加过保卫马德里战役，后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此外还有护士赵春霞、郭步洲、梁钧铤和事务员张自中等。

第四十医疗队于一九三九年冬天在八路军办事处刘民的帮助下，离开西安去五台山白求恩医院。火车沿着陇海线飞速前进，到河南渑池后，队员们一清早就背上自己的背包，开始步行向目的地迈进。夜宿破庙或牛棚，有时被牲口吃草及拉屎尿的嘈杂声音把我们扰醒，还有一阵阵的臭味扑面而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到同我们睡在一个牛棚里的纪大夫。他比我们大二十来岁，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到中国支

援抗战，吃苦耐劳，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更热爱自己的祖国，更增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我们对纪大夫也格外敬重。当我们抵达南村时，形势更紧张了，隆隆的炮声更加密集，嗖嗖的子弹在空中乱飞，路上没有行人，使人感到异常情况将要来临。医疗队匆匆离开敌人的封锁线，偷渡黄河到了对岸的桓曲。江队长带着郭步洲去八路军留守处联系，只找到一位工作人员，他着重地对江队长说：“部队已全部撤走，日军从中条山方向打过来，估计约半小时就要占领这里，我马上就要离开，你们赶快上太行山吧。”江队长跑回来向大家说明情况，恰巧碰上从延安开会回来上太行山的王兴一行人，就要我们同他们一道上山。我们连夜迎着鹅毛大雪向太行山行进，上四十里，下四十里，没有月亮，没有星光，积雪的复盖使我们看不到路。近视眼的护士赵春霞，不慎滑到了山沟里，大家爬下去把她营救上来，幸亏没有跌伤，只丢了近视眼镜，只好搀扶着她走。我们一口气走了一百二十里山路，这在我们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跑这样多的路。大家疲倦得躺在雪地里就睡着了，醒过来又继续前行。大家都说，如果再爬山，就砍一根树枝给纪大夫和希尔达当手杖。他们连忙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谢谢你们！”

江队长从王兴同志那里知道他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张立森，在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独三旅担任）《黄河日报》任编辑，江决定去找张立森，认为托他们找八路军联系去五台山更为方便。他们一见面，张就谈到独三旅有一个后方医院，有不少重伤员急需施行手术取出弹片。而他们那里的医护水平很差，做手术困难很大，如果耽误了时间，可能危及伤员生命。江队长考虑独三旅是抗日军队，红会医疗队的

任务是救死扶伤，不能见死不救啊！就答应他们的要求，讲定给伤员做完手术就走。

纪大夫听了江队长翻译后表示赞成，他还说没有手术室设备不要紧，只要搭个临时无菌的帐篷就可以开刀。我们与院方连夜用白布制成一顶大号方形蚊帐式的帐篷，将它放在蒸锅里消毒后当作手术间。纪大夫看到帐篷就高兴地翘起大姆指称赞说：“好！好！”他与江队长合作，连日替伤员开刀。同时又为他们的医护人员办了一个培训班。有时赵春霞到培训班去讲课，就叫我到手术蓬里工作，开刀时我传递器械较慢，纪大夫知道我不熟练，并不责怪，有时就自己挑选。他们查病房时，看到我们自己掏钱买藕粉，冲好后喂伤病员吃，就笑嘻嘻点点头，赞扬我们做得对。

阎锡山为了执行蒋介石积极反共的方针，发动了对山西新军的进攻。我们医疗队的住所也遭到包围。江涛声队长出面交涉，指出我们红十字会医疗队是国际性组织，任务是救死扶伤，武装包围医疗队住所是违反国际公约的，应立刻撤走。开始，围攻我们的独八旅不肯撤走，后来看到有白头发高鼻梁的纪大夫，有黄头发、蓝眼睛的希尔达外国人在医疗队里，才命令撤除包围。

张立森和《黄河日报》译电员贾根生、李俊、儿童团长王元碧，民校主任梁明夫妇脱险来到我们医疗队。与我们一起去寻找八路军，然后去五台山白求恩医院。傍晚，我们步行来到东路地区，被国民党二十七军的部队包围，把我队全体人员押到他们的军部。范汉杰军长打听到我是广东人，想利用同乡关系拉拢我，要我队不去五台山，留在二十七军的后方医院工作。我当场拒绝，并向他提出：“我们是奉红十字会大队部命令去五台山白求恩医院工作，怎能违抗命令

呢？必须立即释放我们。”他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又按四十队的意见提出：“你们不放我队去五台山，那我队坚决要求返回西安大队部。”范汉杰也没有答应。

当夜，日军轰炸了二十七军军部，军部连夜转移，我队成员也被武装押往指定地点。不几天，纪大夫患了斑疹伤寒，连日发烧不退，昏迷不醒。而我队的医药、器械又被扣押，哪里还谈得上治病，要做病号伙食也不行，真把我们急坏了。我提出，不妨利用同乡关系去见范汉杰，要求将我队的药品、器械拿出一部份使用，供给纪大夫营养伙食。范接见我时，我向他讲了纪大夫的病情和我们的要求，大概他考虑到国际友人的关系，答应了我的要求。在全队人员日夜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纪大夫的病痊愈了。四十队全体人员再一次提出返回西安红会大队部。经过一再努力，二十七军答应我队去西安了，派部队押送我们过了黄河。

我队过了黄河，路经河南白马寺。白马寺红十字会医疗队队长江兆菊见到江涛声后，要求四十队留白马寺医疗队工作。江涛声急于返西安汇报四十队被阻的情况，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只答应把赵春霞和我留下一个短时期，协助工作，向大队部请示后，再通知我俩返队。江队长回到西安，向万福恩大队长汇报途中受阻的情况后，大队长的意见是：准备扩充四十医疗队，纪大夫留大队部待命，王元碧、贾根深、李俊到褒城卫训所学习，张立森和梁明夫妇去重庆找亲戚邵力子，准江涛声假送爱人去成都华西大学图书馆工作。我和赵春霞待四十队扩充工作就绪后再行通知归队。郭步洲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刘民同志汇报四十队的详细情况，刘民对郭步洲说：“江涛声在四十队中途受阻中表现很好，你立即去成都争取他回队，仍当四十队队长，五台山未去成，还可

带队到大别山为新四军服务。”于是，郭步洲向大队请假去成都找江涛声医师。我和赵春霞得通知后于一九四〇年秋返抵西安大队部。大队长万福恩讲，四十队扩充后将往湖北老河口五战区工作。我听到这消息后，到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科找刘民汇报情况，要求上延安抗大学习，不去老河口五战区。他不同意我的要求，他说：“国民党部队正在制造磨擦，还暗中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目前形势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你随四十队去五战区，那里靠近大别山，你们可以争取江涛声带队去，为新四军伤病员服务。你即使到抗大学习后，还是会派你到白区做统战工作的。”我听这番话后，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我的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回答说：“你们这次不能自己带党的组织介绍信，路上不安全，还要改名叫梁均庭。我也改名叫刘一鸣，是伙夫身份。你们到达目的地就按这个名字写信给我，我会将你们的组织关系转过去。”按党组织指示，我到襄城等候。郭步洲到成都找到江涛声，他被华西大学聘请担任教授，他爱人也上了班。经郭步洲再三动员，他才将聘书退给华西大学，回到襄城，继续担任四十队队长，四十队扩充后，人员增至十九人，有五位医师。其中有一位是奥地利籍内科医师王道和他的爱人苏珊，他们也随队到湖北老河口五战区工作。

王道医师在郢阳后方医院工作时，认真负责，对伤病员非常热情。学起中国话来很快，为人和蔼可亲，大家与他开玩笑他从不生气。他们夫妻非常恩爱，大家仿照“玉堂春”这出戏，叫他（她）们是“王公子”和“苏三”。由于沿途行走和工作太劳累，生活条件又差，王道医师的肺结核病复发，大量吐血，住进襄阳医院治疗。后来，我们请周亚男和腾

瑞林在回乡途中去探望他，还送些钱给买营他养品吃。从那时起就没有与他见过面了。

我们四十队抵湖北老河口红十字会中队部时，中队长贝克医师听不懂中国话。我们队里方博是高中毕业生，能讲英语，经常给贝克做翻译。那时我们都是青年，要求进步心切，经常到神州书店买艾思奇和胡绳的哲学著作、斯诺的《西行漫记》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等进步书籍看。有一次我们在屋里高兴得乱蹦乱跳，闹声被贝克中队长听见，他走来问我们为啥这样高兴。方博将书名告诉他，并说作者都是进步的，他表示对斯诺的著作很熟悉。我们谈兴正浓时，突然有一群人来找贝克大夫，他非常机灵地把我们刚买来的那些书踢到床底下，不叫外人看见。

关于争取江涛声队长带队到大别山新四军的打算，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原载《贵阳党史资料》1986年13期）

（上接10页）

即席向在训学员讲话，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应用新的知识，更好地为伤病兵服务，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去延安

姚浩然

1937年秋，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我当时在总队下属的X光队负责工作。在1938年初，根据总队指示派医疗、医护队到延安协助医疗工作。当时由齐清心大队长亲自率领二个医疗队和一个医护队前往。我也和二位队员带着X光机及二台发电机随车奔赴延安。在出发前我们受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欢送，每一个赴延安的队员都精神振奋。由西安至延安的公路，因路基不坚实，路面不平坦，所以三日后才到达延安。

到达延安后，我们受到了隆重欢迎，并安排了工作。一个医疗队分在边区医院（宝塔山），另一个医疗队分在甘谷驿兵站医院，一个医护队则分在市内门诊部，二架X光机分配到二个医疗队。工作分配后，大家都很高兴，并表示一定要与当地医务人员和睦相处，密切合作，把医疗和护理工作做好。

自开展工作以后，医疗队的医师们无论手术及诊疗均能与该院医师们共同研究，悉心诊治，对病员极度负责，做出了成绩。医护队的护士们在门诊部与医师们配合，积极主动，认真负责，也得到医师们和病员们的好评。平时，卫生部的姜齐贤部长和饶部长等人经常来各队看望大家，问暖问寒，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大家深受感动。

延安的X线工作开展以后（驻边区医院），解决了诊断上的难题，提高了医疗质量，得到中央各位首长的重视和医疗单位的欢迎。当时负责边区医院X光机的队员刘筠，是山东

齐鲁医学院学生，是我队的优秀队员。他工作细心、认真负责。另一架X光机派驻在甘谷驿后方医院，负责的是于保良，他原是山东医专的学生，工作也很出色。两位队员都受到延安医务人员和病员的好评。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作为X光队西北区的负责人，经常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我四次去延安，每次逗留约一个星期左右。

在延安期间，我曾见过白求恩大夫，他当时才从国外来延安，并将转赴山西。我们对X线工作交换了意见，并谈及当时X线工作情况。印度医疗队相继来延安，我与他们之间处得很好，柯棣华大夫曾赠与我一条白色西装裤作为纪念。

在西安时，我曾介绍一位国民党后方军医院的军医至延安工作。

不久，我奉总队命令，调至贵阳总队部，从此离开了西北。

（原载《中国红十字》1984年5期）

（上接27页）

时对驻军的战士作了大量的治疗、消毒、灭虱工作。

年底我被调回到图云关的总队部。不久总队长换了胡兰生。我仍留在红十字会医务科工作。这时红十字会在贵阳市开设了一个门诊部为市民服务。第二年春节，有的队调去了印度，有的则调云南第九中队工作，我和甘杨道也到了云南。在滇西一带工作。

红十字会的医疗小队不仅协助军医，也很受老百姓的欢迎。我们每驻一个地方，当地的老百姓便闻声而来。一日之内，往往有一二十个病人来看病。

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医护卫生人员，不管是中国籍或外国籍的，都是志愿救死扶伤，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载《中国红十字》1984年5期）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孙 燕

五月的一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来了两位远方的客人。男的是位身体健壮，面孔红润的欧洲老人，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甘杨道医生。女的是位头发花白的保籍中国老太太，她是甘杨道医生的夫人张荪芬女士。

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不少以中国革命为己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如我们熟知的白求恩、柯棣华……但还有许多未见经传的国际同志，不为人们所熟悉，甘杨道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甘杨道教授是保加利亚人，他原名叫杨托·卡内蒂。1937年，甘杨道还是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青年医生，他就满怀热情地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入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1939年，在撤离西班牙的途中，甘杨道医生和他的战友不幸被反动派抓获，被关入集中营。不久，由于英国援华医学会的保释，他们才得以出狱。1939年底，甘杨道医生满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率领一支二十八人左右的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甘杨道医生回忆他们当年来中国的情景时说：“我们是从英国坐轮船，在1939年11月份到达香港的，宋庆龄同志派代表来接我们，我们要求到八路军去工作，但由于日寇的封

锁，道路不通，我们没有能去，为此，我们感到很遗憾。”

后来，甘杨道医生和他的战友被分配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甘杨道担任救护总队第三中队队长和救护总队部顾问。

在贵阳图云关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大约有二、三十个来自东欧国家的医务人员帮助工作。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些外国同志一来到中国，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了适应环境，他们抓紧时间学习汉语，他们不要求特殊待遇，只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他们和中国的医务人员一样，吃的是糙米，住的是草棚。

在我们的要求下，甘杨道教授向我们讲了当时的艰苦情况：

战时的医疗条件是非常差的，在救护总队部里设有许多医疗小组，由于医务人员很少，每个组只有一个医生。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兵，80%的人都由于回归热、疟疾、营养不良等病而死亡。尽管如此，甘杨道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而工作。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他们就开办医疗训练班进行教学。他们还训练担架兵。没有医院，他们就和军民一道，用竹子、茅草搭起了战地医院。他们还向老百姓和士兵宣传卫生知识，让他们知道，怎样灭虱，怎样进行食用水的消毒。甘杨道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忘我地工作，在他们中间也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例如，有一位罗马尼亚籍的女同志叫柯芝兰，1943年在云南昆明参加防疫工作时，染上回归热而牺牲了。

外国同志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他们的忘我精神也深深感染了中国医务人员。

作为共产党员，甘杨道医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

地联系，他和他的战友们每月向党交党费。1942年在重庆，甘杨道医生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他要求周副主席同意他到延安去，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和他交谈，劝他留下来工作。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了，甘杨道医生和他的战友们由衷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当年，甘杨道和他的战友们相继回国。

38年后的今天，甘杨道夫妇回中国探亲来了。甘杨道教授高兴地说：“我要到过去战斗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甘杨道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拿出一册照片簿给我们看，照片簿里珍藏着许多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一起工作的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真实地记载着国际主义战士们战斗的生涯。

作为年轻的中国红十字会员，请不要忘记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们！

原载《中国红十字》1983年8期

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回忆

张荪芬

1940年，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我从香港乘船去海防，转赴昆明，又从那里搭卡车，到了贵阳城南的图云关。

公路两边山坡上有一排排的草房，左边最前面的一幢门前挂着一块很长的牌子，写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当天我们就见到了总队长林可胜和其他一些负责人。我领到了一套灰色制服和一枚中国红十字会的徽章。公路右边山坡上也有很多幢草房，是运输大队的。那里有很多卡车和救护车，都是海外爱国华侨捐赠的。还有一个材料库，里面堆着大箱大包的医药器材、药品和敷料，大多数也是海外华侨和各国医药援华会捐赠的。山坡的更高处还有食堂和医务人员、职工的宿舍。

过了几个月，我被编入了第八中队作医护视导员。第八中队正在装备，马上要派到广东去开辟工作。中队长是一位波兰籍医生，还有四位医生，一位是罗马尼亚籍，三位是香港来的，他们各任一个小队长。其它还有十几位护士和卫生员。

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我们和器材药品到了广东韶关。中队部留驻韶关，四个小队分散到粤北驻军的几个野战医院去协助军医的工作。我随着一个以香港医生伊宝林为小队长的向小队向从化一带出发。我们在山林间行进，爬山涉水，有时还唱着歌，不觉疲劳。

一天，我们来到一家农民的院舍，挑夫和马夫把药箱包

裹都卸下来各自走了。原来我们已到了野战医院驻地。抬头望望，四周都是水稻田。农家的房屋很破旧，墙壁和梁柱都被烟熏得漆黑。东家指了指牛舍旁边一间有窗户有门的小屋说：“队长请住这间屋子吧！”显然那是这院落里最好的一间屋子。我和一位女护士被安置在屋顶下堆谷草的地方。我们爬着摆在那里的一条梯子上去看看，那里虽然没有门窗，比起队长那间屋子还安静宽敞得多。

我们商讨如何改善医院的工作条件，建议利用广东竹子多的条件，派人去砍竹子。过了些日子，一担担粗大的竹子砍来了，战士们自己动手劈竹子建竹房。没有很多时候，一排排宽敞简陋的竹房建起来了。一头是一大间明亮的手术室，手术台和其他设备都是用竹子作的。我们用纱布挡起了墙壁和门窗，创造了起码的消毒条件，可以进行小手术。竹房的另一头是小队人员的住宿室、敷料室和储藏室。

周围部队的战士和附近老百姓渐渐地也来找红十字医生看病了。

两三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我又转移到另一个小队去。那个小队在清远一带农村里。他们已搭起了竹房，而且开始在给病人加营养，每天上午，煮藕粉或者挂面汤给伤病员吃。

不几天我回到中队汇报工作，到了韶关，遍寻红十字会第八中队也找不到。原来这几个月中，韶关经过日寇几次空袭，房屋全烧光了。终于，我打听到了，在空袭后，中队迁到郊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在那里搭起了三间简陋的房子。

十一月初的一天，中队长波兰籍医生戈格曼和我到了乐昌的一个小队，小队是罗马尼亚籍医生柯让道，我们一起作了凉拌土豆，庆祝十月革命节。这个小队负责一个病房，同

下转22页

中国的红十字会

——《战争的影子》第一部（节译）

〔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 著

声涛、柘舟 译

原编者按《战争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War)是新西兰著名友好人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贝特兰教授的一部著作，生动地记述了他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间在远东各国的经历。一九四七年由伦敦的维克托·高兰茨出版公司出版，这家公司以最先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而震撼了世界。

这里节译的是原书第一部《中国的红十字会》的部分段落，对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活动有所帮助。适值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特刊出，供读者参考。

.....

对这些大多数来自法国的集中营①的共和战士来说，中国象征着事业，而不是避难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怎样才能到北方参加朱德的队伍？

“那是困难的。”我说。困难有多大，我是清醒地知道的。

在伦敦时，我曾受托寻找各种机会把医疗设备和医生经由苏联往延安。尽管苏联大使积极关心，寄予同情，还是没

有办成。现在，我是回来参加设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看有无办法改善南北交通。伦敦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刚刚使一些曾为西班牙共和军工作的医生从法国集中营获释，国民政府也发了签证，让他们来中国为红十字会工作。然而，将如何使用他们呢？据我所知，重庆未必会张臂欢迎这些来自西班牙的志愿人员。

.....

孙夫人极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近年来，她的主要活动是救助游击队和敌后武装，先是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继则通过同盟的后身中国福利基金会。她通过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当代伟大的大师鲁迅，在晚年时把他对人民的苦难寄予的巨大同情，传给一群慕名而来的年轻弟子一样。任何地方，只要有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存在，孙夫人的名字就脍炙人口，并为大家所爱戴。

“我们有许多工作要你去做哩！”孙夫人在我到达香港时对我说。其后，一连几个星期，我们在西摩路的办事处确实是一派忙碌景象。供应品向香港汇集已有数月，现在必须把它们分门别类，分小批运往海防，这是运往大西北的两千英里路程的第一阶段。人们已经捐献了一些卡车，其余的需要购置，作为运输这些物资之用。

“等一等”，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国书记辛西娅·廖②对我说：“看看我们的救护车之后再走！”

这是一辆使用英国底盘的特制救护车③，是约翰·桑尼克罗夫特勋爵送给孙夫人在中国使用的。根据安排，这辆车要连同满载着物资的整个卡车队，由我负责送到延安去。辛西娅和她的弟弟廖承志已为志愿前来工作的中国司机和修理工做好了一些复杂的安排，后者正在边境那边的广西省等候

我们。刚从瑞士受训到来的年轻的德国医生汉斯·米勒④、中国细菌学家彼得·江和他的德国妻子⑤正暂时休息，等待一起出发。这是我们迄今为游击队筹集到的最重要的救济车队，我们必须保证它到达目的地。

.....

七月的霍雨延缓了我们去南宁的进程。不出所料，“桑尼克罗夫特”在泥泞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南宁的伊曼纽尔教会医院盛情接待了我们。在该市，我们找到了一家汽车修理厂，砍掉了大救护车的尾部。这样一来，严重地破坏了它美丽的外观，然而，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沿着陡坡开到河边的渡口了。这辆大车子既然已在中国境内的公路上试行成功，我们把它送到目的地是满有把握的。车子翻过一座山头，发动机就象是开了锅，每到一个U字形的弯路，我们更是遇到加倍的困难。幸亏“桑尼克罗夫特”虽然马力不足，却结实得象辆坦克，而且底盘的弹簧极好。尽管有时我们掉在大队后面相当之远，不过始终是锲而不舍地随着队伍朝着北方前进。

.....

“你们看！”希尔德·江突然嚷了起来。这时，我们正从贵州省会周围的环形山顶上滑行下来，“学生，一定是图云关到了！”

在一片棕榈树下，我们停了车，便被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热情的青年人簇拥了起来。他们围观我们的救护车，发出种种赞语。公路的另一边是一些乡村建筑物，盖着长条形的茅草屋顶。整个地方，呈现了典型的山村情调。这就是图云关——罗伯特·林⑥大夫的医疗救援团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位于山上五千英尺处，原是一所实验林场，是建立医院的理想场所。建筑物从当地取材，有点原始，然而

都和四周的风光协调地揉合在一起。这在日本轰炸机已以贵阳为目标的今天，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一个荫蔽的山沟里，有长长的几排房屋，这就是拥有一千张床位的基地医院，陆军部已把这所医院附属在林博士主管的培训学校了。公路的另一边是学生宿舍、车间、仓库和救护车停放场。我马上去找先前在香港相识的一位姑娘，她在成为林博士的秘书之前，对绸子礼服和茶话会要比对中国农村习惯得多。

眼前的这位姑娘已成为一副工人模样了，她失去了往日那白皙而苗条的广东风姿，变得生气蓬勃、明朗果断了！

“我发胖了，是吗？”安丝要我立刻回答她。“住在这里的山上，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肚子饿得厉害！”不过，她那圆圆的小脸蛋，加上麻利敏快的动作，使她显得仍然很有媚力。

“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怎样？”

“比香港好！在这里，真正能为国家做点事情，虽然比起前线的战士来，我们要舒服得多了。”她环顾了一下她那用白灰抹的墙身已有些内陷、屋顶明显漏雨的空荡荡的斗室，扮了个鬼脸说：“不过，你真想了解图云关的话，你得去找我们的头头。”

在这个医务培训学校，我们逗留了十天，部分原因是由于要了解这里的工作，至少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尽管米勒带来了大量的奎宁预防剂，我们全体人员还是都得了疟疾。我在罗伯特·林的茅屋中的一张铺上发了几身大汗，才告痊愈。聊以自慰的是，我的血清检查被制成幻灯片用于他们的教学示范了。

“你的病例好极了，”这位年轻大夫以那种灼热的职业感对我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循环哩！”

后来，从西班牙来的第一批志愿医生中的三个——詹森、基希⑦和贝克尔从香港来到了。他们讨论军医问题，一直谈到深夜。

为人谦逊、说话不慌不忙并带着悦耳的苏格兰口音的罗伯特·林，轻而易举地以权威身份成了这场讨论的主角。在这个生于新加坡的华人身上，有些东西极具魅力。他就读于苏格兰一座名牌学校和爱丁堡大学，曾作为阔尔喀团的军医在法国服役两年，还在东方一座第一流的医科学学校担任过生理学教授。他的医学观点是非正统的，却极富有启发性，他的主张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这一点，便认为什么都没有用了。

这是他的话：

“现代药物的多数实无必要。我们可以把药品种类减少，只剩十几种主要的就足够了，唯有这才是我们所大量需要的。”“战地外科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传奇，这是我在法国体会到的。你手术做得可能十分出色，然而病人却死在你的手里了。问题就在于缺乏机动性，因此，应该有相应的运输系统把你的伤员送回来。”“我们在这里从事的卫生保健工作，其作用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只要我们能够说服司令官把件这工作抓起来。”“我们的病例中有百分之五十不是战争的创伤，它们是从营养不良直接引起的。我们的军队不能打好仗，除非我们给他们吃得好些。”

凡是参观过林博士的医疗救援团的人，都对这位领导者的见解和人品，留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政治——在自由中国往往意味着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行当，并已来到了图云关。罗伯特·林是那种不受正统思想束缚的人，国民党的说教，他并不十分放在心上。他甚至批准把救护车队派到有共

产党部队作战的前线。这些车子很快被撤了回来，可是说他有危险思想的指责，却迟迟没有消除。这位惯于独立思考、一心扑在改进军医工作上的专家，越来越频繁地受到重庆党部发来的命令的干扰。医疗救援团为自己的独立性进行了斗争，然而，这是一场以林博士在中国战争的最后一年辞去职务为结局的输掉的战斗。但是，他对中国军医的培训，他的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彪炳于中国不幸的救死扶伤工作的史册上。

.....

夜幕徐徐降临，我们继续上路，夜深时开进群山怀抱中的一个陕西红十字会分站。那天是九月五日。自从离开绵阳以来，我们一点新闻也听不到。小木屋里，有人在高声讲话，传到我的耳中。

“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彼得正在对妻子说话。他的头发披落在太阳穴上，细长细长的，上面蒙着一层土。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表示决心的动作，立刻把头发拢了回去。我看到他的卡其布衬衣上有着斑斑血迹⑧。

他点了点头回答我的询问：“是的，他们从广播中听到中央社的消息。英、法同德国开战了！”

我们是从这些充满了凶险的年头走进来的人，长期以来对战争已司空见惯。因此，我曾经认为，战争爆发的消息，对我肯定不会引起激昂的情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眼前这则如此偶然地在中国西部听到的消息，突然占据了整个心灵。……我决定，在我把车队护送到西安后，便乘飞机或轮船尽快赶回新西兰！

.....

去宝鸡和西安就不算费劲了。我离开了大队乘火车先走了一步，因为我要给香港发电报，并且要订购飞往南方的下一班飞机的机票。

“好极了，我们又走到一起了！”埃德加·斯诺在西安宾馆的休息室迎接我时说道。

中国古都这幢难看的现代建筑，可以勾起我们两人的许多回忆，远及少帅别出心裁地进行兵谏^⑨的时日。我仍然仿佛期待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前来，噔噔地走过长廊到一个群众大会去发表演说；也仿佛期待着佩格·斯诺身穿着驼毛大衣从延安窑洞来到这里。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不太坏，只要你能够避开此地的盖世太保就行了。他们正在设法摸清我们的底细。”他朝着一个显然是西安保卫部门的特务的人用力点了点头，那人正在柜台上忙于查阅我们的战前旅行档案。接着他压低了声音，“八路军有一批人要在下周出发。我猜想就是乘你们的卡车。”

“好极了。我如果能跟你们一起走就好了。”

“那就是说你不去了？”

“现在不去。如果香港方面同意，我要回新西兰去。”

“去参军？”

“我想是的。我只知道我应该这样做。”

埃德加·斯诺露出揶揄的神色，“不错，这是你们的战争，或者说张伯伦的战争。我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这样想的。不过既然这么远都走过来了，为什么不去一趟延安呢？”

“如果我去，那末多半整个时期都将呆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得再去五台山，去找白求恩……。不啦，如果我要回去，现在就得走。”

一个星期之后，斯诺北上。我向米勒和江氏夫妇告别，把现时对我已经没用了的熊皮大衣送给彼得。我们互相祝愿对方诸事如意。之后，我在西安机场赶上了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老式飞机，踏上返回我已别离了七年的祖国的第一阶段的旅程。

注：

① 西班牙国际纵队失利后部分国际纵队的医生被关在法国境内的古尔德斯集中营。——译者注

② 即廖梦醒。——作者注

③ 书中还描写这辆救护车“有一节铁路卧车车厢那样大”、顶部有一个巨大的红十字，围着一个白色的圆圈。车厢里有十二个担架位置和同样数目的轻伤员座位。车上有洗手盆、自来水和其他现代化设施。”——译者注

④ 新世界出版社《在华三十年》（英文版）第10天，路易·艾黎回忆了汉斯·库尔特·米勒一九三九年赴延安的情况。米勒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学院院长。

——译者注

⑤ 彼得·江即江晴恩，希尔德·江即希尔德·派赫尔。——译者注

⑥ 即中国红十字会前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

——译者注

⑦ 捷克著名外科医生。《秘密的中国》一书作者的弟弟。译者注

⑧ 指彼得·江刚抢救完一位途中牺牲了的护送救护车的八路军战士。——译者注

⑨ 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的西安事变。（原载《中国红十字》1984年7、8期）

文 献 资 料

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

Dr.S.FLATO	斯·弗拉托医生（波兰。傅拉都）
Dr.V.TAUBENFLIGE	维·陶本弗利盖尔医生（波兰。陶维德）
Dr.F.KRIEGEL	弗·克里格尔医生（波兰。柯理格）
Dr.W.JUNGHERMAN	沃·云格尔曼医生（波兰。戎格曼）
Dr.L.KAMIENIECKI	列·卡梅涅茨基医生（波兰。甘理安）
Mrs.M.KAMIENIECKI	玛·卡梅涅茨基夫人（波兰。甘曼妮）
Dr.Y.KRANZDORF	雅·克兰兹多尔夫医生（罗马尼亚。柯烈然）
Mrs.KRANZDORF	克兰兹多尔夫夫人（罗马尼亚。43年病逝于中国）
Mrss E MARKUS	艾·玛库斯小姐（德国）
Dr.G SCHON	捷·舍恩医生（匈牙利。沈恩）
Dr.J.KANETTI	杨·卡内蒂医生（保加利亚。甘扬道）

Dr.H.BAER	赫·贝尔医生（德国。贝尔）
Dr D.jANCU	达·杨库医生（罗马尼亚。杨固）
Dr.W.FREUDMANN	沃·弗雷德曼医生（奥地利。富华德）
Dr.A.VOLOKINE	亚·沃罗金医生（苏联。何乐经）
Dr.C.COUELLE	卡·考泰勒医生（德。顾泰尔）
Dr.H.KENT	亨·肯特医生（奥地利。肯德）
Dr R.BECKER	罗·贝克尔医生（德国。白乐夫）
Dr.F.KISCH	弗·基什医生（捷克）
Dr.F.jENSEN	弗·严森医生（奥地利。严裴德）
Dr.WANTOCH	王道医生（奥地利。45年逝于重庆，葬于南岸墓地）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

在贵阳图云关的红会救护总队

薛庆煜

(一)

1976年途经贵阳，重访图云关旧地，信步登上羽高桥，迈入图云关通道，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影，向北转入群山环抱的谷地，只东南山坡有房舍十余间，一会遇三位妇女，询知是某单位仓库。后人可曾想到四十年代初图云关却是自贵阳通往广西、湖南的咽喉要道。是抗战时期举世闻名的中国医药卫生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下简称总队部和总所）所在地。

在空旷荒芜的山区，依稀可辨当年以茅舍为主的建筑群的各个位置，路北有两座很不起眼的茅舍，西为总队部、东为总所，站在后者位置向南俯瞰自东而西有卫材总库，单身职工宿舍，政治部，汽车大队和修理所，沿小径越过山头向北进入山谷，那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第十八救护队，其次自东而西依次是门诊部，X—线、物理、理疗学组，一六七后方医院，运动场，教室，护理部示教室，生理、生化学组，微生物学组，矫形外科中心的义肢工厂，发电站，复健学组，学员宿舍和卫生大队。沿南山麓自西而东则有护理学组，防疫学组，环境卫生工程学组及其示范场和礼堂。家庭宿舍几乎全是茅屋，少者一两间、多者三、四间，星罗棋布，遍布山坡。就是从这个地方指挥着全国各战区一百几十个救护队的作业。就是在这个地方恢复了几千名伤病员的健康和培训出

数千名军医,数百名环境卫生员、检验员、X—线技术员、医护员和卫生员。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成千吨的医药卫生器材被运送到全国各地,不仅补充了各救护队的需要,也接济了一些有关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机构卫材的不足,当然这一切都成了历史陈迹。

时光流逝,又过去了十年!缅怀往昔,不能不想起创建总队和卫训所的林可胜先生和当时共襄义举的医药卫生界的爱国人士。他们有的已故,有的去了台湾和海外,但大多数却留在祖国大陆,在党领导下参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总队和卫训所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二)

林可胜先生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华侨家庭,自幼在英国读书,成绩优异,获医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归国后,即出任北平协和医院生理学系主任教授,时年不过三十岁。他广有著述,在三十年代是国际著名生理学家。1935年为纪念俄国伟大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教授八十五岁诞辰,国际生理学会在莫斯科召开,林先生与会,归国后写出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论文,刊于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介绍苏联社会医学的优越性。林先生长期在殖民地和英帝国生活的感受,使他懂得弱小民族无地位受欺凌,自青年时代就富有高度民族自尊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当日军占领东北,进逼华北,林先生预感战争迫在眉睫,竟以一教授的身分出面号召,在协和把学生组织成医疗救护队(Medical Officer Trainnig Corp—MOTC),给予急救、伤病员输送和担架操练。此

外，还专门制做了标准急救箱、手术器械箱，为以后总队医药卫生检验器材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古北口战役林先生曾率MOTC的高年级同学开赴战地为军民服务。

1937年夏，林先生去美休假途中，适七·七事变发生，毅然中辍去美，折返南京。在当时卫生部长刘瑞恒敦促下出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并在南京创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自任总队长。不久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总队部迁长沙。鉴于当时我国受过高等医学教育者太少，不过万人，且多集中在大城市，而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和其他沿海大城市又相继沦陷，军队基本上没有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务人员，尽管总队部拥有相当数目的高级医护人才，但难以应付抗战之局面。出路何在？林先生高瞻远瞩，看到出路在于短期调训部队在职各级军医人员。在他的建议和影响下，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诞生于长沙，自任主任。然而不久，日寇深入，长沙大火，总部和卫训所不得不辗转内迁。先至湖南祁阳，再迁桂林，最后才于1939年下半年搬到贵阳的图云关。

自总队成立，林先生多次访美，给总队劝募物资和资金。以其在欧美医学界的声望，马上得到美国医界和社会人士的响应。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也帮着林先生在美作了大量宣传工作。美国医界和社会人士成立了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oard Of Medical Aid to China—ABMAC）。在香港成立了ABMAC办事处，由塞文克莱夫人负责，受林先生的指挥。先后不到六年间，美国各界人士捐献给我总队的款项不下六千万美元（美元那时很值钱，一两黄金合32美元，六千万美元在那时是个很大数字，国民政府的年度预算也不过十几亿美元。）医药卫生器材通过香港或空运内地；或海运到越南海防，经滇缅越铁路再经昆明运到

贵阳或海运到缅甸的仰光经滇缅公路运达贵阳。

从南京撤退直到贵阳，一路很多爱国的医护卫生人士，不畏艰苦，不计待遇，主动参加救护总队，适至1940至1941年间，不少沦陷区的医务工作者，激于抗日救国之热忱，冒生命危险，潜离敌占区，集拢在林先生的爱国旗帜之下。还有不少华侨，港澳同胞也同仇敌忾，奔赴国难。就连香港何东爵士的侄女何绮华和孙儿何鸿超夫妇也参加了红会救护队伍。总计总队有医生五百人左右，其中不少是当时国内各科著名专家；护士数百人，多系高级护士；还有各种卫生科技人员一千多人。这是一支庞大的科技卫生队伍，几乎占了当时可能动员出来参加战地救护的全部医护卫生人员。此外，林先生还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派来十余位东欧籍医生的支援，其中有一位匈牙利外科医生名坎迺蒂（Kaneti），还有一位波兰医生名叫杨固曾在湘北参加救护工作，1985年曾访问我国。其余不克记忆。

林先生就是凭籍上述物质和人力资源，运筹帷幄，惨淡经营，在战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国建立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包括总所在内的六个军医培训中心，以及分布在各战区的卫材供应基地。

（三）

救护总队部设秘书室有中英文秘书四、五人。

设医务股，先后相继由荣独山医师和柳安昌医师任主任，统辖九个大队，若干中队和一百几十个小队，分布于全国九个战区。第一大队驻陕西褒城，大队长是协和毕业的外科专家万福思医师；第二大队驻江西弋阳，大队长是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何鸣九医师；第四大队驻四川黔江，大队长

是彭达谋医师；第五大队驻湖北老河口，大队长是马家骥医师；第八大队驻广西柳州，大队长是朱润琛医师；第九大队曾驻长沙、衡阳，大队长是林竟成医师，其余大队不克记忆。每个小队一般由医师、护士、检验员、环境卫生员、卫生员与医护员十五到二十人组成；配备有标准医药箱、急救箱、手术器械箱、饮水消毒箱、检验箱、输液设备、和高压灭菌器，大队部还配备有X—线装置和技术员。

设总务股，由浙江医专毕业的张祖棻医师任主任。

设卫生医药器材股，由汤骧洲医师和陈璞先生任正副主任。举凡救护队所用的卫生器材，都按林先生的规定做成标准箱，在战地利于携带，便于使用。卫材定期或根据申请由运输股派汽车送达各大队。大队有卫材分库，并配有汽车。

运输股负责人是胡会林先生，下设汽车大队，大队长为清华大学毕业的章宏道先生。汽车大队拥有汽车二百辆，分布于总部、各大队所在地和滇缅公路，沿公路设站并附设仓库，专门负担从仰光把ABMAC捐赠的医药物资经畹町、保山、昆明运抵贵阳。

政治部隶属于重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派来监视总队的。

在图云关驻有第十八救护队，直属于总部，队长是汪凯熙医师。该队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各科医师，如王辨明、王桂生、洪民、周继林、施善堃、唐文铭、张涤生、刘载生、陶国泰、计苏华、严家贵、龚念慈、霍笑足、孔庆德、徐月娥、林传骧、林传骥、董民声、钱芳……还有香港来的何鸿超，伍惠平和伍慕平医师等数十人。他们在一六七后方医院担任指导或和主治医师等工作。

一六七后方医院拥有病床五百张，隶属于军医署，接收前方转来疑难伤患，院长是李泰钧医师。该院接受军医署和总所的双重领导，供作总所的实习医院，在技术上和物质上受总部的支援。

卫训所自迁到图云关后，由于客观需要和为了充分发挥红会各救护大队医护人员的作用，先后相继又成立了五个分所：第一分所在陕西褒城，由陈韬医师任主任；第二分所在江西上饶，由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刘经邦医师任主任；第三分所在湖北老河口，由马家骥医师任主任；第四分所在四川黔江，由彭达谋医师任主任；第五分所在湖南东安，由林竟成医师任主任。每个分所所在地都驻有红十字会救护大队，主任大多由大队长兼，由于指挥统一，各分所与各大队的医护人员与设备均可交流协作，故各分所的师资十分健全，设备也较完善。

总所由林可胜先生任主任，张先林医师任副主任，下设若干学组：组织学组（相当于教务处），由汪凯熙医师任主任；内科学组由周泰恺医师任主任，陶桓乐、吴国兴、曾享能、聂重恩、陶澌诸医师任高级教官；外科学组由张先林医师任主任；汪凯熙、屠开元、范乐成、马安权、熊荣超、徐湘连、周金华、虞颂庭、刘庆东诸医师任高级高官；防疫学组先后由容启荣、施正信和薛荫诸君医师任主任，由王申望和军医学校毕业的方镕铨和贵阳医学院毕业的吕家裕医师任教官；X—线物理学组由荣独山任主任，石顺起、龙名扬二医师，钱家祺和顾菊珍二先生任教官；理疗科由张天民先生任主任；微生物学组由陈文贵医师任主任，林飞卿，叶天星和史敏言诸医师任高级教官；生物学组由柳安昌兼任主任，由吕运明医师任高级教官；生物学组主任为林绍文先生；生

化学组主任为李寇华先生；环境卫生工程学组先后由过祖源工程师和刘永懋工程师任主任，倪世槐、戴根法和林寿梧工程师等任高级教官；护理学组由周美玉任主任，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孙秀德和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龚棣珍任高级教官；复健学组主任为邹玉阶先生，教官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宋四明先生。这些医护工程技术人员都兼任总队的指导员或视导员；根据需要随时被派赴战地指导救护队的医疗工作。重庆政府给卫训所的拨款有限，卫训所的经费和设备主要也是靠林先生从国外募集来的资金和物资来维持。

(四)

为了有效地从事医疗救护工作，统一教学和作业，林先生制定各科作业规程，责成有关专家撰写。《内科学规程》由周寿恺氏等执笔；《外科学规程》由张先林氏等执笔；《防疫学规程》由容启荣和施正信氏等执笔；《环境卫生规程》由过祖源，刘永懋和倪世槐三工程师执笔；《护理学规程》由周美玉和孙秀德二氏执笔，所有规程全由林先生亲自审定后在香港付印，出版后运来大后方，分发给红会各救护队、总所与分所各学组和科室以及有关部队的军医机构，这部规程对教学和战地救护工作起了指导性作用。

救护队的作业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往往在运动中进行，每当日寇发动攻势、前方吃紧时，林先生辄亲临战地，督导救护队的作业，就地解决问题。虽跋涉于深山丛林和前方无路地区，不辞劳瘁。这极大地鼓舞了救护队成员的士气，也赢得了军民一致的赞扬。

总部和总所除例行战地医疗救护和军医教育外，还随时接受一些临时性的任务。1941年，湘北部队广有体虱寄生，

受到回归热、斑疹伤寒流行的威胁。林先生由总所派出以戴根法工程师为首的环境卫生队，开赴湘北，为部队大搞灭虱治疥，指导改善环境卫生。不只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总部和总所在贵州境内特别是贵阳近郊，多次应召为驻军，为监护大队，扎佐步兵训练场部队等，灭虱治疥、防治回归热、斑疹伤寒的流行。也多次为过境的师管区和军管区部队（属预备兵役）检查身体和防病治病。

1941年11月日机一架盘旋于湖南常德上空，投下棉絮块和谷物。旋在鸡鸭巷、关帝庙和东门一带暴发疑似鼠疫的流行，地方政府急电林可胜先生请求支援。林先生派出总所微生物学专家陈文贵主任（曾在印度哈佛金氏研究所研究过鼠疫学）率总部医师薛荫奎和刘培，带领技术人员和设备，星夜出发赶到常德。经尸体解剖，细菌学检查和动物实验以及为行病学调查，证实为败血性鼠疫，是日本侵略军搞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铁证。除采取有效措施扑灭流行外，并向重庆政府和国外发出了报告，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这份报告于解放后转载于国际法庭有关日本法西斯战犯罪行汇编，为1953年在沈阳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时提供了日寇在华中搞细菌战的罪证。

抗战时期虽系国共合作，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之心不死，不断制造磨擦。就在这种特殊复杂的政治情况下，当我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同志于1939—1940年间来到图云要求医药支援时，林先生按申请单主动加倍发给，尤其是奎宁药片。对人民做的这点应做之事，我党从未忘怀。

总队部和总所不仅在国内各抗日前线为军民防病治病、战地救护做出贡献，于1942至1945年间也在中印缅战区做出

应有的贡献。太平洋事变后，香港、印度支那地区以及新加坡相继为日军占领，随后日军挥师北上，又占领了仰光，深入缅甸腹地。重庆政府应盟军邀请，仓促组成远征军（这是第一次），以罗卓英（粤系军人曾任过广东省政府主席）为统帅，进军缅甸，企图帮助英军保卫缅甸、收复仰光，恢复滇缅国际公路。总队部也仓促派出以计苏华、严家贵和龚念慈为队长的三个医疗救护队，疾驰云南，进入北缅。林可胜先生则以军医视察总监的身分，亲临北缅前方与罗卓英和史迪威将军进入北缅腹地。孰料敌强我弱，除孙立人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他亲自指挥下，在仁安羌（北缅西部盛产石油的重镇）击溃一个日军联队，给一个被困的英军师团解围取得胜利外，其余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日军以楔形攻势向北直插，将我军分割为东西两半，互失联系。我三个救护队随东部我军退入云南，日寇乘胜追击，占领了我滇西重镇龙陵、腾冲和大理等地，直到1945年春才被收复。被分割在西部之我军残部及其指挥官罗卓英，美将领史迪威和林可胜先生，分别经长途跋涉，步行穿过原始森林，翻越那加山，历尽千辛万苦进入印度。只有孙立人部全师完整地列队开入印度，以后该师构成中国驻印军的核心和主力，林可胜先生于半年后才辗转回到图云关。

1942年末，为了配合盟军反攻，收复北缅，意在打通中印通道，修筑国际公路，中国驻印军在印度成立。总所派出以马安权医师和戴根法工程师为首的医疗环境卫生工程训练队二十多人，飞往印度兰姆伽（当时驻印军总部的所在地），开设短期军医训练班，培训驻印军医护卫生人员，传授丛林作战救护和防疫知识。与此同时，总所派出以杨文达医师为首的包括虞颂庭、刘庆东、孔庆德等医护环境卫生工程人员

三十多人，在昆明黑林铺成立军医训练班。不久增派了汪凯熙、李庆杰等医师以及从印度兰姆伽调回国内的戴根法工程师等多人，充实了黑林铺的师资，组训以卫立煌为统帅在云南二次组成的远征军的医护人员。1943年夏林可胜先生又应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之请，相继从总所派出薛荫奎和张涤生二医师，分别担任了新一军军医处长和新三十八师军医主任的职务。他们参加全部收复北缅，全歼以日本王牌军十八师团为主力的日军两万数千人的战役，取得了在热带原始森林作战从事医疗救护防疫工作的经验，并一直服役到抗战的胜利。

1940到1942年的三年间，是总队部和总所的全盛时期。当时人才荟萃。经费充足，卫材丰富，为抗战时期的前后方军民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做出了卓越贡献。救护总队和卫训所的事业，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就其本质说是爱国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但是这一事业是与林可胜先生的名字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没有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在美国奔走呼吁，美国医药援华会就不一定会成立，捐款物资就不一定逐年大量源源而来。如果没有林先生率先举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义旗，全国医药卫生界固不乏爱国的志士仁人，在那种战火日烈，地域为日侵略军分割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怕也会流于报国无门。

救护总队事业的发展，随着战事的发展而贡献愈大，林先生在国内外的声望也益隆。尤其是先生一人竟掌握着全部国外捐款和医药卫材物资，使得某些人分外眼红，也使当时安住重庆、身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高位的理事诸公深感不悦。自1942年林先生自印度归国后，谰言四出，屡遭诽谤，在陕西部署了几个医疗救护队也成了罪名，在此情况下林先

生不得不辞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干事和他一手创建的救护总队总队长的职务，由重庆派来总会秘书长潘小萼先生来接替。由于总会办红十字会的宗旨是在大城市办大医院，改变了林先生创建救护总队为战地军民服务的大方向，救护总队的使命也就从此结束。其成员大部分转调总所及各分所：小部分自动离去、各奔前程；有的返回原侨居国家和地区；东欧籍友人也相继归国；而卫训总所的领导责任林先生也不得不委托给严智钟先生代理。从1943年夏林可胜先生即去了昆明，专任远征军军医视察总监这一闲职。

(七)

现将笔者所知道的原救护总队部及总所的一些主要医务工作的简况，依在本文出现的先后次序，作一简介：

林可胜 自辞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和救护总队长职务后，于1944年又被召回重庆，出任军医署署长，抗战胜利后，林氏将贵州安顺之军医学校与卫训所合并，在上海江湾建成了国防医学院，1948年秋冬之季，奉命迁台，林氏表面上执行命令，实际上对国防医学院教工采取了放任态度。他本人也未去台湾任职，而是去了美国重登大学讲坛，六十年代在美病故。

塞文克莱夫人 英国人，其丈夫塞文克先菜生当时任港英政府的卫生局长，是林可胜先生的朋友。

荣独山 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X-线学专家，在国防医学院曾任教授，现为上海第一医学院放射线科主任一级教

授，三中全会后与夫人林飞卿教授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工资六万元，捐献给学校、用作奖学金。

柳安昌 协和医学院1928年毕业生，生理学家，国防医学院教授，1948年去台，已故。

彭达谋 协和医学院1933年毕业生，公共卫生学家，国防医学院办公厅主任，1948年去台，已故。

马家骥 协和医学院1935年毕业生，公共卫生学家，国防医学院教授，传闻去了澳大利亚。

林竟成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33年毕业生，胜利后任该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公共卫生系主任；解放后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院院长兼卫生系主任教授；曾带上海一个医疗队参加过抗美援朝。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冲击，受到不公平待遇，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现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卫生系教授，以八十高龄因健康不好，自1985年住院以迄现在，但在病房生活中仍带研究生，主编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

汤蠡洲 解放后曾任安徽医学院院长，已故。

陈璞 当时中国著名药学家，曾任重庆军医署药政司司长，解放后不知所终。

章宏道 即章文晋，当时是地下党员，我国第一任驻美大使，现为对外友协会长。

汪凯熙 协和医学院1934年毕业生，胸腔外科专家，国防医学教授，1948年去美，现在纽约。

王辨明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现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教授，附属协和医院内科主任。

王桂生 解放后，五十年代在北京协和医院任骨科教授。

洪 民 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解放后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后调军事医学科学院。三中全会后，因工作成绩优异，曾受到叶帅发布命令表扬。

张涤生 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胜利后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解放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参加过抗美援朝医疗队，曾任上海人民医院院长。几十年来，为我国整复外科和显微外科学闯出了新的局面，三中全会以来，多次出国讲学考察，遍历欧、美、大洋洲和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国际著名的显微外科专家。1986年在第九届国际显微外学会在意大利召开的大会上，被聘为该会的顾问并被推选为在1989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显微外科学会大会的主席。为祖国赢得荣誉。

刘载生 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解放后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外科教授，已故。

陶国泰 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精神病学教授，在南京工作。

计苏华 上海医学院毕业，当年是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国家保健局局长，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严家贵 上海医学院毕业，据说现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龚念慈 上海医学院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现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内科教授。

霍笑足 广州孙逸仙医学院毕业，龚念慈教授夫人，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现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工作。

孔庆德 湘雅医学院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学教授。

徐月娥 湘雅医学院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现在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儿科工作。

林传骧 解放后在北京医院任内科教授，心血管病学专家。

董民声 军医学校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耳鼻喉科专家，解放后任河南医学院教授兼副院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钱芳 解放后在河南医学院任教。

李泰钧 沈阳小河沿医学院毕业，耳鼻喉科医师，五十年代传闻在南方某地工作。

陈韶 沈阳小河沿医学院毕业，1948随国防学院去台湾。

张先林 协和医学院1929年毕业，著名外科专家，1948年去台湾，已故。

周寿恺 协和医学院1933年毕业，内科专家，建国后任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附属医院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患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亡。

陶桓乐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33年毕业，内科专家，建国后任武汉医学院教授，后调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是毛主席患病时医疗组的成员。

吴国兴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抗战胜利后去台湾任台北总医院院长，不知所终。

聂重恩 协和医学院1936年毕业，小儿科专家，1948年随丈夫张先林去台湾，据悉已在美病故。

陶溱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小儿科专家。建国后在武汉医学院任教授，后调北京医院，已退休。

屠开元 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德进修，骨科专家。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解放后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

授，副校长。

范乐成 协和医学院1936年毕业，外科专家。解放后任武汉医学院教授，兼学院副院长，不幸文革中去世。

马安权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小儿外科学家。解放后曾在上海某医院工作，后传闻去美，在美病故。

熊荣超 协和医学院1937年毕业。解放前夕进入东北解放区，任大连医学院教授兼妇产科教研组主任，现已离休。

徐湘莲 协和医学院1937年毕业。妇产科专家，现在美国。

周金华 协和医学院1938年毕业，外科专家，现在美国。

虞颂庭 协和医学院1939年毕业，外科专家。解放后任天津医学院外科主任教授，天津市九三学社主委，是周总理患病时治疗小组成员。

刘庆东 协和医学院1938年毕业，美籍华侨，外科学家，抗日胜利后，回故乡檀香山。

容启荣 协和医学院1931年毕业，公共卫生专家，离总部后曾在重庆任卫生署防疫司司长，后出国转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专员，不知所终。

施正信 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留英多年，流行病学专家。离开总部后，曾任贵阳医学院和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后去日内瓦在世界卫生组织任专员。六十年代回国后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已退休，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薛荫奎 即薛庆煜，协和医学院1940年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1948年下半年在上海接受地下党之聘，1949年春进入东北解放区，任大连大学医学院和大连医学院教授，自1958

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及教授职称待遇。现任民盟呼市总支主任委员和呼和浩特市政协常委。

王申望 昆虫学家,抗战胜利后即去台湾在台大任教,不知所终。

龙名扬 军医学校毕业,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现在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放射线科教授。

钱家琪 物理学家,是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博士的女婿,现在美国,不久前曾归国。

顾菊珍 物理学家,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博士的女儿,现在美国,不久前曾归国。

张天民 我国著名理疗学家,解放后任武汉医学院副教授,理疗科主任,七十年代末病故。

陈文贵 湘雅医学院早年毕业生,微生物学家,鼠疫专家。解放后曾去东北考察日本搞的细菌战实验基地,曾任卫生部防疫司长,后失联系。

林飞卿 协和医学院1932年毕业,微生物学专家,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解放后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组教授。

叶天星 东南医学院毕业,微生物学家,曾在国防医学院任教,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史敏言 东南医学院毕业,微生物学家。解放后任安徽医学院教授

吕运明 生理学家,三十年代曾在协和进修,胜利后,任安徽医学院教授。解放后,任青岛医学院生理教研组主任教授。

林绍文 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生物学专家,传闻解放

前夕去了美国。

李冠华 生物化学专家，三十年代曾在协和医学院进修，1948年去了美国。

过祖源 美国北卡州大学毕业，卫生工程学专家，离开总所后，曾在重庆卫生署任技正，解放后曾任北京市环保局总工程师。

刘永懋 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卫生工程学专家，抗战胜利后即去台湾。

戴根法 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解放后任西南铁路工程局高级工程师，先后曾参与成渝、川黔、和滇黔等铁路的建筑。1958年政治上受到冲击，受到不公平待遇，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和恢复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待遇。自1978年起在衡广复线大瑶山隧道工程中，承担了引进技术，引进装备、安装设备和培训技术工人等重要任务，为工程局培养了一支能操作、能保养的施工技术队伍，给打通大瑶山隧道奠定了物质基础，贡献卓越。1983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被评为铁道部全国劳动模范。他的先进事迹曾先后刊载于《人民铁道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他已是古稀之年，不幸又患上直肠癌症，已两次手术，仍在化疗，身虽不得不离开工地但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隧道。

林寿梧 工程师，胜利后在上海国防医学院任教，现任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卫生系教授。

周美玉 协和医学院护理系1930年毕业，后去美进修，分别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护理教育学院硕士，1948年随上海国防医学院迁去台湾。

沈其震 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和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杨文达 协和医学院1937年毕业，胜利后曾任南京总医院院长，1948年冬随院迁台湾，据悉在台曾任过军医署长和军医局局长，已退休。

李庆杰 协和医学院1937年毕业，公共卫生学家，思想进步，不幸在昆明工作期间，为国民党特务所谋害。

严智钟 重庆军医署军医监参议，长期协助林可胜先生管理图云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抗战胜利后即去台湾，曾任台大校长，已故。

以上有64人是在图云关总所工作过的主要人员。他们中的不少人在解放前已是专家教授的地位。解放前夕主动留在国内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有41人，占64%；去台湾的有11人（占17.9%）；去美国的10人（占15.6%）其他2人（占2.5%）。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救护总队部

沈新路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三省以后，为了大规模侵略中国，达到其法西斯掠夺的目的，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挑起卢沟桥事件，开始大举进犯中原、南方城市，八月十三日在上海登陆。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燃起了抗日的烽火。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和抗日将士在前线阵亡、战伤，中国红十字会全体员工和医务界爱国人士，为配合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履行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汉口成立战时救护委员会。由于战争失利，武汉吃紧，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迁移长沙，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一九三九年辗转迁移到贵阳。救护总队部队址设在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任务。遂于一九四五年底撤离贵阳图云关去重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并办公，后又还都南京，最后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正式结束。抗日战争进行了八年，救护总队部的战地救护工作同样持续了八年。八年当中救护总队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极受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所欢迎，给全体军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救护总队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是随着战地救护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救护总队部内部机构在抗战初期下设医务、总务、运输、材料、会计等股。后来发展为总队长办公室、业务处、总务处、会计室、运输大队、材料总库等。医

疗队方面抗战初期下设三个大队，分布在陕西、江西、湖南等地；抗战中期全国划分为九个战区，救护总队部在每一个战区设立一个医疗大队，于是扩展到九个大队，以战区番号番号，即第一战区为第一大队，第二战区为第二大队；大队以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区队。所有队员除一部份留驻部队后方医院或兵站医院为病员解除痛苦外，大部份随部队去前线与野战医院同进退。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扩展到150个，医务工作人员多达3420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除去各个战区以外，同时也派医疗队去延安和江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员和群众服务。

救护总队部工作重点是在战争前线，救护战伤病员。因而当时救护总队部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并对所有工作人员订有八条救护信条：

- | | |
|---------|---------|
| 一、具丰富情感 | 二、抱牺牲志愿 |
| 三、本博爱襟怀 | 四、献科学身手 |
| 五、作精密准备 | 六、求迅速效率 |
| 七、保伤病安全 | 八、增人类幸福 |

根据以上信条，救护总队部三千多职工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谱写了一幅幅可歌可泣光辉的业绩，深受受伤战士和平民百姓的称赞。据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止，共进行了：

甲、外科：

1. 手术 119,836人
2. 骨折复位 35,522人
3. 敷伤 8,784,731人

乙、内科：

1. 住院人数 2,142,997人

- 2. 门诊军人 2,481,685人
- 3. 门诊平民 2,002,996人
- 4. 预防接种 4,632,446人

丙、其他：

- 1. x 光照相 5,631次
- 2. x 光透视 52,798次
- 3. 灭虱人数 792,148人
- 4. 灭虱物数 3,881,176件
- 5. 检 验 226,593人
- 6. 特别营养 934,833人

救护总队部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在战场上救护伤病官兵、平民百姓，也为难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记得一九四四年冬，日寇魔爪由广西步步深入到贵州边境的独山县城时，对平民百姓和路过难民进行狂轰滥炸。不堪敌人蹂躏的人民，纷纷逃难来到贵阳。每天途经图云关的难民在数百人以上，其中部份难民被敌机轰炸受伤，部份因长途跋涉，再加沿途食宿条件恶劣，很多人染上疾病。救护总队部当即给予各方面的服务。在礼堂内设立了接待站，为路过难民供应茶水，对寒衣有困难的给予衣着帮助，有病的给予医药治疗。当时以患腥红热和斑疹伤寒的最多，这些病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害人的生命。于是救护总队部在图云关上都一一进行检查和治疗，一时不能转移的，设临时病床及时处理。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从广西逃难到独山时遇到敌机轰炸，弹片炸到他左肩背上，混乱中只作简单的包扎就向贵阳转移。经过几个月的步行到达图云关后找到了我，由于长时间伤口没有换药，以致不但身上发臭，而且长了不少的蛆，经门诊部诊断换药，由于长时间没有换药已经染上破伤风，

病情十分严重危急。经过医生们的抢救和悉心治疗，终于转危为安恢复健康。以后参加了救护总队部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是一个民间性的战时医疗救护组织。它集中了全国不少优秀的专家、学者和医务工作者，有留学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医学博士，也有来自协和、同济、湘雅等医学院的高材生。抗日战争前期总队长由医学博士林可胜担任，后期总队长由骨科专家胡兰生担任。专家学者中有x光专家荣独山，内科专家张寿凯，林竞成，外科专家汤蠡舟、屠开元、张先林、汪凯熙，细菌学家陈文贵、林飞卿，眼科专家张祖棻，护理学专家周美玉，环境卫生学专家刘永茂，生理学教授柳安昌等。这些全国医务界的精华，都是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献身于红十字会救护事业，为减轻伤病军民的痛苦而竭尽全力，做出了贡献。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九三九年秋在英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和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由英国医药援华会出面，组成了以甘扬道、沸拉托为负责人的援华医疗队，从欧洲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所在地贵阳图云关。这个医疗队共有廿多人，他们来自反法西斯斗争前线，大多数是东欧国籍的医生，也有盟国的专家，如保加利亚、波兰、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德国、苏联和英国等。他们中间多数是共产党员，来到图云关以后部份人去重庆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他们要求去延安工作。“只要工作在抗日战线无论在那个地区，都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周恩来的思想影响下，他们以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为基地，分赴各个战区医疗大队，参加实地救护工作，为抗日前线战士

做了大量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工作，培训了不少医务人员，为当地人民防病治病，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救护总队部的经费和医药器材主要来源于南洋华侨和海外侨胞。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激起爱国侨胞的义愤，纷纷组织援华机构，给予祖国无私的援助，所需经费、医药器材、运输工具、服装布匹，应有尽有。同时国际援华组织也给予经济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国际医药援华会不仅按期给救护总队部拨来经费，并派来曾经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欧洲各国国籍的医生来到救护总队部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前期总队长林可胜长期生活在国外，在国外医药界有相当声誉，通过他的关系为救护总队部募捐来大量医药器材、运输汽车和救护用车。当时沿海城市都已沦陷，所有物资主要通过滇缅公路源源运来贵阳，然后分发到各战区各个医疗队使用。当时国外捐赠来的医药器材、运输工具上面都标有赠送单位，这种无私援助大大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由于有了这些经济上和物质上的保证，使救护总队部的工作深入到各个战区，为战伤官兵和平民百姓做了大量工作，时间长达八年之久，这中间包含着爱国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奉献。

图云关距离贵阳市约有三公里，四周环山、树林茂密、桂黔公路贯通其中，地势险要、景色宜人，上有检查哨，下有羽高桥，是通向桂西的门户。救护总队部位于检查哨和羽高桥山坡公路之间。总队长办公室、业务处、总务处、会计室在公路北侧的一栋平房里。材料总库、运输大队、礼堂、门市部、食堂、宿舍等都在公路南侧的建筑群里。抗战期间物质条件差，所有建筑都十分简陋，屋顶都是稻草盖的，林

可胜总队长和汤鑫舟副总队长的住房也都一样，就在总队部办公室后面的山坡上。当时在图云关的工作人员有一千人以上，就我所在的会计室里就有三十多人。全部工作人员中大部份是年轻的单身男女，多数家在沦陷区，大家心怀一个共同目标投身到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行列。同事之间都以同志相称，感到十分亲切。从上到下和谐相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犹如一个战时大家庭。当时生活比较艰苦，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粮，因为所有房屋建在山坡上，宿舍在上坡，食堂在下坡，有次一场大雨宿舍厕所内的流水冲向食堂的蓄水池，大家吃了几顿尿汤饭也毫无怨言。活动在战地的医护人员条件更差，有的转战晋陕高原，有的遍走不毛之地，有的穿行疫情禁区，但大家始终坚持工作。外籍医生也一样，并无特殊照顾，终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

在救护总队部惟一优越条件是穿着方面比其他单位都强，不论夏装、冬装都是免费供应。夏装有黄卡其布制服，也有蓝卡其布制服，还有罗斯福布制服；冬装有棉大衣，这些衣服上都有特制的红十字铜扣子，再加上一顶船形帽，穿戴着它颇有精神。人们对之十分羡慕，也给大家带来欣慰。

在当时的图云关上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高，就在我所在的会计室里忙时就加班，甚而通宵达旦的干，既没有夜宵，也没有加班费，都是心甘情愿地在勤奋工作。除此以外精神生活比较愉快。经常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联欢晚会、萤火会、球类比赛，爬山游泳等等。另外还办了一个壁报叫《图云青年》，内容有时事新闻方面的报道和救护总队部业务活动方面的介绍，吸引了不少过往群众。同时设立了《图云剧社》演出的戏剧有《小放牛》《打渔杀家》《新红鸾喜》《重庆廿四小时》等等。业余生活生动活

泼，丰富多彩，令人回味。图云关上有个小饭馆想改善一下生活，几个同志就去那里打个牙祭。时逢假日，高兴时三五成群走到羽高桥，然后坐马车路经中央医院进城去玩玩，偶而进大三元酒家吃顿广东点心，别有风趣，其味无穷。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晚上图云关的人们欢喜若狂，没有锣鼓以脸盆、洋铁桶代替，敲敲打打，点起篝火，又唱又跳，欢声笑语，直到天亮。别离父母亲人八年之久的人们，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来到。于是摄影留念、签名留言表示八年抗战共同战斗的难忘之情。救护总队部大门口的集体合影是我保存了四十多年的珍藏，也是救护总队部同志们共同艰苦生活的见证。四十多年过去了，那种战时的集体生活，回忆起来颇富情趣，意义深远。

救护总队部在抗日战争八年当中，既在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战区进行工作，同时也派医疗队到延安和江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兵和群众服务。并把汽车、医药器材送到延安、江西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总队长林可胜思想进步，他受美国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影响，对八路军、新四军保持着合作关系。林可胜和章文晋关系密切。国外赠送来运输工具和救护车辆以后，林可胜要章文晋负责运输队的工作。经章文晋的介绍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了运输队工作，充实了运输队的力量。之后把在救护总队部的地下党员组成一个特支，下设三个支部，受南方局领导。这段时间争取了一些进步人士，为抗日救亡做了不少工作。

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救护总队部产生了怀疑，说林派医疗队去陕北，把大量药品器材送去八路军、新四军，对林可胜总队长表示不满，最终把林可胜调离救护总队部。国民党为了对救护总队部的控制，在一九四二年成立

了特别党部和政治部。二年之内把当时在救护总队部的工作人员，上至总队长，下至勤杂人员，几乎全部发展为国民党员，进行集体入党。当时特别党部的特派员先是潘小萼，后是胡兰生，书记长先是王洽民，后是陈宗莹。特别党部下设区党部，以下又设区分部，区分部下设小组。主要活动是每周一次的纪念周，会上由各部门负责人轮流做些时事报告或者工作报告。参加的人并不踊跃，大家经常藉口工作忙而不去参加，有时要签到就不得不去。此外还有每周一次的小组会。虽然规定每周一次，但实际上不常举行，记得小组会上曾学习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文件。但绝大多数的小组会是大家要求自由活动，免受国民党的约束，而去进行爬山游玩等活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国民党特别党部和政治部无形瓦解。

以上所述仅仅是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了打击日寇，救护伤病战士和平民百姓，抗战八年三千多人在那里历尽了艰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救护总队部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它的历史特点是时间长、人员多、贡献大。我是当年救护总队部的一员，每当回忆这些往事，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这些峥嵘岁月的记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但究竟事隔四十多年，难免挂一漏万，但愿当年共事者给予补充，以充实这段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俾为后人所了解。

参加红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回忆

林宽成

我是同济大学医学院1933年毕业生。参加红会工作时是31岁，现年82岁。五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但八年抗战救护工作中惊心动魄的经历，给了我一生难忘的极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每一追念，记忆犹新。

(一)

1937年11月底，在日寇逼近镇江（我当时是江苏省会卫生事务所防疫课长），敌机空袭中，举家搭最后一条船到汉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我决心参加救护工作。1938年3月，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介绍我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红十字会总队部设在长沙），他任命我为49医防队队长。从此，在八年抗日战争救护工作中，我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全队有医生、护士、环境卫生员及助理员等共20人，副队长是祖张祺，队员有方元宣、张鸿慧、李开物、赵憬、卓文华等人。他们多半是流亡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在长沙接受了一个月的医疗救护及卫生防疫训练，当时的教师有张先林、屠开元、荣独山、彭达谋、过祖源等。

1938年5月，我队便开到武汉，在难民收容所做医疗、预防及环境卫生工作。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救亡的中心，我们队部设在汉口成忠街，邻近八路军办事处。我队队员中的张鸿慧曾冒着危险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我队还参加过海港

检疫工作，后又调至武昌小朝街兵站医院做伤病员医疗工作。当时救护总队也迁至汉口，我听到荣独山队长报告参加台儿庄会战救护工作时患痢疾行军经过，使我很受感动。在保卫大武汉时，有一次敌机空袭，兵站医院工作人员都出去躲警报去了，独我们红会49队仍在坚持工作。当时正值军医署副署长来视察，见此情景，大为赞扬。军医署署长胡兰生也曾来兵站医院视察过。医院院长，胡署长和我正在院长室里谈话，突然敌机轰炸，院外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而胡署长却神色自若，谈笑如恒。

1938年11月，敌人迫近武汉，武汉大撤退，我队最后退出武汉，转到长沙。在极端拥挤的情况下，乘火车到衡阳转祁阳，救护总队亦迁到祁阳。我们在祁阳受训时，祁阳陆军医院伤病兵斑疹伤寒及回归热流行，总队部令我队到26陆军医院做灭虱工作。我们对这一工作没有经验，而陆军医院院长及副官因与总队部专家们语言不合，不但不予合作，反挑拨伤病员捣毁灭虱站。总队部命我们迁至他院工作，我们不走，通过对院长、副官和伤病员作工作，使他们了解灭虱站工作的意义，使工作得以恢复。工作开始时，由于灭虱器蒸汽温度不够，不能杀死虱子，伤员脱衣洗澡后，换下的衣服不能取出，只好披着棉大衣等待。为了不让他们着急，我们就组织唱歌，以活跃气氛。灭虱时，每十人一组，一次约花一小时时间。队员们帮助伤员洗澡，歌声彼落此起，士气很高，通宵工作直到鸡鸣三唱，才收队回宿舍。这种工作精神感动了伤员及医院工作人员，争取了他们的合作，打开了工作局面，颇受总队部领导和专家们的赞许。

1939年1月初，救护总队由祁阳迁往贵阳，我队奉命转到桂林。当时交通十分拥挤，火车分成五等，四等在火车头

及（在）车箱下，五等在车顶上。我们全队均乘坐五等，用绳子绑着，以防跌下，头戴钢盔，以防过有电线处及山洞时受伤。深夜到达桂林，遍找旅馆不得，20人只好挤在几平方公尺的帐房里。虽桂林山水甲天下，此时也无心观赏。桂林也是每天都有警报，我们主要做伤病兵医院治疗工作及难民收容所医疗预防工作。遇到敌机轰炸时，做临时救护工作。有一次我正在江边，突然响起警报，数十架敌机来回在江边轰炸，我躲在柴堆里，炸弹离十几米远爆炸，我幸免于难。

（二）

1月底，我队调至衡阳后方医院工作时，见到许多病兵和壮丁患腹泻，药物治疗无效，死亡很多。其原因是营养缺乏所致。因后方医院克扣伤病兵伙食费，给腹泻病人吃干饭。为此，我队用病员伙食费及由衡阳“伤兵之友社”资助，在后方医院办起特别营养厨房，为病员办特别饮食，救活了一些人。我们还在衡阳后方医院做灭虱工作，伤病员都热情地把我们称作是开洗澡堂和办厨房的人。当时，我们还与一些民众救亡进步团体，如救国歌唱队，救国洗衣队等合作，共同做伤病员工作。不少伤病员患斑疹伤寒及回归热，其虱子多到把白色棉被都密布成了黑色，一件棉背心就有十几万个虱子，令人见之神经发麻。还有一些伤病员生了虱子也不愿参加洗澡灭虱，要做不少的说服工作。

1939年3月间，我们得到消息：湖南邵阳过路的壮丁队暴发霍乱。我想：防疫如救火，刻不容缓。便一方面向贵阳的总救队报告，一方面做好准备，马上率队开往邵阳开展工作，因陋就简，隔离病人，用酒灶做蒸馏水救治病人，用漂白粉消毒饮用水等。等到军政部防疫大队，湖南省防疫大队

及国际防疫队等等陆续赶到时，我们已开展了不少工作。他们看到我们红会49医防队动作如此迅速，无不表示惊奇与钦佩。

扑灭霍乱以后，于4月间我队在衡阳第八收容所为伤病员灭虱。4月8日，久雨初晴，敌机突然来袭，警报响时，灭虱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不便中断，我们全队同志均坚持不愿离开收容所。第五中队长阮尚丞来所强令我队撤离。我们离开后不久，第八收容所被敌机轰炸夷为平地，伤病员死伤百余人，我队人员幸免于难。以后，我队转移到后方医院进行灭虱及治疗回归热、斑疹伤寒工作。队员们身上每天都发现有虱子，曾有两人患斑疹伤寒，两人患回归热。红会33医疗队（队长唐文铭）也在后方医院做医疗手术工作，该队一女护士因患斑疹伤寒而死亡。我也曾感染上回归热，高烧四十度，仍勉强坚持查房工作。

由于我队在祁阳为伤病兵防治斑疹伤寒回归热和灭虱工作，办理特别营养厨房救治病人，以及首先到邵阳与友队扑灭壮丁队霍乱暴发流行，成绩显著，救护总队于1939年5月明令嘉奖，并将我升任为红会第四中队长仍兼49医防队队长。这些都是全队人员热忱爱国，不怕牺牲，团结奋斗所取得的成绩。

在祁阳时，我队曾一度住在仁济医院礼拜堂内，该院院长会同教会牧师等多人开会，要强迫我队迁出。我说：“这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怎么住不得？！中国人抗战宁死不屈，中国人可以死而不能受侮辱，倘若你们敢关门，我们就要开一个门。”他们听到我们这些话，大为吃惊，以后态度改变好些了。

看到我队士气很旺，有些青年队员说，我们是来救国

的，要求上前方到第一线去工作。我向救护总队申请并经批准，把49医防队作为第一个队开往湘北前方无路区（公路全部破坏）工作。8月间，医防队到达长沙，把医防队分成两个分队，一个分队由祖张祺副队长率领到湘阴新市收容所工作，另一个分队由我带领渡过汨罗江到岳阳罗内195师（师长覃异之）野战医院工作。

军医处处长曹天行，很欢迎我们。他是军医学学校毕业生，很有才华，与我们合作很好。我们还曾到新墙河南岸察看对岸敌人活动情况。总队部派来一位波兰籍医生Jensen（曾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对前方救护工作很有经验）到我们队来的那天，正值9.18，当时敌人已向我方炮击两天，正在向我方进攻，师部十分紧张。我和Jensen在营房敷伤所为送下来的伤员敷伤，一个营长受了重伤，由勤务员背下来。勤务员泣不成声，天上敌机盘旋轰炸，但我们仍然照常紧张地工作着。

次日，师部下令撤出罗内，群众匆忙携带粮食，牲畜上山，我队与师卫生队同行。到一住地，未来得及用饭，又奉命连夜行军越过一座山。当时正值我疟疾发作，由队员扶我过山。Jensen医生的脚也扭伤了。第二天，我骑马行军，Jensen因脚扭伤，他说不能走了，要求把他留下。我说不能这样做，便把我的马给他骑。行军中由于突围，我们把器材及行李都丢了，日夜行军，门板当床，稻草作被，虽艰苦，但部队颇有纪律。

我们由岳阳经平江、浏阳到达醴陵。到醴陵后，正值我们在一家面馆吃面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敌机一颗炸弹扔在面馆旁边，把面碗给震落到地下了。Jensen镇静地说，不要惊慌，可见他是富有战斗经验的，他曾告诉我，他是一

个共产党员。行军途中还常常遇到敌机低空扫射，有时可以看清敌机上的驾驶员，低飞的飞机一闻其声即到面前，想躲都躲不及。就这样，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行军十七天，共计行程一千三百里，终于摆脱了险境，到达攸县。这次行军是对我队的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最好的锻炼。

这是湘北第一次战役，敌人攻至长沙后被迫后撤，我队又和四中队33医疗队等赶回长沙，做民众炸伤救护、预防霍乱注射、伤病兵灭虱及重伤员的医疗手术工作。第四中队部驻长沙卫生实验处内，33医疗队（队长唐文铭）驻湘雅医院为重伤员做手术，64队（队长刘廷杰）驻湘阴99军野战医院工作，53队（队长贾宗舆）驻平江十九集团军野战医院工作。我率领49队到湘北花桥第四军野战医院工作，主要开军医训练班，训练军医、军护人员。由总部派来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计苏华医生协助训练，此人很有才华。

（三）

1939年至1940年间，救护总部还派了曾参加马德里保卫战的东欧国家的医生们（其中有Jensen, Kaneti, Jungerman和Volkin等到49、53和64队协助工作，1940年，总队长林可胜曾到湘北前线视察。在烈日下赤脚步行，走路时不许讲话。日行百里，晚上和东欧医生们长谈，直到深夜不倦。他看到彭达谋大队长坐滑杆时，严加批评，立令辞去滑杆步行。每到宿地，总是自己动手铺床，挂蚊帐，而且反对带勤务兵。人们赞扬他精力充沛，体力过人，以身作则。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善于应用科学思维方法和干实际工作，而又多才多艺的人。他曾在缅甸救护工作撤退时为应急当过火车司机，开过火车。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我国处于存亡危急之秋，林可胜以一个国内外著名的生理学者、教授（曾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及生理学会会长）挺身而出，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任命为救护总队长。他在中外医界、科学界和华侨中都有很大的号召力，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许多爱国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和专家教授，华侨以及大量爱国青年自愿参加红会救护总队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救护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不长的时间内，逐渐发展到分布于九个战区中的九个救护大队。其中有医疗队，医防队、救护队等一百多个，医生五百余人，药师，护士、护理员、助理员、检验员等千余人。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医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来救护总队工作。一些国内外进步人士也支持他的工作，例如，我曾亲眼看到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在救护总部与他过从甚密。他还以国际著名学者及华侨身份从国外各界人士、华侨处募捐了大量现金、药品、器材、X光机、显微镜和数百辆的救护车（许多是华侨司机）。

林可胜总队长还派一些医疗队到解放区及新四军工作，并赠送大量药品器材，这是个很大胆的行动，因此（包括邀请一些东欧共产党医生来救护总队工作）他被控告为救护总队有赤化嫌疑而获罪。此外救护总队有许多青年人（流亡青年），爱国热忱，吃苦耐劳，不贪污、敢说敢做，也被认为赤化嫌疑罪名之一。据说，林可胜被蒋介石召见，宋美龄当翻译（林可胜的汉语说不好）。蒋问：“你为什么派队及送药给八路军及新四军？”林答：“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蒋厉声说：“这是中国”！嗣后国民党在贵阳救护总队部设政治部及特别党部，并在各大队设区党部以资监视，1943年林可胜被免去救护总队长职务。

我队在湘北前方首创酒灶式灭虱站及灭虱器为伤病兵及民众灭虱，简易价廉，易于推广，每站只用五十元。这对控制军民斑疹伤寒、回归热的流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得到救护总队的赞许。此后，我又兼任卫生署防疫办事处湘北防疫专员。1939到1941三年中，红会各队为前后方军伤病兵（主要）及民众灭虱不下五万人次，在一定范围内控制了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的流行，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在与国民党军队接触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腐败堕落。长官的营私舞弊，吃空额、武装走私，大吃大喝。有个师长曾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象他那样当师长，一切便都有了。士兵叫苦连天，士气低落，他是不管的。

1940年我被任命为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为彭达谋）。是年秋，敌人发动第二次湘北战役，我军向两侧撤退，敌人进入长沙，不久又退回湘北。国民党军此次败退，曾枪决一个不战而退的师长。此时，红会64、53、49等队与部队失去联系，我与49队退到浏阳。各队退至衡阳后又赶回长沙做预防医疗工作。此后，救护总队在前方各队又配置了10名运输兵。1941年，敌人发动第三次湘北战役，发兵进攻长沙，我军撤退两侧，诱敌深入。岳麓山国军炮兵轰击长沙，敌军退出。此时，红会各队与部队野战医院共进退，参加医疗救护工作。敌人一退出长沙，我们和33医疗队队长唐文铭不顾湘江布有水雷的危险，乘汽船回长沙开展伤兵医疗手术及民众防疫工作。三次敌人退出长沙，红会各队都是首先赶回长沙。湖南省卫生处处长张维对红会各队动作之神速表示钦佩。

八年抗战中，湖南省湘南、湘北、湘东、湘西如衡阳，衡山、湘潭、长沙、益阳、湘阴、平江、岳阳、浏阳、醴

陵、安江等地都驻有红会九大队各队。红会各队每到一地，都是住在民众家里，为民众免费医疗和预防，深受民众欢迎。各队队员与湖南老百姓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敌人来了，他们就帮助我们把药品器材等埋存在地下，他们自己带着粮食，牲畜上山躲避。在湖南，我到过四十多个县，湖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湖南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湖南人民朴素、诚实、直率、肯干、勇敢、富有革命斗争精神，抗日情绪强烈而顽强。敌人在湖南吃了很大苦头。湖南的妇女热情大方，特别是湘北妇女。我们曾住在湘北一个农民家里，我问这家的一位年青姑娘：“你们为什么待我们这样好”？她说：“我哥哥出外当兵抗日，我希望人家同样待他好”。一个不识字的姑娘回答的多好呀！湘北前方民间小饭店的女主人，总是给我们许多照顾，热情让位，给我们吃瘦肉不放大辣椒。

1941年，救护总队通令嘉奖第三次湘北战役救护有功的红会各队，并任我为红会第九大队大队长（驻在第九战区），第九大队为红会模范大队。这是各队全体人员通过长期锻炼，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不断克服困难，发扬救死扶伤创造性劳动的结果。九大队管辖第四、五两个中队（第五中队驻赣北铜鼓，中队长是罗盛昭），共计十多个队（其中有些队分为两个小队）。救护总队给了我们许多有力的支持，派来了各科指导员、视导员，周寿恺、周美玉、郭绍宗等都到湘北前方指导工作。此外并派交大毕业的工程师戴根法来九大队协助工作。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和惊人的服务精神的人，善走路，有“飞毛腿”的美称。我们在长沙设立重病室时，周美玉护理指导员曾亲自参与指导工作。

(五)

1944年4月间，敌人要打通南北国际通路，大举进攻湘北。5月间，红会救护总队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特派员蒋萝麟由我陪同到衡阳视察救护工作，印象很好。本来还要到广州视察，但汽车出车受阻，他说不吉利而赶回贵阳。

5月18日，敌人进攻长沙，我将湘北红会各队撤回衡阳，连同材料库和汽车队，一路向湘西，另一路向桂林撤退。我先和他们乘三辆救护车向湘西行驶，在湘江过渡时，遇国民党重型炮车后退把船台压垮。经多方设法，才修好船台渡江。到零陵时，遇到了九大队向桂林撤退的五辆救护车和几百辆汽车被阻在湘江之滨，江水大涨，两条渡船每次只能运载三辆汽车。人们争相渡河，因为天上有敌机轰炸。我们的救护车日夜不敢熄火，熬了两天两夜才渡过江去。五辆救护车满载着红会和卫训五分所贵重器材，工作人员及家属共一百多人。每人限带行李两件。我们到桂林时，桂林已疏散人口，全市商业闭门。有些商店奉送物品给我们，我们都一一谢绝了。

救护车和火车上的一部分器材及人员，好不容易到达金城江。这里是湘桂和湘黔铁路的连接点，金城江好象一个瓶口，金城江以上的铁路线坡度很大，以致不少火车，汽车和我们的救护车（由于缺油）都集聚在这里。这是一个小镇，火车站也很小，连日大雨，路上泥泞达尺多厚，河水猛涨，难民众多，厕所粪便溢流遍地，人们涉足于这种境地，鞋一两天就烂了。有个妇女上厕所后说：“我连眼都不敢睁开，一看就要吐。”那时，金城江霍乱流行，苍蝇满布在食品上，痢疾流行，难民中老弱者及幼儿多数死亡。我们红会队

在此为难民治病及进行预防工作，十分艰巨，天上敌机轰炸晚上弹药库爆炸，火光冲天，人们奔逃无路，到处都是哭声，金城江成了人间地狱。这种民族悲剧使我终身难忘。

汽车继续上行，火车拉不到十节车厢，类似爬行，许多人坐在车头上，可以随时跳上跳下。有时火车上不去，几百人下来推车前进。用人推火车，这在我一生中仅见过这一次。火车缺煤时就烧枕木，这样火车的马力更差，速度几乎与步行相同。沿途许多难民克服一切困难，奔向祖国后方，我亲身参与了这一民族大苦难，受了一生难忘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我深深感到，没有人民所拥护的政权和领导核心，一盘散沙的民族，必然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被侵略、凌辱、屠杀。

从广西河池到独山，美军小队破坏公路，汽车要通过不少弹坑，有时不得不开到火车轨道上。我们在一座燃着熊熊大火的铁路桥边受阻。大桥约长五十多米均已破坏，江中水深约一公尺，如何飞渡呢？有的提出走山路，红会中许多人也主张弃车走山路，我力持不可。山路多土匪，崎岖山路妇女，儿童如何走得？这几十辆汽车队中有工程人员，大家共同研究采取大桥两端削切斜坡，江底铺一枕木，汽车从斜坡下驶向江底枕木，再由对岸用汽车拖上坡。各汽车依次驶向江口，一天只能驶到对岸约十辆。好容易轮到我们红会救护车，驶到桥头等着过江，不料国民党军队勒令所有未过江的汽车驶回独山有公差。我情急生智，急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电报说，薛岳司令长官命我们赶往贵阳有重要任务。这些兵认不得几个字被我哄骗了，只放我们红会三辆救护车过江。

渡过江经马场坪勉强到达贵定，车辆便抛锚走不动了，急电贵阳救护总队请速派车来接。当时出发共有汽车约四百多

辆同行，到达贵阳的只有27辆。其中红会三辆救护车在沿途做了很多难民救护、医疗预防工作，每次总是最后在当地军警都走了之后才走，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局面。辗转六个月，于十一月份才到达贵阳，受到总队部领导及工作人员的欢迎。三辆救护车带回高倍显微镜30多架，X光机三台及其他器械，工作人员及眷属一行多人行李几乎丢失光了。

林可胜总队长见面时只对我说：“人比东西贵重”，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次难忘的经历锻炼了我，人民教育了我，敌人当了反面教员。中华民族坚持了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当年的义勇军进行曲，还在我们耳边响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回忆图云关

施正信

图云关一别瞬已四十多年了！回忆当时峥嵘岁月中的情景，不由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七七事变时，我正在英国深造。一九三八年底我学毕从美国回国，直奔抗日后方贵阳，拟在贵阳医学院任教。后考虑到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不如参加与抗战有直接关系的医务卫生工作，更为切实有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是当时唯一的辅助作战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民众组织，我就断然参加了这个组织。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后简称救护总队）是一个战争时期的组织。它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成立于汉口，旋因蒋军以保持实力为由，节节后退，救护总队亦不得不随着军事形势后撤。先迁长沙，再转移到祁阳，喘息未定，又后撤到贵阳图云关为最终驻地。

救护总队成立伊始，任林可胜先生为总队长。林氏出生于南洋旧英属马来亚的新加坡市，攻医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专门研究生理学。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科主任、教授。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华侨，又是一个生理学家。他在协和医学院十余年来（1924—1937）培养了不少医师。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方兴未艾，军事占领得寸进尺，林先生数次组织志愿救护队为我国抗击日寇侵略而战的伤病战士服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放弃教授职位，投教从军，出任救护总队长职。林氏在学术

界声望颇高，他的爱国热忱，见义勇为，感人肺腑。因此，他的号召力极强，国内外的爱国志士，都愿意投奔救护总队部，在林先生领导下，抱着同仇敌忾的心情，抗战到底的决心，各自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谈到贵阳图云关时只说救护总队部是不全面的，还有设在救护总队部毗邻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以后简称卫训所），所长亦由林可胜先生兼任。卫训所隶属于当时的军政部，是一个军队教育机关，它还附设一个教学医院——167后方医院。在图云关这两个机构，俨如一对孪生兄弟，相依为命，难解难分的。现分别叙述这两个机关的情况如下。

救护总队部在图云关

图云关位于贵阳市东五公里黔桂公路上。它在救护总队部未迁入前是一个植林场地，公路两旁及其附近的山谷地带栽植了洋槐等树。关的顶点住了十几家居民、小商店和小饭馆一家。所以在救护总队部决定由湖南祁阳迁移至图云关“定居”之前，它一无现存的房屋可以利用，完全需要平地起家，一切房屋——从办公室、材料仓库、汽车库与修理厂到职工宿舍，公共食堂和集会礼堂，都得一砖一瓦地盖起来。而当时当地砖瓦等建筑材料比较缺乏，并且造价高，速度慢。只好用芦苇或秫秸代瓦铺盖屋顶；用竹片编成墙板，内外涂泥加刷石灰水以代砖墙；泥土加石灰砸实为“地板”。宿舍用双层木板床，照明用灯草浸菜油。贵州气候阴天多，降水量大，以上述建筑材料造的房屋，一不御寒，二则屋外已停止降雨，屋内还在滴水！救护总队部的药物器材设备材料库及运输汽车库，都分布在公路两旁附近以便车辆的出入和装卸。卫训所的建筑如教室、礼堂、医院等均设置于离公

路稍远的山谷、盆地上。

救护总队部的组织、任务概况

救护总队部设总队长办公室（主任：蒋旭东医师）附秘书组医务股（主任：荣独山医师），材料股（主任：陈璞药剂师），运输股（主任：胡惠林），总务股（主任：张祖棻医师）。总队长聘任若干专科指导员供其咨询之用，如内科指导员（周寿恺医师），外科指导员（张先林、屠开元医师），医防指导员（容启荣、施正信医师），环境卫生指导员（过祖源、刘永懋卫生工程师），爱克司光指导员（荣独山医师），护理指导员（周美玉、孙秀德护士），社会服务指导员（邹玉阶）。医务股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总队长组织各种医疗卫生队如医疗队（包括手术队）、医防队、护理队、环境卫生队（包括灭虱治疥队（D.B.S））。一个医疗队大约有十余人，内包括二、三名内外科医师，护士及助理员若干人，庶务员一人，由一名医师为队长。医防队的医师要有较专门的防疫学知识和经验，并且配备一名环境卫生员协助工作。队组成后，带了所需的医药器材设备，乘卡车前往已经接洽好的兵站或后方医院协助工作。

总队部下设四个大队，分驻当时的各个战区，配合军事需要进行医疗防疫工作。四个大队的分布是：华北大队部设在陕西西安（大队长：蔡福恩医师），华中在湖北恩施（大队长：彭达谋医师），华东在江西弋阳（大队长：汤蠡舟医师），华南在广西桂林（大队长：朱润深医师）。有的大队部下设中队，中队下有区、队若干队，统由大队长直接管辖和指导。大队部附设材料分库及运输卡车一、二辆，专为输送伤病兵员及医药器材物资之用。

材料与运输

救护总队的医疗卫生队所需的药品器材设备，均由图云关总部供应。当时后方生产的医药器材十分缺乏而昂贵，救护总队的医药物资除少量在国内购制外，绝大部份是海外爱国华侨赠送的，或以他们的捐款从国外购买来的。捐赠的药品中最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从印尼（爪哇）华侨捐赠的大量治疟疾的奎宁药片（金鸡纳霜），因为当时部队中士兵患“打摆子”病是司空见惯的。四十年代时奎宁还是防治疟疾最有效的药物。我国未种植金鸡纳树故不生产奎宁，此药物全靠进口。其他如磺胺类抗菌药物，国内不能生产，必须从国外进口。当时抗战形势、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全部沿海省分的工业城市，剩下的川、云、贵等后方几省工业落后，物资十分缺乏，医药方面，更为如此。救护总队幸亏获得海外捐赠的物资，才能藉以进行救护工作。

当时海外捐赠的物资如药品、器材、设备、救护车、卡车、修配部件等物，只能从海外水运到我沿海港口，再从此经陆路运到内地——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而我国沿海港口全被倭寇占领，只有香港尚可为转运点，直至1941年12月25日香港向日投降为止。从香港到贵阳图云关，必先经水路到越南的海防港，然后由陆路经友谊关进入我国广西，继由公路向北行，经南宁、柳州、河池入黔南。还有一条线是由香港经西江（珠江西支）西端的梧州入广西境，然后由公路经柳州、河池等地入黔南。第三条通内地的交通线，是经过越南从河内到云南昆明。红十字会的物资材料大部分是经第一条线运路到图云关的。可见救护总队部所拥有的捐赠物品的一块纱布、一颗药片都是从海外费尽心血运到图云关的，是来之不易的。一九四一年冬日寇侵略军向南延伸，香港、越南

相继陷落。上述交通线全被切断。只有缅甸北部通往云南西部的缅滇公路，是我国内地与外界唯一的陆上通道。物资的运输更加困难了。

材料股接到运输股运来的海外捐赠的医药器材，即行验收分类入帐，然后分别制成“标准包”，即将药品、器材、设备按其性能或用途分别制成一个标准包装，用一编号标志之。例如内服用药为C₁，换药用药为C₂，麻醉用药为C₃…换药用包扎、敷料为D₁，手术用垫单衣帽为D₂，石膏绷带为D₃……诊断用器材为E₁，手术用器械为E₂等等。标准包制度曾在部队应用，便于申请、携带、和分发。标准包制成后即分送各大队部材料分库，俾便各医疗队就近申请、提取和应用。

伤病动态

蒋军的战略是以守为主，不战而退，与敌军接触不多。故在军医院内患病者多于负伤者。在华中、华南一带，士兵中所患的疾病以细菌性痢疾、腹泻、营养性水肿、贫血最为常见；华东、华南一带则疟疾比较猖獗；而在北方伤员中患斑疹伤寒者较常见。于是救护总队在华北提倡“灭虱、沐浴与治疗”（D.B.S）计划。这对斑疹伤寒的控制有一定的作用。伤病士兵中常见骨瘦如柴、弱不胜衣，拿着一根竹竿的跛行者；或面黄肌瘦、全身浮肿者；或脸面苍白而浮肿者，这些病症都是程度不同营养不良的象征。蒋军士兵的粮饷已甚低微，而当时上级官员克扣军饷的事是人人皆知的。饮食不足，营养不良的体质加上腹泻、痢疾等病，使小肠吸收力差，恶化的病症接踵而来，使这些可怜的患者成了行走的活骷髅。在北方地区由于个人卫生的欠佳，伤病士兵中身患

疥疮者亦相当多，长虱子者更司空见惯，所以流行性斑疹伤寒（虱传者）多见于北方亦是理所当然的。

“西班牙大夫”援华

1939至1940年间，有来自欧洲的二十余名“西班牙大夫”到图云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法西斯战争救护工作。因为他们参加过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共和国派一方面（对方是佛朗哥保皇派），所以当时图云关人士都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他们的国籍为奥地利、保加利亚、波兰、德、捷克、罗马尼亚、苏联、匈牙利。他们大都是犹太族人，是民主派，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都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内外科医师，年龄在三十、四十左右。他们到达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后，经过短期休息，介绍情况，就整装出发，分派到各大队的医疗队内工作。他们都勤勤恳恳地和我们医疗队人员同甘共苦地为伤病兵员服务，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救护总队结束后才回国。他们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感人肺腑。

政治部的活动

红十字会的原旨是为战场上的战士救死扶伤，敌我不分，一视同仁。后来这个红十字精神被延伸至平时和平民，并且用红十字这个标志作为医务的象征，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应用。林可胜先生也是本着这个精神办事。对于国外爱国华侨捐赠的药物，是为一致抗日用的，在国内也不分彼此，凡是抗战的军队均可享用它。而当时国民党当局明则共同抗战，一致对敌，暗则反共、防共不遗余力。于是于一九四一年重庆派来了一个政治部（主任：王洽民，东北人）常驻图

云关，专为图云关的救护总队部及卫训所的职工进行政治思想的教育及辅导。它的活动包括在职工中分别组织学习小组，按期开会学习三民主义及其他孙中山先生的遗著。每星期日上午做“纪念周”讲解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时事问题和传达重庆中央政府的指示、训令等。还办理集体签名入党、集体结婚等事项。这些只能是明修栈道的伎俩，实质上政治部是来监视图云关工作人员的行动的。

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

尽管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部队所做的医疗卫生工作有一定的成绩，起了有益的作用，在中国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的创举。但是，毕竟它的力量 and 作用是有局限性的，是暂时的，是辅助性的。部队的卫生业务要依靠它本身的军医组织。旧中国的军医组织本来一向很薄弱，一缺合格的军医，二缺充足的医药卫生设备。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铺开，军队数量大增，合格的医生护士无法招募，只好以不合格的医护人员补充，滥竽充数，结果哪能不影响伤病兵员的康复。但是战争的需要是急不容缓的，培训正规医护人员需时太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唯一的应急办法是给这些在职医护卫生人员快速的补充训练。卫训所就是为此而设的。

卫训所主任由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先生兼。卫训所设大队部，专业学组八个：内科、外科、防疫、护理、环境、卫生、眼耳鼻喉科、病理检验科、爱克司光科。学组的主任和高级教官大部分由救护总队的专科指导员兼任并授予军衔。调训班分：军医（医疗）、军护（护理）、卫生防疫、卫生工程等。学员由各战区内的兵站及后方医院的在职军医和军

护调训。训练期间：一至三个月。训练方法：多实习、多示教、最少限度的理论，以期快收实效。卫训所附设167后方医院为教学医院，有床位两百余张。为了教学需要，病人教材可从前方医院的伤病兵员中挑选适当患者，运回图云关后方医院。

综观当时的图云关，在地理上全由救护总队部和卫训所两机关的职工人员所占用，高峰时达二千余人（包括一部分眷属在内），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那时，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人们毫无怨言。工作是紧张的，但人们都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精神上是愉快的，可以说当时聚集于图云关红十字会旗帜下工作的人员，虽然来自四方，各有不同的背景、爱好、信仰，但都怀着同仇敌忾的心情，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衷共济、全力以赴地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荣独山教授谈红会救护总队

朱崇演 张建军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于一九三七年底在武汉成立，一九三八年五月台儿庄会战后搬到长沙，后又曾一度迁到湖南祁阳。一九三八年底，西迁到贵阳南郊的图云关。荣独山教授在一九三七年底随中央医院到武汉的，这时救护总队成立X光队，荣负责筹组了这个队。从此荣参加了救护总队的工作，随队迁到贵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离开。开始，救护总队医务股的负责人是柳安昌和李宗恩，他们离任后，到贵阳由荣接任医务股长。每当林可胜博士离开贵阳时，都是荣教授代理总队工作。为了征集红会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我们在上海中山医院放射科的大力协助下，找到了荣独山教授。荣老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谈了以下情况。

一、救护总队的概况

救护总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它不属于国民党的军队系统，也不属国民党政府的卫生系统。由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力量非常薄弱，而救护总队又有较好的医疗条件，经常派人到国民党军队的兵站医院和后方医院去工作，就形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后来，为便于配合行动，救护总队下属的救护大队，曾按国民党军队的战区来配备；但它们与各战区没有隶属关系。

救护总队下属有四个股：

一、医务股。这个股先是领导若干医疗队和医护队，每个医疗队配备有医生三至四名，还有护士、助理员、厨师等，每队约二十来人。这种医疗队被派到前、后方医院，自己带药品、器械去开病房作手术。医护队则是以护士为主组成、没有医生，是派到后方医院去作护理工作的。救护总队迁到长沙后，改为组织救护队，每队有一、二名医生，还有助理员等，分别派到各兵站医院。当时这种救护队约有三、四十个，主要分布在第三战区。救护总队迁到贵阳图云关后，还建立了防疫队，灭虱队等专业队。到一九四三年底，林可胜离开救护总队时，救护总队下属的救护队已有八十多个。

二、材料股。这个股主要管理药品、器械。当时，国外捐赠的药品、器械等数量大，质量也好，作为盟国的美国，也给救护总队提供了不少物资。材料股的同仁，对物资的管理、分配作了改进。他们分门别类作成标准包，使物资轻便、易于运输。由于外来支援的物资越来越多，曾经建立了很大的库房。

三、运输股。这个股有汽车二百多辆，不仅有运输队，还设立了修理所，技术力量很强。运输股的任务，主要是运输救护队需要的人员、装备、也运送伤兵。当时，国民党军队运输力量很弱，有伤病员也运不下来，因此依靠救护总队的运输队来解决问题。

四、总务股。这个股主要是管被服、给养。救护总队当时的服装是灰布做的，戴的是船形帽，夏天多穿短裤，冬天有大衣。这是救护总队自己制发的“队服”，不是军装。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后来在各战区的救护大队，下面

也设立了材料、运输等股。

从当时情况看，救护总队具有三个优势：一是医护人员水平高，特别是各队的医生，都是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有的是国内有名的专家，如搞骨科的屠开元教授等。二是药品、器械丰富，不仅国外大量支援，救护总队自己还可以制造一些药品、配料。三是运输力量强。上面说到二百多辆各种车辆，经常奔驰在各地，一些知名的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等，都曾使用救护总队的运输工具，来往于川、滇、黔各地。由于以上优势，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中，为救治抗战负伤的将士和平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总队长林可胜

林可胜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儿子，留学英国，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夫人是英国人。一九二五年他在协和医院任教授，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人。

七·七事变发生后，红十字会在南京开展战地救护工作。这时，林可胜正在休假，便到南京参加救护工作，从此，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底，他连续在救护总队工作了六年。由于他的努力，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他很信赖，纷纷给予支援。可以说，林可胜对救护总队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

林可胜离开救护总队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三年底，我国组织远征军到缅甸作战，国民党当局指定叫他带医疗队参加。后来远征军一度战事失利，林被切断退路。他辗转经由印度、缅甸回到重庆，迫于当时环境，于一九四四年辞去了总队长职务。

从荣与林可胜接触的情况看，他是有爱国心，有正义感

的。救护总队的工作，在林的领导下，既为国民党中央军的战区工作，也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区服务。记得在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林可胜在长沙组织了四个救护队，派车运材料到延安。后来，他还到香港接受了一批国外左翼人士捐赠的药品、器械，直接运交了白求恩医院。为此，他曾受到指控，说他亲共。他据理反驳说：这是人家指名叫交给白求恩医院的，我不能违背国外友人的委托。再一件事就是当时运输股的一个修理所内，藏有许多进步的宣传册子，被发现后抓了几个青年人，林可胜和荣去保了出来，这也引起了当局的不满。当时在重庆的红十字总会是王正廷在负责，曾把林叫到重庆去质问，林从重庆回贵阳时，又被军统局的人弄走，后来是通过陈诚把他保出来的。

前面说到，救护总队有着人强马壮的三大优势，特别在抗战时期，“西药”价值十分昂贵，有些人看到救护总队大有油水，就想方设法攻击林可胜。除了攻击他亲共外，还造谣说他贪污。国民党当局曾派当过何应钦老师的李英华来调查。

一九四三年底林可胜去远征军后，工作由荣代理。按照林的作法，荣也曾将大批奎宁丸交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红十字总会派人来，要荣将工作和物资移交总会。荣坚持说：救护总队的工作是林总队长交给我代理的，不是红十字总会委派的，我要对总队长负责，不能交给你们。”开始，他们想拉拢荣，说荣交出来就叫荣当总队长，荣坚持不干。软的不行，他们就施加压力。为了以防万一，我当时将钥匙交给一个英国人保管。顶了很久，终于在高压下交了出去。

一九四四年林可胜脱险回来后，辞去了救护总队队长职务。荣也跟着辞职，和林一起到军政部办的战时卫生人员训

练班（也在图云关）任教。同时到这个所的，还有一批人。

三、访问后记

荣独山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由于年事已高，听觉已不太好了，我们提出的问题，都是写在纸上请荣老回答。在谈到对红会救护总队的看法时，荣老说了下面一段话：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是拥有数以千计的医药卫生人员的组织，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这些人为了救亡图存，毅然走上了以自己的技术知识为抗战服务的道路，这是爱国主义的壮举。有的人还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是非颠倒的十年内乱中，参加救护总队工作的同仁，绝大多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是极不应该的。当时，我们许多人为了抗日救亡，不图名，不图利，奔波忙碌，救死扶伤，这种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党中央英明正确，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救护总队的史迹得到如实反映，这是令人高兴的。我现在已八十五岁了，能看到这样好的局面，深为满意。只是年事已高，当年的一些情况只能说一梗概，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一起来回忆这一段历史，以昭后世。

经我们约请，荣教授曾答应要亲自写一篇回忆录。但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尚未写成，先发表这篇访问后整理的文章。

——编者

红会救护总队在贵阳

于怀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军奉命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节节进逼。七·七事变后，华北沦亡，京（南京）、沪告急，国家垂危，群情激愤，国内外中华儿女无不想力挽狂澜，为国效力。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汉口成立救护总队，由原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教授、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林可胜（Robert Li m）兼任总队长。林可胜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自幼在海外读书，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协和医院任生理系主任教授，据说这是第一位在协和医院担任主任教授的中国学者。他与一位英国妇女结婚，以后也加入了英国籍。早在救护总队成立之前，当日军侵犯我长城要隘喜峰口与古北口时，冯玉祥将军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曾奋起抵抗，当时林可胜曾组织医疗队奔赴战场参加救护。

“七七”事变之后，林可胜自北平率领部分专家、教授、医务人员南下沪、汉，筹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

救护总队部内设医务、材料、运输、总务四个股（因红十字会系群众组织，不用政府体制），会计室则直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当时的医务股主任为柳安昌（生理学教授），材料股主任陈璞（原军医学校药科主任），总务股主任张祖棻（眼科专家），运输股主任胡会林。总队以下在医疗方面设医疗大队、医疗中队、医疗队；在医药器材方面设卫生材

料总库、卫生材料库；在运输方面设汽车运输队、骡马运输队和汽车修配厂；总务方面设被服厂、物品仓库。

由于蒋军节节败退，武汉紧急，总队部成立伊始，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迁到长沙。在长沙立足未稳，又于十月由长沙迁祁阳。继迁来贵阳，即以南郊图云关为驻地。图云关群山起伏，地势险要，交通既方便，又可避免敌机窜扰，因而得以长驻至抗战胜利。到达图云关后，医务股则由放射学专家荣独山接任，柳安昌到贵医任教。

中国红十字会因系群众组织，国民党政府既无经费资助，又无医疗药品、器材拨补，全凭林可胜在海外募捐维持。由于林可胜出身华侨，又是著名学者，在海外侨胞中颇著信誉。同时由于海外侨胞爱国心切，既愤恨蒋介石的丧权辱国，又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祖国大地，因而纷纷组织爱国援华机构。例如巴达维亚华侨兄弟援华会、马来亚华侨医药援华会等组织，大声疾呼为国捐献。当时所捐献及购买的医药、运输器材，以及救济物品，均指定交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收。国际医药援华会还按期拨给救护总队部分经费，并派来一些曾经参加过保卫马德里（西班牙首都）的外籍医生到救护总队服务，这些人在中国服务二、三年后才陆续回国。此外，还派了一部分华侨青年司机，回国协助运输工作。作者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在卫生材料总库工作时，接收过大批药品器材，再按照药品器材标准表装箱，运往前方供各医疗队使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使海外侨胞的一片爱国心血，撒遍祖国大地。

当时仅在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即有工作人员上千人，各种运输车辆上百辆。那时贵阳地区满足不了总队部人员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总队部经常定期派汽车去安顺、惠水（当时称

定番)购运菜蔬和粮食。林可胜在领导救护总队繁忙工作之余,还关心工作人员的私生活。一九四一年元旦,他组织了一次轰动一时的集体结婚,林可胜本人当证婚人,参加者有八对夫妇,参加者除个人生活用品外,一切由总队部代办;来祝贺婚礼的亲朋至友,不论属于那一对新人的,统一由总队部派人接待,每人只收贺仪五角,如有直接送礼品给结婚者本人的,则结婚人代交五角给接待委员会。结果在结婚宴席中,有宾客上百桌,总队部负责派汽车接送,盛况空前。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以下辖四个医疗大队,大队以下为医疗中队,中队以下为医疗队。此外,还成立了一些专业队,如手术队、防疫队、护士队、运输队(运输器材和转运伤病员),等等。以后各专业队都编为医疗队,但有的队技术力量较强则保持手术队,防疫队等专业性质。医疗队的一般编制为医生三、四人(其中一人为队长),护士数人、助理人员数人(根据工作需要而定)。接近前方的队,还配有运输人员,以便于挑运药品器材和转运伤病员。当时,每一大队还配备汽车一至二辆。

在一九四一年左右,第一大队设在湖南邵阳,大队长董秉奇、彭达谋(协和医学院);第二大队设在江西弋阳,大队长何鸣九(同济医学院);第三大队设在湖北均县,大队长马家骥(协和医学院);第四大队设在陕西西安,以后改为太行大队,大队长潘作新(原军医学校医科主任)。太行大队曾派了两个医疗队到陕北去,其中一个队长为墨树屏(协和医学院)。各个大队负责配合所在战区,为前线部队或医疗单位派遣医疗队,协助作战部队或医院做战场救护和防疫工作,也有的深入部队野战医院或伤兵转运站工作。服务范围包括裹伤,包扎、固定、清创和手术及短期治疗等。

因为红十字会医疗队既是义务服务，又自带药品器材，深受当时军民的欢迎。

在药品器材方面，材料总库设在图云关，总库长由陈璞兼任。下分五个组，即药品组、器械组、敷料组、制造组、总务组及仓库。前三个组负责点收自海外运来的药械敷料等医疗器材，清点后报请材料入帐，并由救护总队给援助单位出收据，然后整理装配成标准箱。材料分库多接近战区配合医疗大队或医疗中队行动，它们接收由总库装配的标准药、械、敷料箱并负责保管及分发，极为便利。分库除分库长外有库员（技术人员）一至三人及其他辅助人员。直接听从救护总队指挥。

华侨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汽车，大部分为卡车，也有部分为救护车。救护车的车身上都以大字标示捐献地区或单位的名称。如马来亚、吉隆坡、新加坡、槟榔屿等等，在国内各地开行，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红十字会的汽车队都是为运送医药器材、工作人员和接运伤病员之用，在前方也大大鼓舞了士气。所以，当时各地军民看到穿红十字会制服的人，无不表示欢迎。

一九四一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发生怀疑，藉口曾派遣医疗队去陕北，勒令林可胜总队长去重庆说明情况。据说除此之外，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某些领导人，曾企图将海外捐献材物，由他们接收，再转发给救护总队。由于捐献组织都是指定由林可胜接收的，因此林可胜不同意这样做，以致引起中国红十字会上层官僚人物的不满。于是他们与反动政府相勾结处处对林可胜刁难。一九四二年即改任潘小萼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林离开贵阳去重庆后，盛极一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就逐步衰落下

去。林可胜不熟悉中文和中国语言，在重庆通过商震与宋美龄的疏通和美国友人的支持，才未被调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一九四三年林可胜辞职，当时大部分高级医务人员相继离去。总队长职务由胡兰生、汤鑫舟相继接任，维持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往上海，随即解散了。

后一段情况，作者不够清楚，望知情者补充。事隔多年，记述有不符事实或错误之处，希批评指正。

本文承陆衡文、张俊德等同志提供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上接100页）

队设湖北恩施，任西北区救护之指挥；第三大队设福建邵武，任东南区救护之指挥；第四大队设贵州独山，任中区救护之指挥；预备大队设贵阳，控制医疗队若干个，以资策应，支援各部。

救护总队部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南京，胜利的完成了抗日战争中的医疗、救护、医防等工作任务，为抗日战争立下不朽功勋。

红会救护总队的组织简况

王化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向我国发起全面进攻，从而也就爆发了我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救护总队及所属各医疗救护大队、中队、区队的全体人员，在战场救护、医疗及医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情况，现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及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组织状况，综理汇集，但这些资料多是参阅历史档案整理编辑，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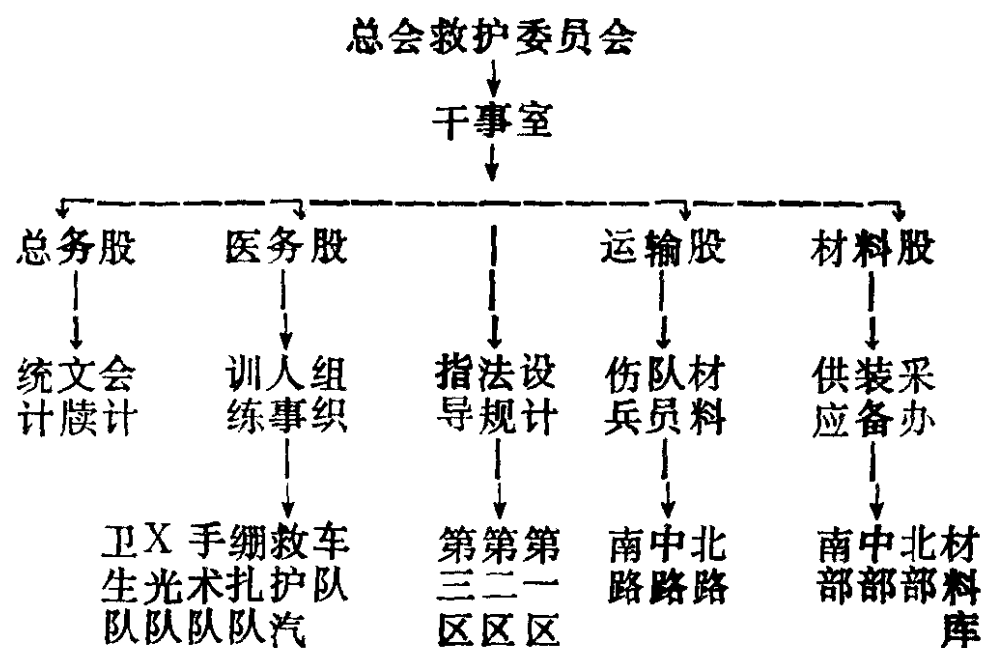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的组织状况和活动情况。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根据抗日战争战区战伤救护、医疗、医防的需要。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决定成立总会临时救护委员会。救护委员会主席是王儒堂，委员有杜月笙、刘鸿生、王晓籁、林康候、钱新之、刘月如。总会并聘定林可胜为救护委员会总干事，负责全面综理医疗救护事业，而以彭达谋、张祖棻、陈璞、胡会林、柳安昌、杨崇瑞、高家聚等担任干事，分办各主管事宜，协助林可胜总干事进行

各项工作.

救护委员会的组织、人员及活动情况附表

(一)、救护委员会的组织系统表



总会救护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成立，总人数有八百二十七人，其中干事室有十一人，总务股九人，医务股七百零二人（其中包括各队人员），材料股三十二人，运输股七十三人。

(二) 救护委员会各类人员统计表

		主任	医师、 习练 医师	药师、 剂生 药	医 护 员	医 护 助 理 员	技 术 员、 事 务 员	总 计
干事室	男	1	10					11
	女							
总务股	男	1					8	9
	女							
医务股	男	1	83	12	77	116	181	480
	女		6	1	141	72	3	222
材料股	男	1	9	7			12	29
	女		1	1			1	3
运输股	男	1					72	73
	女							
总 计		5	109	20	218	188	277	827

统计时间：1937年12月

队类别	数量
医疗队	28
医护队	20
救护队	7
医防队	6
X光队	1
总 计	62

各队按其在省份之分布表

省 份	陕 西 省	湖 北 省	湖 南 省	江 西 省	广 东 省	广 西 省	浙 江 省	卫 训 班	材 料 总 库	X 光 队	总 计
队数	7	10	9	17	7	2	2	6	1	1	62

当时救护委员会还设有材料库八所，运输汽车队十二队（计卡车六十辆），船舶队四队（计小火轮二只，民船十九只）。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的组织状况及分布情况。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根据抗日战争战区不断的扩展，为了集中救护、医疗、医防的事业，为了组织和搞好各战区的战地救护和医疗工作，更便于集中领导与管理。特将有关救护、医疗事业之人员，器材及运输工具等，改组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

救护总队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迁来贵州省贵阳市，救护总队部设在贵阳图云关。当时救护总队总队长是林可胜（一九四二年又由总会秘书长胡兰生兼总队长）。总队部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下设医务、运输、材料三课，总务处下设文书、人事、庶务三课，各课以下视业务繁简各分设若干组。当时总队部下还设技术室一个，技术室内设指导员及视察若干人。另总队部还设秘书若干人，分管机要、文电及总队长、副总队长交办事件。

抗日战争中期，由于战区不断扩大，救护总队人员随之也不断的增加，为救护事业的需要，总队部将原来两处六课，改建为一室四股，即总队长室、医务股（后改医务处），材料股、运输股及总务股。当时总队人数已达一千二百七十人。救护总队人员分配详见附表。

(三) 救护委员会各医疗队、医护队分布表

医疗队、医护队数量统计表

总会救护总队人员统计表

组 织	人 员 数	高级 医师	医 师	医 护 员	医 护 助 理 员	药 师、 司 药	非 医 务 人 员	总 计
总队 长室	男	2	8				3	13
	女							
医务股	男	1	126	133	124		179	563
	女		12	186	258		40	496
材料股	男	1	1			10	32	44
	女					2		2
运输股	男	1					133	134
	女							
总务股	男	1					16	17
	女							
总 计		6	147	319	382	12	404	1270

统计时间, 1944年

医务股人员包括医疗大队、中队、区队及手术队等人员在内，运输股包括各运输队。

救护总队以下还设三个诊所，一个疗养院，三个战区医院，各地还设有民众诊所。

救护总队根据抗日战争战区之需要初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派赴八路军服务，大队长墨树屏；第二大队设湖南邵阳，大队长彭达谋；第三大队大队长汤鑫舟。救护总队部从武汉撤离后，医疗、救护、医防等则以战区划分四个战区建立四个大队，每个战区一个大队。

一九三九年二月救护总队部迁来贵阳图云关以后，为了加强战地救护、医疗、医防等工作，医疗大队增加为九个，中队四十个，区队九十四个，手术队九个。救护总队各大队、中队、区队及手术队，均以战区划分，每个战区配属大队一个，每个大队辖中队五个，每个中队设区队二个。1939年救护总队各大队分布情况是：第三大队驻福建邵武，大队长刘培；第四大队驻广西柳州，大队长舒道隆，第五大队驻湖北均县，大队长马家骥；第六大队驻湖北恩施，大队长董先奎；第七大队驻广东曲江，大队长钱惠伦；第八大队驻四川重庆，大队长王先麟，第九大队驻湖南长沙；大队长林竟成；第十大队驻云南昆明，大队长钱崇恩；预备大队驻贵州贵阳，大队长冯玉汝。预备大队设贵阳主要是便于全国机动使用，当时预备大队在贵阳辖中队十个，区队若干个。

救护总队一九四五年遵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裁员简政的原则，实施裁编，重新调整了医疗大队的部署，决定全国设四个大队。第一大队设昆明，任西南区救护之指挥；第二大

（下转93页）

在红会救护总队部的回忆

汪犹春

访问史沫特莱

一九四〇年春，美国进步作家兼《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埃裕奈斯·史沫特莱来到贵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进行采访。时值林可胜总队长去抗日前线视察，调整救护工作。经代理人外科指导员兼卫生人员训练所副主任张先林、总队部总务股主任张祖棻招待，安排在北山“马来亚”别墅休息。这是一所由南洋群岛爱国侨胞捐款建造赠予林可胜私人的，内有办公室、会议室和宿舍。一个周末的傍晚，同事老沈来通知我，说已约好几个青年医护人员，利用夜里空闲时间去访问史沫特莱，欢迎我也同去。听了有这么个难得的好机会，我是多么高兴啊！从中外报刊上，我久仰她的大名。她是一位国际杰出的民主人士。她以记者的身份向全世界报道揭露日本法西斯惨杀无辜的中国老百姓，用刺刀把中国儿童挑起来取乐，虐待俘虏，破坏国际公约，狂轰滥炸红十字医院等等暴行。她呼吁各国人民伸张正义，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当夜，我准时上了北山，见到老沈、高忻、丁绶梅等几人，已聚在会议室等候。一会儿功夫。听得里屋打字机声停止了，从里面走出一位身材高大，剪着短发，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的女士，她含着笑迎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爽朗地

用北京话说着：“请坐，请坐，不要客气。”老沈向史女士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说：“这次您是从皖南新四军驻地远道而来的，我们首先向您慰问，向你致敬。我们这些年轻人身在大后方，很想知道前方的一些真实情况。我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不必翻译，直接用英语交谈，节省时间。”

下面是史沫特莱女士讲话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在皖南对日、伪军作战是很艰苦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实质上是奉行蒋的“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招。他和敌伪勾勾搭搭，按兵不动，使新四军受到种种牵制，我在那里采访到一些坏消息，也可能是谣传，说蒋介石有意要新四军撤退到长江以北地区，由国军接防。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有新四军存在，国军不便与敌伪勾结、和平相处，所以，对此应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接着又谈了新四军官兵一致，民主的生活，与当地老百姓亲密往来，帮助贫苦农民做好事等情况。末了，又讲她这次离开皖南时，由军部派了一小队人马护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过了江，然后独自绕道来贵阳等。

最后有人要求她给我们留个临别赠言，以作纪念。她欣然赠言：

“你们是中国红十字工作者，除了做好本位工作，要关心国家大事，认清形势，宣传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只要能够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抗日主张，团结一致，反对投降，同心协力，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史沫特莱的预测，后来果然成为事实。一九四〇年十月，蒋介石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

八路军在一个月內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负伤被俘、项英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记红十字会工作者书报供应社

一九三九年秋，贵阳南门外图云关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和卫生人员训练所（简称卫训所）两个单位的年轻工作人员，都痛恨日本法西斯强盗的侵略暴行，深感中华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而重庆政府却抱投降主义，推行“安内攘外”诡计，企图迷惑人心。在一次十数人聚会闲谈中，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自发办个“书报供应社”，开展宣传活动，使大家树立起抗战到底的坚强信心。这个倡议，得到了极大多数年轻人的拥护。大家的劲头可大啦！从确定宗旨到社员登记，推选干事和各活动小组负责人，募捐图书，及呈报主管要求支持并拨给活动场所等等事宜，很快就办理就绪了。

“红十字工作者书报供应社”宗旨是：

1. 做好前线浴血抗战将士的救死扶伤工作。
2. 宣传抗日到底。
3. 加强学习时事，关心国家大事，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4. 提倡正当文化娱乐活动。
5. 发挥团结友爱精神，支援救亡工作。推选社干事七

人，

沈经农、蔡书祥、黄豪、周新初、李波、王学明、汪犹春。

各活动小组负责人：

时事座谈周会：沈经农、蔡书祥、歌咏组：李波。

话剧组：汪犹春。图书管理：伍骏、周哲。宣传：

王学明。财务会计：周新初。总务：黄豪。

诸事齐备后，大家敲锣打鼓庆祝书报社的成立。

首先开门大吉的是图书室。运输股两位女同志伍骏和周哲把上千本捐赠来的和新买的书刊编号登记，整理得井井有条。

歌咏组特别活跃，李波教歌特别卖力。

这边唱：“暴敌欺邻，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

“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那边接：“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边是故乡……”

“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在图云关的高山峡谷里，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云霄！

话剧组的任务也不轻，限于人力、物力，特别是男女演员成问题，只能排演独幕剧。我们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夜光杯》、《抽水马桶》、《一个厌战的日本军官》、《当汉奸的下场》等话剧。女演员较少，只有运输股伍骏、材料股李卓忱和教导队女护士金小姐。我们每逢节日或卫训所举行医护人员进修开学或结业典礼时，在联合大礼堂演出，大部分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公演。有一次，我在《抽水马桶》里扮演男主角（护士金小姐扮女主角），我爱人带着

孩子坐在前排看演出，我那五岁的男孩认出了穿西装的我，就大叫“爸爸”！弄得哄堂大笑。

每次周末的时事座谈会都开得相当成功，使参加者增长了不少知识。记得有一次讨论“为什么说坚决打持久战才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座社友发言热烈，各抒己见，进行争辩，最后才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座谈会上，沈、蔡两位组长善于引导启发，又预备有广泛充分的资料，因而受到社员们的欢迎。

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很出色，如总务黄豪，在争取主管领导支持并拨给一栋房屋作为社的活动场所，以及话剧演出所需道具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财会周新初不仅帐目清楚，还想方设法节省开支，凡能临时借用的东西，就不添购。

王学明的宣传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〇年春节，经他大事宣传鼓动后举行的集体婚礼。总队部和卫训所十对青年集体举行婚礼时，他请了总队长兼主任来证婚。又主张由书报供应社代办大众化酒席——每桌八人，菜八大碗。大家喜气洋洋，向新郎新娘祝贺，整个婚礼热闹非常。那时这样的集体婚礼在图云关还是首创。

书报社成立后，确实起到了团结和教育青年社友的作用。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在国难当头时，热爱救死扶伤工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业余时间努力学习，你帮我助，相互促进，社友之间情同手足。我们的生活既严肃紧张，又心情舒畅。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以“协助”为名，派王治民等人来我红十字救护总队部成立政治部，将我“红十字工作者书报供应社”封闭，图书室图书被接管审查，王学明和我二人受到政治部的查询。这起公案后来不了了之。

蒋介石召见林可胜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随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从贵阳出公差到重庆军医署。当时重庆军医署署长卢致德是林可胜的学生。一天，委员长侍从室来电话，传知林于某日某时受召见，勿误。到了规定日期，林总准时乘小轿车前往上清寺官邸。我也随从，坐在司机老包右边。到了目的地，汽车停在侍从室大门口。这里戒备森严，由王世和主任迎接引进。我在车上好奇地看到王世和右手高举一块牌子，一边引进，一边唱名：“召见林可胜！”我依稀听到唱名之声渐渐远去，想必会唱到蒋介石的会客厅吧。我和司机老包呆在车里，陷入遐想之中。封建朝代，皇帝召见时，太监手持佛尘，高声呼喊：“万岁有旨，宣某某上殿哪！”今天王世和高举牌子一路唱名进去，与封建王朝时的那一套何其相似啊！

约过一个多小时，林总由侍从官护送出来。在返回新桥军医署的途中，林总说：“今天天气好，Ord man（指蒋）面带笑容，一口宁波官话，嗯嗯啊啊的。好在Madam（指蒋夫人）当翻译，问答十分便利。他把一份中文谈话记录交给我留作档案。”

记录里有如下几个内容：（1）对林以本身的国际声望关系，给红十字会争取到大量国外（包括爱国华侨）捐赠的药品器械、救护车辆（附担架），以及军毯和捐赠款项等，加以赞赏。（2）由于林缺少中国行政经验，人事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总队部、卫生人员训练所，所属各大队、中队、小队，还有四个卫训分所，人数庞杂，难免有乱党分子混入。

（下转113页）

红会救护总队部的一些情况

余世法

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总会为了从事医疗救护工作，在武汉成立了救护委员会，之后在救护委员会之下，成立了救护总队部。根据抗战的需要救护总队部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从武汉迁往长沙北门外，借用广雅中学部分房屋作办公之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大火前夕，救护总队部迁往湖南祁阳县郊区。一九三九年春由祁阳迁往贵阳图云关，定住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五月（一九四六年五月），奉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宣布解散（仅留用很少一部分人员，调往南京总会工作）。每人发给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

救护总队部成立后，根据工作需要，队务逐渐扩大，全国各大医学院及各医院的医护人员，多自愿申请参加救护总队部工作，他们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医学院、南京中央医院、山东齐鲁医学院、武汉同济医院、上海东南医学院及长沙湘雅医学院等。此外上海原有一部分童子军参加救护总队部，担任运输押运员或汽车队队长。救护总队部在图云关定住后，一些医务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到救护总队部的工作很有意义，因此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要求参加救护总队部工作的越来越多，其中专家教授也不少。在抗战时期的图云关救护总队部，从而成为全国医疗中心。

救护总队部的医疗救护任务很重，机构庞大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必需大量的各类各级医务人员。因此从长沙开始，救护总队部在祁阳及图云关（特别在图云关时）举办了各类

各级医务人员培训班，如培训医师、护理人员（包括护士）、卫生防疫人员及放射科人员等。结业后，派往全国各医疗队工作，通过一至二年的实际工作，再将这部分人员抽调到总队部进行后期再训练。作到对工作人员，既要使用，也注意培养。培训班的师资，有些是全国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如内科周寿恺、外科张先林及汪恺熙、放射科荣独山、防疫科施正信、公共卫生科过祖源、骨科屠开元等。总队长林可胜是国外国内著名的生理学专家，为英籍华裔。他对培训班的学员很关心，对新进来的学员要给他们作报告，特别强调救护工作的意义与重要性。他的华语不够流利，一般是请汪恺熙教授当翻译。

救护总队部在图云关时，办公室、宿舍等都比较简陋，多是竹篱敷以泥巴和稻草建成的。各个科室设在图云关马路的一旁山上，而宿舍多半在马路的另一旁山上，库房和药品器材则放在山洞内，以防日机空袭。图云关是贵阳通往湘桂的要道，人口不多，只有几家铺面。自从救护总队部迁来后，人口突然增多了，饭馆、烟酒食杂店、小百货店等从图云关公路两旁山腰，一直排到山顶，由一个村很快变为一个热闹的市镇。居民由点菜油灯照明变为点电灯照明（电灯用电系救护总队部发电机发出的电），方便了老百姓，也方便了救护总队上下班的同志，可到店铺吃到面食或饭菜。

救护总队部及各个科室的工作比较紧张，有时晚上要加班加点，为伤病员作手术或抢救垂危病人，或出车护送工作人员与药品器材到前线。工作虽忙，但大家很愉快，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为了抗战，为了救死扶伤。救护总队部离市中心很远，图云关无娱乐场所，年轻人比较多，工作忙，很少有人发怨言，只是盼望星期日，进城玩玩、看电影和上馆

子。我在救护总队部工作时，每年由总队部发给工作人员（医务、行政、运输等各方面人员）两套灰卡叽制服及两顶帽子（船式）（另发有白色工作服）。大家都喜欢穿制服，上街时个个穿，这也是大家热爱医疗救护工作的标志。

救护总队部的医疗设备齐全，手术器械完善，药品繁多，汽车不少，经费充足。这些物资和经费大多是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华侨捐赠的。

救护总队部及下设几个主要部门的主要工作是：

救护总队部，对外与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体经常联系，取得积极支持，更好地完成抗战中的医疗救护工作。对内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汇报工作，指导全国各战区医疗队的医疗救护工作及解决各医疗大队部提出的重要问题（一般问题，大队部自行解决）。各医疗大队部也经常向总队部汇报工作和请示一些重要工作。总队部并掌握全体医务、后勤各方面人员的任、升、调、免职等人事权。救护总队部林可胜任总队长的时间甚长，他在华侨中的威信很高，在向海外援华团体和海外爱国华侨请求支援救护物资时，一般都能得到支持。林可胜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后创办国防医学院，当时国民党军医署署长卢致德是林可胜的在协和医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军医署和救护总队部在图云关成立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要培训后方医院、部队及师管区的医官。

救护总队部之下设有干事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及总务股。

干事室的工作主要是办理英文秘书工作，因救护总队部与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体在业务上往来，如药品、医疗器材及其它物资等的联系和签收等，都需用英文办理。干

事室人员不多，有医务人员和其他人员数人，都比较熟悉英语。

医务股主任是荣独山，股里设有组长、办事员数人。医务股的工作性质与医学院或医院中的医务处、医务科相似，而规模更大。医务股担负医务的行政工作，对各战区的医疗大队工作进行指导，处理答复医疗大队部请示的问题。负责医务人员的调动、晋升等工作。医务股在四大股中管辖的人员最多，他经管各医疗大队、医疗中队及医疗区队。医疗大队都远在各战区，很多工作都是大队长处理，便于提高工作效率。医疗大队长多半是原医学院校的领导人担任。如彭达谋、汤蠡舟、林竟成等。大队部设有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一至二人，事务、文书、工友二至三人。大队部之下设有几个中队，中队长一般是主治医师以上的人担任。中队管理几个区队，区队长一般是医学院刚毕业的医师担任，一个区队另有一至二名医师，几名护士或护理员。还有一名助产士，一至二名环境卫生或防疫人员，一名事务员，一名工友，共约十余人组成，这样便于随时调动，担任医疗救护工作。医疗队的工作安排，根据战争情况，在大队长及中队长的领导下层层负责。有的医疗队派到前线与部队的医务所共同担任医疗救护工作，有的医疗队在前线是单独工作；也有的医疗队是在军政部后方医院指导工作，或开设红十字会门诊为老百姓服务，不收挂号费、不收药费。如贵阳大西门解放前有一个社会服务处，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社会服务处内设有门诊部为老百姓看病，不收一切费用。医疗队的一切经费开支、药品、器械等，均由救护总队部拨给，不收费，很受军民欢迎。

材料股主任是陈璞，股里设有组长和办事员数人，材料

股有材料总库一个，总库常驻图云关，负责各战区材料分库的药品器械等材料的供给。在各战区有医疗队的，都安排有材料分库随时供应医疗队的药品器械。当于怀卿是组长，材料股的情况，他比我了解，已作了详细介绍。

运输股主任是胡会林，股里有办事人员若干人。运输股管理有若干个汽车队、汽车中队，这些车队分布在有医疗队的各个战区。总队部在迁来贵阳之前也曾雇有少数民船作运输，到贵阳之后就不需要了，运输股还设有一个汽车修理厂，规模较大，各类人员亦多，有工程师，也有华侨在厂里工作，可以承担汽车的大检修。这个厂常驻图云关。运输股的工作主要是将药品等物资运往前线供应医疗队，同时配合医务股、各医疗大队调动工作人员时的转运工作。运输股工作很艰苦，经常夜间担任运输的任务，股里有部分人员是原上海的童子军。他们多是汽车队长或汽车运输押运员，工作很负责，而且廉洁奉公，不私自带客，不私自收费，如朱志钧等队长就是这样做的。

总务股主任张祖荣，原是某医院的眼科名医。用一位眼科名医担任总务主任，可见当时对后勤工作是很重视的，也是少见的。总务股也设有组长、办事员若干人。总务股担负救护总队部各部门和全部工作人员的事务工作，如负责修建图云关办公房屋、计划采购保管办公文具用品及其它物资、管理集体伙食、供给全部工作人员（包括各战区医疗队、运输队、材料库人员）的制服等等。

救护总队部在股之下还设有科、队，如财务会计科、X光队（属医务股管）。财会科的工作与一般财务会计科工作相似，故不赘述。现将X光队的工作情况作一介绍：

X光队队长由荣独山兼。为了便于领导X光队的工作，

自武汉开始迁往长沙、祁阳、贵阳图云关时，X光队部一直跟随着医务股。X光队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全国各地医疗队中的工作；一部分是在图云关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就担任伤病员的X光诊断与投照等工作。不论白天或夜晚，只要来了伤病员，就随时检查并作出诊断。特别是外伤骨折伤员经过X光透视和拍照片后，对治疗有很大帮助，因而很受欢迎。由于随医疗队迁移是经常性的，有时还到前线去，为了迁移方便，X光机配备的多为30~50毫安的小型发电机。荣独山主任有时代表医务股或总队长从图云关出发到各地医疗队视察时，对X光队的工作积极给予指导，对从事X光工作人员的生活更是关心。

X光队在图云关的工作任务较重，前方部队或后方医院的危重伤病员一般都转到图云关治疗。当时荣独山主任兼高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总所(以下简称总所)X光技术的军级教官，因此X光队队部和总所的X光学组在图云关合并在一起，都在荣独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双方工作人员的工作很协调。由于规模较大，工作也紧张，能开展一些常用的特殊检查。按制度，每日的照片报告经集体审阅，再报经上级审查修改后方能发出。此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比较完善。荣独山主任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最早参加X光队的工作人员有：张秉仪、张德善、姚浩然、欧阳松、陈锦天、丁春华、张振中、周本瑜、马风佑、郭毓湖、井鐸、黄忠汉、刘宏大、李祖辉、贺志浩、徐仁麒、朱社耕、王浩然、邓寿崑、张学栋、余世法等二十余人。以后又增加了一些人。总所X光学组工作人员有：钱家祺(国民党驻外大使钱泰之侄儿)、顾菊珍(国民党驻外大使顾维钧之女)、石斯同、孔庆德、冯亮、龙铭扬、李重光、颜小琼等。

当时图云关的X光科和内外各科一样，也成为全国X光科的中心。

总之，救护总队部的工作主要依靠群众、依靠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和各方面的人员，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医疗救护工作。由于距今时间过久，所介绍情况，不免有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上接106页）

（3）我（指蒋）要你回去好好整顿一下。为此近期内，我会命令有关部门派个能干的人来贵阳成立政治部协助一切（政治部在一九四二年之后改为特别党部）。

果然，几个月后，以王治民为首的一伙政工人员来到贵阳红十字会总队部，成立了政治部。王又兼任总队长办公室主任（抗战胜利初任大连市社会局局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第一把火，就封闭了我们的“红十字工作者书报供应社”。

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回忆

王睿菁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入侵。我和父、母、妹等决定离开太原南下。于是草率摒当行李，洒泪抛弃家园而去。那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个寒冷清晨，一辆大卡车上堆满了行李，人们坐在行李上面，车直向晋南临汾市进发。在临汾逗留了三个星期后，战局仍不稳定，敌寇节节进逼，迫使我们再次南下，这次以汉口为目的。先由临汾乘原卡车到平陆，经茅津渡过黄河。我们花了一天工夫摆渡过黄河，好险啊！没有船夫们的高度技能，我们永远也过不了这条充满激流的大河。当我们脚踏黄河彼岸时，大家激动得流下泪来，好似绝处逢生，都额手庆幸，感谢上帝！从此地去汉口铁路运输最为方便，先陇海而后京广铁路，但是南下的逃难者，把这两条铁路的车箱塞得水泄不通。不仅车箱里面人们挤得像“沙丁鱼罐头”那样，车辆的顶上面，踏级板和一切空隙处都挤满了人。老幼病弱，风雨同舟，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忍受残酷的凌辱，宁可经历千辛万苦，逃出虎口，以便为抗战增添一分力量。

到了汉口之后，喘息未定，眼见抗战形势每况愈下，国军不战而退，投降主义的图穷匕见。我们决定再向南后撤，暂以长沙为落脚点。汉口去长沙的火车上拥挤不堪的狼狈情况，比上述的更为严重。

长沙是一个江南内地城市，它的气候对来自北方的人们增添了不少困厄。它夏季的闷热酷似蒸笼，连绵不断的阴

雨，以大米饭为主食的饮食……正在徬徨之际遇见了一位我父亲的学生冀朝鼎先生，他把我介绍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先生当英文秘书。当时我也很愿意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只要对抗日有益的事我愿意尽我一分力量，于是我即毫不踌躇接受了这个职务，从此我也与红十字工作结了解之缘，一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前夕为止。

在长沙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以后简称“红总队”），是一个战时民间救死扶伤组织，于“七七”后不久在汉口成立，由林可胜教授出任总队长。不久因战局恶化，随即后撤至长沙。当时红总队成立伊始，一切均在草创阶段。总队部设在长沙一个中学堂里。原来这所学校为避免遭敌机轰炸，已迁出郊外去了，把所有可搬走的家具如桌、椅、凳等都带走，只剩下宽敞空空如也的课堂。所以一度总队部办公或开会要利用药箱以代凳椅！

红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是林可胜博士，他是马来亚（现新加坡）华侨，出生、长大于英国属地马来亚（现为马来西亚国）的新加坡港口（现为独立国）。大学是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上的，学的是医学，毕业后专攻生理学。一九二四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聘他为生理学教授兼科主任。他是当时该院最年轻的一位华人教授，他的身材中等，体型坚实，面容端正，胡子剃光，一双褐色炯炯有神而晶亮的眼睛，谈话时凝视着你眼不放，似乎期望你要全力以赴地干，象他自己那样昼夜不息地工作。他的哲学是：“敌人在你跟前，没有时间可供你浪费，快干吧，先生、朋友们！”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身穿灰布军装，头上歪戴着一顶陈

旧不堪的军帽，瘦长的身材，裹着绑腿，赤着脚，穿着草鞋的西洋女士，那就是史沫特莱女士。她的金黄色头发剪短与男子一样。她有一双灰碧色的细小眼睛，从瘦长脸面上透露出坚毅的神精。她大量吸烟，牙齿和手指已染成了深黄色。她讲起话来充满着自信心和献身精神。她是从江西新四军方面来的，一路上有一个护送“小鬼”陪同，从陆路来到长沙。她来红总队的目的，是要求林总拨发在前线奇缺的医药器材，特别需要治“打摆子”（疟疾）的奎宁片和针剂。据她口述：那里的部队在每天同一个时刻，成百士兵倒在路边或山道上，全身发抖、发烧。奎宁是当时唯一的治疟有特效的药物。红总队从国外南洋、爪哇（现印尼）一带华侨捐助得来的大量奎宁药物，对抗战的战士起着直接的保健作用。

从长沙经祁阳到贵阳图云关

在长沙喘息稍定，可是前方传来的消息，敌寇步步进逼，国军节节后退，不与交锋，看来长沙也难保。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间的形势。红总队也奉命后撤至离长沙西南三百余公里的祁阳。它是位于湘江上游、衡阳到桂林公路上的一個小县城。红总队部计划设在祁阳县城隔江的一块平地上。我记得我从长沙到达祁阳，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那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间盥洗室，因为职工宿舍还未建成。红总队部需要的建筑，如办公室、放存医药器材的仓库、汽车停车间和修理车间、职工住的宿舍、公共食堂等都要白手起家，由红总队部自己建造。凡此各种房屋建筑是最经济的，也是极简陋的，如屋顶都用茅草覆盖，墙壁是竹编加石灰泥土，窗是用纸糊的，“地板”是砸实了的泥土加石灰。使人

最烦恼的是晚上用的菜子油灯来照明，平时用它在晚上看书或做针线，真够呛哩。有一次为了赶出红总队部的第三次工作报告，我和几个同事在此灯光下眯着眼打字，一直打到天亮，翌日眼花头昏，只好请假休息。在这样原始条件下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呢！

在隔河的祁阳城内，驻有一个军医院（后方医院），是收容前方的野战或兵站医院送来的重伤、重病兵员的。红总队也派了一个医疗队在该院协助工作。有一天红总队的大卡车从前方运回重伤、病员兵五、六十名。他们多半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骨瘦如柴，行走须人搀扶。据悉他们多患过痢疾、腹泻等病症，但因饮食营养不足，护理欠妥，终于沦为这样悲惨的形骸。无疑这是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所致，即上级军官克扣士兵的军饷以饱私囊。士兵的军饷本甚微薄，长期的过度疲劳加饥饿折磨的士兵，还能打仗驱敌吗？有人亲眼见到，这些可怜的“伤兵”病员来到后方医院见到饭食时，就不顾一切拼命的大吃大喝而猝然身亡！

有一天在祁阳红总队部，有一个美国军人，驱车来访林总队长。他就是史迪威尔上校。当时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参赞。他与林总在北京已相识，这次似系顺路来访，任务不明。史氏后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任中印缅战区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因与蒋发生矛盾，1944年被调回美国。史氏做事严谨、泼辣，有被给“酸醋约”之称（Vinegangoe）

作为红总队部的“根据地”的祁阳，不幸因战局不利，不得不再作后撤计划。这次目的地是距祁阳千里之外的贵阳。总队部在祁阳不过几个月，于是在一九三九年二月间春节前后，我们又出发从祁阳前往贵阳图云关了。幸亏我们坐

的是红总队自己的卡车，七、八个人乘一辆车，车上装满了行李铺盖卷和医药器材木箱。车子沿着泥土公路上颠簸地进行，以广西桂林为第一“驿站”，路上就在路旁的小客栈里过夜，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光临，惊动了正在冬眠的老鼠、虱子和臭虫。它们活跃起来，大肆其淫威，无情地折磨我们这些疲劳不堪的过路人。

我们在桂林逗留了两天，略作休整。久闻其名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我们没有游兴去欣赏风景。因为敌机二十七架天天上午十时左右飞来空袭轰炸，有时投下燃烧弹，有时俯冲扫射。桂林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倭寇居然狂轰滥炸，惨无人道，我和同仁们得到这次切身的体会，都同仇敌忾，深恨残暴的倭寇，欺我太甚，立誓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

经过桂林两天的休整后，又要上路进发，直指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我们最后的目的地。路经广西的柳州、河池（金城江），然后入黔南的独山、都匀、贵定等城镇。路上共走了九天，终于抵达贵阳图云关，时已一九三九年三月初了。

贵阳图云关

这是贵阳城东五公里的黔桂（湘）公路上的一个必经关口。穿过关口的公路两旁以及附近的山坡上，是当地林业部门开辟的一片片松柏树种植场。路边间种着一排排刺槐，较远的山坡旷野，遍开了野生的杜鹃花。红会总队部就是在这块环境优美的土地上“安家落户”的，一直到抗战胜利。可是红总队又得再次平地起家，因为除了栖在关口上的几家杂货小铺、一家小饭店外，别无其他建筑。所以红总会所需

要的办公室、仓库、宿舍等建筑物，都得从头修建。当我们抵达图云关时，营房式的用茅草铺盖的、泥土涂竹编的薄墙的房屋，还在加紧地建造。我们住在茅草顶的宿舍里才切身领会了贵州省“天无三日晴”的苦恼，它的特点是外面雨已停下，屋内还点滴落个不休，有时还须在卧铺上面撑一柄雨伞或铺一块油布以防湿！说来似难以置信，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其滋味。照明问题图云关与祁阳一个样子，都用一、二支烛光的菜子油灯。有一天晚上宿舍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我们大家不约而同地大声欢呼起来：我们进入二十世纪了！所有红总队成员，都发给灰布中山装制服一套，头戴一顶船式军帽，腰系皮带，还有金属制的银色圆形红十字徽章一枚，可以佩带在胸前或帽上。

图云关红总队是一个战时成立的医药卫生机构，是辅助作战部队医护不足的一个民间组织。林可胜先生领导的红总队，其经费、物资（医药器材、运输车辆等），大部分是国内外捐助得来的，特别是国外的爱国华侨。林先生德高望重，号召力强，国内外响应他的呼吁是热烈的。图云关人才荟萃，一度工作人员达二千人之多，内包括医师、护士、药剂师、运输司机等专业和后勤人员。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但他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要把可恶的侵略者驱出我神州大地的心愿，是完全一致的。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那些不远万里而来的海外爱国华侨，志愿投入祖国怀抱，不惜牺牲，各自献出一分力量，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下的情况，仍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地为祖国效劳。

我自到图云关后，一直在总队长办公室工作。简单地说，总队下面有四个大队，分驻各战区。一个大队统辖二、

三十个小队，分派在该战区的军医院，协助医疗、医护、国防、环卫等工作。各小队要每十天写工作报告，向大队和总队呈送。我的任务是把一百几十个小队的工作旬报译成英文，让总队长批阅，因为他不能阅读中文。此外，对海外宣传和募捐，总队部务必编写季度工作报告（英文）。医疗等队的工作旬报，给季度报告提供了基本材料和内容。总队长办公室里还有几位同仁如蒋旭东医师为主任，其他成员包括汪犹春、朴正、利舜英女士和我。他们都谙汉英两语，并对秘书业务如打字、速写、档案处理，都有一定的经验，虽然原来他们都不是干这行专业的。

国际援助红总队

一九三九年秋，红总队忽然来了一批二十多名欧洲国籍的医生。起初他们被误称为“西班牙医生”，因为他们在来华之前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共和国一边的国际医务纵队，是站在反法西斯方面的。他们中间共有八个国籍，即波兰（六人、一女）、奥地利（四人）、德国（四人、一女）、罗马尼亚（三人、一女）、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捷克（各一人）。他们通过伦敦的英国援华会志愿来华参加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他们都是三十余岁的外科大夫，颇富经验。他们来到图云关会见了林总，略事休息，介绍战局及红总队的医务和一般情况后，即按情况被分配到前方各红会医务队工作。他们和我们医务队队员同住、同食、同工作，兢兢业业地为伤、病兵员治病救伤，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翌年红总会解散才回国。这些大夫的国际主义及红十字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和颂扬的。

驰骋于云、贵、川（即昆明、贵阳、重庆的）公路上，

烧木炭以代汽油或酒精为燃料的、挂着红十字标志的二吨重卡车，就是公谊救护队（F. A. U. 即FRIENDS A M—BULANCE UNIT）的运输队的车辆。专为运输医药器材设备与救济物资，在这条长达千余公里，逶迤崎岖的公路上奔走。司机都是英国的碧眼金发的年轻小伙子——公谊会（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的教友。他们的运输任务给了红总队不少帮助，填补了红总队运输力量的不足，尤其在滇缅公路开辟之后。公谊会的信条之一是反对和拒绝参加战争，但他们为救济事业（包括医药卫生）的服务精神是忠实和献身的。

一九四〇年七月中，日寇频繁空袭贵阳城及其郊区，图云关也不在例外。有一天，我在总队长办公室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身穿士兵制服，脚踏草鞋，看不清性别，要求见总队长。报名之后，才知道她是史沫特莱女士。她两年前总队部在长沙时见过林总，这次她来的任务不清楚。正在此时，突然听见敌机空袭警报，后来敌机一架在毗邻卫训所的教学医院——167后方医院投弹三枚，炸毁了医院的一部分，炸伤了五人，其中一人是护士。史沫特莱女士是位作家和新闻记者，她当日和连夜伏在打字机上，嘴含着香烟，拍发电报给世界各通讯社，控诉日军无视国际公约，轰炸红十字会及医院的残暴行为。这是图云关红总队部及卫训所第一次遭日寇空袭和轰炸。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图云关红总队的工作正值方兴未艾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也在发展之中，抗日胜利之日还是遥遥无期。而红会内部的不团结，已发展到人事更动。之后，我仍在红总队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我与图云关红总会告别了。我这最后几年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红十字精神真谛的领会。

我在贵阳图云关红会救护 总队工作的经历

利舜英著 施正信译

一九三九年初林可胜医师从中国内地因公来到香港时，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切望为抗日战争做些工作，他即用函答应我的要求如下：

“亲爱的利小姐，我很高兴得知你愿意来我总部志愿担任秘书工作，但我只能给你低微的的薪金（每月法币六十元），仅够维持生活费用，而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我建议你会同叶温与塔尔波特医生们先去海防（越南），再乘我们的运货卡车来贵阳。你如果决定来工作的话，请你到我们的香港办事处去见庞京周秘书长，他会给你一切必要的证件。

林可胜签名（1939年3月4日）”

我开始工作比我预期的还要早。我记得在海防见到十几辆卡车，都是马来亚华侨捐赠的，还配备了马来亚司机。有一部分卡车是送给中国红十字会的。只有我能讲中国话（国语）一路上我就成为英汉翻译员。从海防到同登都是山路，我们是在夜间行驶的，司机是越南人。

我是1939年4月4日到达贵阳图云关的。刚从香港来到内地，一切都感新奇和有趣。四周山坡上都铺盖着野生的鲜花。沿着山谷看去，除了几间小店屋位于小山坡上和我们营房式的宿舍及林总的住屋外，别无其他建筑。我到此的头两天没有下雨，也没听见人们常说的是贵州省“天日三无晴”，

地无三里平”。

我们被安置在一幢营房式的大宿舍里。屋顶是用茅草盖的，墙壁是单薄的。屋内用木板格成小间（ 3×3 方米）一小间内放着两张三层木板卧铺，住的是女护士们和女职员。我和王春菁女士是总队仅有的两名女秘书，占了屋尽头的一小间，开始也睡木板硬卧床，后来幸运买到两张行军帆布床，就舍弃了硬卧铺。

我们住处没有盥洗室和洗衣服的地方。除了工作外，大部份业余时间是用在保持个人及宿舍的清洁整齐上。每日上班，须走过一条谷间小道，可是这条小道经常泡在黑泥浆中，可怜我穿的香港鞋，只好用厚纸垫底才能避免湿足。早知道如此，我带一双雨靴来就好了。

开始，我的工作改写红会医疗队从前线寄回来的工作报告。有的报告是用英文写的，但似在匆忙中用铅笔写得很潦草，不易辨认。林总队长能讲汉语，但不能看懂汉语报告，须译成英文。当他知道我也能作速记时，就把我调到他住房的办公处，经常办理他的对外通信及报告等事务。我也常跟随他到附近的军医院去，当他讲话时，我就用速记纪录他的演词，归档备查。

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天（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毗邻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总系该所的主任）举行有一百来个培训学员的结业典礼。登台演说者从十点半钟到中午才结束，可谓是一次热烈而庄严的典礼。晚上学员们上台演戏，表演得很精彩，大家都尽欢而散。

八月得到一个好消息：我和王春菁的月薪都增加到八十元正！

有的星期日，我们得到休假一天，我们就乘便车进贵阳

城去购买东西，回来时则坐人力车或小马车，从城门口到关的山脚下，再步行上山。

八月份大家忙于编写第四次工作报告（半年一次）。我也协助胡会林编制他的运输股如何开始成立经过的报告。他的报告写得很有趣。

九月一日是历史的一个重要日子。当晚八点钟，我们从马尼拉（菲律宾国）无线电广播听到说：德国在当日晨九点钟轰炸了波兰首都华沙，一小时后再次空袭该城，它还轰炸了其他七个城市。那天清晨，我们图云关也发出空袭警报，半小时后得悉，有二十九架日本轰炸机从广西南丹飞越黔南边境，形势似甚严重，林总叫我们立刻离开屋子。我们——王春菁、龚棣珍（护士）和我——带了书刊和厚毛衣（恐要到夜间才回）往山坡上跑。空袭警报是以打锣为号，锣打得紧密表示发出警报，打得稀慢表示解除警报。那天的警报被搞乱了，下午一时应该解除警报，却变成第二次发警报了。

抗战期间红十字会生活琐忆

陶天白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红十字会及与红十字会有密切关系的军政部军医署卫生人员训练所分所及总所工作过五年。今年是抗战爆发第五十周年，追怀往事，情不自己，乃琐忆成篇，以反映当时红十字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聊供参考。时过境迁，容或有误，识者正之。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抗战初期设在香港，会长王正廷，理、监事有王晓籁、杜月笙、林康侯、钱新之、虞洽卿等。秘书长庞京周。总会于贵阳图云关设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总队部以医务处为主体，医务处主任荣独山。总队部之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派赴八路军服务，大队长墨树屏；第二大队大队部设湖南邵阳沙子坡，大队长彭达谋，“协和”出身；第三大队大队长汤蠡舟，是个斯斯文文的学者。大队之下设几个中队，中队之下分设医疗、医防、救护等队，除一部留驻部队后方医院或兵站医院服务，大部开赴前线与各部队野战医院同进退。

大队在抗战中期，扩大为九个，以战区番号为番号，比如派驻第九战区的即为第九大队。第九大队部设长沙，大队长林竟成，中队长贾宗舆、唐文铭（后升大队长）。各队队长记得有杨焕文、吴国兴、文士械李成江、曹天行、朱秋林、祖张祺、方元宣、吴宏宇、赵坚白、刘廷杰及会说俄语的王队长等；还有驻湘潭檀香寺的波兰籍女队长马可斯，驻平江长寿街的苏联籍队长阿罗肯等，他们都是出身于正规医学院校的医

生。在前方各队服务的外籍医生还有杨生、杨格、陶格曼、罗益、格拉斯道夫等，多为东欧国家的人，都是援华委员会派来的。各队均配有环境卫生工程师或技术员，如戴根法、李开物等。那时部队卫生条件极差，病兵多于伤兵，戴等为部队设灭虱站，设给水过滤点，颇有实效，极受部队欢迎。

1938年，我在长沙红十字会医训班毕业后，被分在江西马回岭第五十三救护队。一次我们到前线救护伤兵，途遇敌机，队附胡瀛学被炸得血肉横飞，我曾写有悼文刊于1939年的衡阳《正中日报》。一次我们在平江三眼桥刚刚住下，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总部来了急电，说：“判断敌人将于今晚进犯三眼桥。”于是，我们立刻转移。一次从浏阳转移到醴陵，翻越一座上七里下八里的蕉西岭，虽然很累，大家情绪却很饱满，拍了不少照，还拣了两条枪。

不久我被调到衡阳第五中队部，中队长贾宗舆。中队驻有两个汽车队，队长朱沅浦和何队长（他姐姐名何伯宏），都是大学毕业生。司机刘万江、纪鸿超等，他们教我开汽车。衡阳至耒阳、至邵阳、路况较好，他们常叫我开。可是有一次我单独开小车几乎摔死，幸亏贾中队长抢救及时，不然，早已没命了。贾中队长是个寡言少语的厚道人，我永远感谢他。一些知名人士常来请求搭便车，崔万秋、姚蓬子等都搭过我们的车。内政部顾问新西兰人艾黎在我们办公室里住过两晚，我们的司机给他修了小车。我们曾一同到成章中学听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参政员王造时的讲演，叶先生讲的是日军跳跃战术，断定日本必败；王先生讲的是美国一个爱国铜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39年衡阳遭到大轰炸，未躲警报的平民被炸得惨不忍睹。我们打着手电筒抢救奄奄一息的受难者。

秋天，我被调到长沙大队部，工作比较复杂：接待过往人员，为各队转发经费，运送器材、药品以及编辑会刊。那时前方的铁路、公路都已挖断，湘江中有的地方布有水雷，马匹极少，运输全靠人力。战事紧急时，忽进忽退，敌机时来侵扰。大家就在这样环境中工作。值得欣慰的是：经费、器材、药品的运送，以及派到前线工作的护士小姐如陈怀英、陶四维等，从来都未发生过意外。部队官兵、特别是伤病员兵，对我们红十字会人员十分爱护，外籍医生，更受尊重。

各队同仁，相处都很和谐。除了工作，就各从所好，或者看医书，学外语，或者骑马、游泳、拍照、下棋、写信、集邮、弹琴，唱歌，很少人看报。而报纸到了前方，也是零零碎碎的明日黄花。和外籍医生上馆子，谁也用不着客气，吃完饭平均分摊。到一个地方住下了，大家就忙着找点纪念品，例如：螺壳、竹鞭、晶莹小石、茶树棍子等等，还采野花，抓蝴蝶，制成标本，都视为珍宝。那种学生式的生活，颇富情趣。这也就是当时红十字会大部同仁的一种业余生活实况。

后来任大队长的唐文铭，湘雅出身，后留学美国。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者风度，而有纯洁的学生气质，和他在一起，从不感拘束。当时他的医道已为世所重，田汉在长沙常找他看病，曹禺曾请他审阅关于伤兵医院的《蜕变》剧稿。前年我接到他的长信，纯洁之情犹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现在是中华医学会广州分会顾问。

刘廷杰队长贵阳医学院出身，后留学美国，也是个极淳朴极可爱的人，四十多年我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友情。他晚年爱花成癖，犹有在红十字会那种洒脱襟怀。他现在是重庆第三军医大学一级教授。荣独山先生是我们老师，在长沙医训班教我们放射学。他善于以故事引人深思，例如他说：“教

书的误人子弟，看病的草菅人命，都要进十八层地狱，我将来恐怕要进十九层地狱，因为我又教书，又看病。”他现在是上海中山医学院教授，前年我同上海船舶设计院书记陶谷专程拜望他，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仍在伏案工作。他和夫人微生物学教授林飞卿把存款六万元，全部捐作奖学金，全国报纸和美国医学杂志都有专文介绍。

林可胜博士是爱国华侨，国际著名生理学家，在美国和华侨中很有声望，红十字会大批车辆、器材、药品和捐款，大都是他募集来的。一次他到湘北前线视察，路上不叫我们说话，他说：“走路说话最消耗体力。”他不会说汉语，一开口总离不开“Science”（科学），处处讲实效。他在红十字会有极高威望，洋医生对他也敬如神明。一次他从远征军视察归来，詹汝嘉先生以“欢迎总队长回国”八字写了一首精巧的七律，可以代表大家对他的感情，原诗如下：

欢跃声中发浩歌，
迎来绝域异闻多。
林林壮志怀诸葛，
总总雄心迈伏波。
队伍伤残蜀道苦，
长官慈爱醉颜酡。
回春妙手膏肓起，
国土无双一笑呵。

后来因他和美国的左派女记者史沫特莱太接近，又把大量器材、药品赠与十八集团军，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1943年把他调走了。

林竟成大队长福建人，同济出身，后留学美国，英语、德语都讲得很好。生活刻苦，不修边幅，无不良嗜好，总是

一大早起来，读书写作。他常在前线，对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在前方山珍海味地享福，而士兵多营养不良，有时连糙米饭都吃不饱，谈起来义形于色表示不满。1942年，他调任军政部军医署卫生人员训练所东安第五分所少将主任，后又调任重庆陆军医院院长。我曾写有《医界二林》，刊于1946年2月重庆《益世报》，就是写的他和林可胜。几年来，我们未断通信，他现在是武汉医学院教授。

1942年我被调到东安五分所作副官室主任，旋改任东安中学教师。1944年到贵阳图云关总所任编译官，主编《卫训周刊》和《卫生导报》，编译室主任即詹汝嘉。总所大部分人员都从红十字会过来，大家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学术空气相当浓厚。

总所规模相当大，分内科、外科、矫形外科中心，放射科、五官科，骨科、护理、环境卫生工程等学系，著名教授有周寿恺、张先林、屠开元、柳安昌、荣独山、周美玉、过祖源等。有电化教学设备，有比较先进的印刷厂，有设备完善的实习医院，大部是林可胜留下的底子。总所主任卢致德，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为人颇谦虚，我们在一栋小楼里办公。他叫勤务兵干什么，也是轻言轻语。那时他大约四十岁，还未结婚。他是国民党两三个中将军医之一。后去台北任荣民总医院院长，1982年病逝。

周美玉是护理学系主任，女少将，那时约三十岁，讲得一口极流利的英语，也未结婚。在先，她到湘北视察，林大队长叫我护送她回贵阳，路上我成了她视察报告的修理匠。她偶而露出娇羞的神态，但总是落落大方。我发现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她的《护理学》本行上，她认为护理重于医疗，而精神慰藉又重于药物。所以她谆谆告诫护士小姐们，不管

伤兵怎样，都应该以兄妹的感情对待之。去年族兄陶铸南从台北来信说，她现在是荣民总医院顾问。

红十字会的富有情趣的生活，深深令人回味。我觉得它符合红十字会的崇尚和平的精神。救死扶伤，利国福民，天下一家，助人为乐，世界大同。这就是当年红十字会同人的行动准则和追求目标。时间过得真快，四十多年岁月一眨眼就流逝了，这些年我对社会贡献殊少，深感愧对师友。令人感奋的是：今天我们国家欣欣向荣，充满着民主与改革精神，充满着生机与情趣。作为红十字会一个老会员，我当追随同仁之后，勤奋地默默地作一个为人民雪中送炭的仆夫。

救护总队部医疗队工作简介

王从炎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继起，抗击日寇的战争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当时国难深重，国土日蹙。祖国兴亡，匹夫有责，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怀着深仇大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巨浪。为了抢救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忠贞爱国的伤病员，全国兴起了组织抗日救护队，奔赴前线。由于日寇灭绝人性，奸淫杀掠，甚至实行“三光”政策，惨绝人寰，沦陷区人民背井离乡，流浪逃亡，难民救护医疗也同时展开。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这个人民团体组织在武汉成立（以下简称救护总队部）。后迁湖南祁阳，再迁贵州贵阳图云关。在图云关建了数十幢茅草房舍，作为救护总队部工作场所。全体工作人员分别来自祖国各地和海外的爱国华侨及国际援华医疗队。

救护总队部下设十一个医疗大队，这是按当时抗日战争的战区布置设置的。其中医疗预备大队设于总队部，是为了便于处理紧急任务随时行动的预备队。在各战区的医疗大队，按工作需要下设若干医疗中队、区队。以医疗中队为单位，分驻在抗日前线地区，担负着抗战伤病员的急救裹伤、外伤手术、各种疾病的诊治，同时也配合前、后方医院收容的重伤病员的诊疗工作。

医疗中队长、区队长由医生担任（正式医学院校毕业），队员由护士、助产士（正式护士、助产士学校毕业）、X光、

化验、防疫、环境卫生、医护助理、翻译、事务员等人员组成。

医疗队中有不少外籍医生，系国际援华医疗队人员，来华后，编入救护总队部各医疗队工作。他们的国籍是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奥地利、捷克、苏联，其中还有英国女医生高田宜（GUY COURTNEY）。这些外籍医生曾先后被派到广西、云南、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工作过。

在贵阳图云关诊疗所工作的外籍医生有甘理安（Dr. L. KAMIENIECKI）、化验员甘曼妮（Mr S. M. KAMIENIECKI 甘理安的夫人）；医生沈恩（Dr. G. SCHON）曾被派到贵州省高等法院监狱，为犯人诊治疾病，每周有两天去工作；医生甘杨道（Dr. J. KANETT1）有时也参加疾病统计工作。

日寇灭绝人性，在湖南常德等地投掷细菌弹，杀害中国人民。这引起中国民众和世界人民的愤恨。罪证如山，无可抵赖。加之当时有多种传染病流行，在图云关诊疗所也发现斑疹伤寒。在贵阳中央医院（由南京迁来）住有天花病人等情况，因此防治传染病列入医疗队的工作，配备了防疫、环境卫生人员。此后医疗队大力推广牛痘、斑疹伤寒疫苗接种（疫苗由国外支援），进行蒸气、药物灭虱，饮水消毒，患者隔离治疗等防治。

救护总队部为开展民众医疗工作，在图云关、贵阳大西门设置两个诊疗所，为广大群众、难民、公务人员、少数民族治疗疾病。诊疗所设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X光室、化验室等。除一般门诊外，还开展妇幼保健、家庭访视等工作。就诊人数众多，收费低廉。

一九四五年冬，日寇进攻到贵州独山、都匀等地（史称黔南事变）。救护总队部为此派遣医疗预备大队四个医疗中队到黔桂线上对逃难民众进行伤病治疗（逃难时有日机空袭轰炸），在黔桂线上的都匀、独山；在黔川线上的遵义、桐梓都驻有医疗中队；在贵阳难民收容所也派驻一个医疗中队；为难民诊治疾病和防治传染病，直至难民收容所撤销为止。难民收容所设在三民东路现幼儿园前址。

救护总队部派往各战区的医务人员，在八年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忠贞为国、英勇顽强地与日寇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有位医疗队女队员畅革新，二十岁左右，在前线工作时，有次一夜未归。次日凌晨，她竟骑了一匹日本军马回队，立了战功。曾有人根据她的感人事迹写了一个《蓝色救护车》剧本赞扬她。我曾保存有两件战利品：一幅日本国国旗，上写“武运长久”；一本日寇联队全体人员名册，可惜后来遗失。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随即宣布撤销，全体人员发给三个月工资遣散。

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知，将原救护总队部二十余人调到总会工作，其中有医务科全体人员。

红会救护工作拾遗

何 涛

据贵阳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有关资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及其前身临时救护委员会，在神圣的抗日战争中作了大量的战伤救护和医疗防疫工作。鉴于有些史实尚无专文论述，现据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以供读者参考。

一、淞沪抗战时的救护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仍然抱着“和平未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的态度，把事变当作偶然现象，企求短期内得到和平解决，因而对抗战大业并无周密准备。

“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国军仓卒应战，战场的救护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屠杀面前，各界群众义愤填膺，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战场救护工作也在迅速开展。在林可胜博士的具体组织及京沪等地爱国医护人员、爱国的青年、学生的积极参加下，于1937年10月在上海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红会救护中心。当时，救护工作需要的医院、人员、车辆、器材、经费及房屋等，都是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支持，得到热烈的响应。据参加淞沪抗战的人回忆，在救护伤员、收容遣送疏散官兵等活动中，都曾得到上海的童子军、工人、市民的帮助。

为了统筹当时的救护活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以王儒堂任主席委员，以杜月笙、刘鸿生、王晓籁、林康侯、钱新之、刘月如为委员。据胡兰生在抗战

胜利后出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所作报告说，这段时间在上海境内设有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到救护汽车98辆，特约救护伤员的公、私医院16所，并在上海附近的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等地陆续设立了重伤医院。随着战事的发展，救护委员会还利用南京中央大学的校舍，设立了一个拥有三千个病床的首都医院。这所医院有医护人员三百余人，工杂人员四百人，医院内的手术室可供7个患者同时使用。这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一所伤兵医院。

1945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编印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抗战救护工作纪念册》的统计数字，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止，一、上海市救护医院收容伤病兵民19,539人；二、由上海伤兵分发站运送伤病兵民7,128人；三、由上海前线救护队护送伤病兵民17,722人。上述的胡兰生的报告中，也列举了这三项工作的数字，一、二项在两个资料中是一致的。关于第三项在胡的报告中则说：“三、由上海前线急救队及救护队送伤病兵民共43,446人。”这两个数字的差异，是由于后来把急救队的统计数增加上去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认定胡兰生列举的数字。在短短的八个半月的时间内，红会救护委员会救护了七万多军民，成绩显著。考虑到当时日寇凶猛进犯和国民党当局毫无准备的历史背景，救护工作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展开的，救护人员的救亡热情和实干精神，令人钦佩。

二、战区医院及诊疗所

红会救护总队于1938年在武汉建立后，所属的机构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多次变动。据1942年8月31日的资料，救护总

队部下设二个诊所、一个疗养院、三个战区医院。当时，有9个大队、47个中队、94个区队。每个大队辖中队5个，中队辖区队2个。大队按战区配置，预备大队设在贵阳，机动使用，辖10个中队。同时，增加了9个手术队。关于大队、中队、区队及手术队的情况，本辑已有许多文章作了记述，下面简介战区医院及诊疗所的情况。

战区医院。曾在第三、第六、第九战区，各设置了一个战区医院。据红会救护总队部编印的《救护通讯》第16期记载，战区医院设1、内科，2、外科，3、五官科，4、产妇科，5、药局，6、护理室，7、x光室，8、检验室，9、事务室。每个战区医院设有门诊部及住院部，有病床50张（其中特别病床5张，普通病床45张。）

战区医院的人员编制是，设院长1人（兼任医师）、副院长1人（兼任医师）、医师3人、药剂师（药剂生）2人、护士长1人、护士13人、检验员2人、事务员1至3人、医护员4人、助理员4人、工友5至7人。以上人员按最高额计算，共为41人。医院不仅负担住院部的工作，还有门诊，这说明组织是比较精简和有效能的。

战区医院直属救护总队部，拨归医疗大队部及战区司令部长官部卫生处监督指挥。1942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时，配合第九战区的医疗大队曾在新墙河设立了一所战区医院。战斗激烈，医院受到敌机轰炸，医疗队协同医院医护人员把伤员后撤途中，女护士畅革新曾乘机夺获敌战马一匹，将一重伤员护送到后方，一时传为佳话。

诊疗所。救护总队部于1942年曾在贵阳设有两个诊疗所。同时，在桂林、赣州、曲江、成都、昆明、柳州、衡阳、恩施、福州等地，由驻当地的医疗队开设诊疗所。其任

务是从事战时民众医药救济及后方城市之空袭救护。

总队诊疗所设所长1人、医师2人、护士4人、助产士1人、助理员2人、工友2人。以上人员共计12人，也是比较精干的。

在设立诊疗所以前，救护总队部曾成立医防服务队40队，分派在后方各地，专门从事民众的医防工作。后来，这些服务队并入该地的医疗队。

配合战区医院及诊疗所工作的，还有当时各地的红十字会医院。

三、战俘救护及国际交往工作

红会救护总队部所属各医疗队，在战地救护中对俘虏的日军伤病员，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给予了救护。1942年5月，救护总队部曾派出一个医疗队，到设立在贵州镇远县的俘虏收容所（今改名和平村），对该所收容的七百余名战俘进行医防工作。1944年，这个医疗队随该所迁往重庆。后来，又派了一个医疗队到南温泉敌伪集中营，为收容在那里的二百余人进行医防工作。据胡兰生的报告称：“自本会担任是项工作以来，营、所卫生，一致显有改进，死亡率因之锐减。”

红会救护总队的国际交往活动，史沫特莱女士及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情况，已有专文记述，本文不再重复。其他国际交往有如下一些记载：

英国红十字会配属红会救护总队部昆明办事处指挥的医疗队，队长韩正义，在华期间病故。据《救护通讯》16期记载，国民政府曾于1944年6月2日下令褒扬。原文是：“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队长韩正义，以外籍人员在华从事医疗队工作有年，急难扶伤，忠勇任职，于湘豫等省早著令誉，远

近受其惠者，为数非其少，博爱存心，良深嘉尚。迺因调动繁剧，积劳病逝。特予明令褒扬，以彰异绩，而永仁声。此令。”

据1944年8月31日《救护通讯》21期记载：

英国红十字会医师严斐德，来筑会商黔桂线病兵及难民医药救济等联系事宜。

美国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倪克迺，因公过筑，曾莅部（总队部）访谈。

1944年10月15日《救护通讯》24期记载，美国战地记者兼美国红十字会访员黎乐来、广西国际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戈略午、英国红十字会医务主任华振中，均到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进行了联系和访问。

1945年3月30日的《救护通讯》第35期，则报道了英国红十字会会长蒙巴顿夫人访华时，途经昆明对医疗队进行了参观。

另据1944年11月30日《救护通讯》27期，记载了在贵阳市，由美国教会援华救济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英国援华会、英国红十字会、加拿大红十字会、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及中国红十字会等八个团体，联合组成了贵州省国际协济会，办理救济工作。

以上三则，是作为拾遗以补本辑未曾记载的问题，援引了一些资料，目的在于提供和知情者作为回忆的线索，以便提供更翔实的“三亲”史料。本文在编写时，参考了王化棠同志制作的资料卡片，特此志谢。

回忆我在红会医疗队的情景

许恩溥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的炮声，把我推进了杭州的护士学校。同年十月，因日寇进犯杭州，全校先后迁移到台州、天台。我的四年（三年护士、一年助产士）学习生涯，是在战乱年代东搬西迁中渡过的。

1941年5月，日寇在浙江沿海登陆，学校从天台县城迁往农村。我们几个家在沦陷区的同学，也只有随校同往。但我们已毕业了，已是一名正式护士，不能老依赖学校。呆在那里无所作为，是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相违背的。我们同学四人经过商量，毅然决定到后方去参加医护工作，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工作出一份力，不愿意留在学校当老师。经同学沈诗澄的哥哥介绍，辗转来到江西弋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三大队部大队长何鸣九那里报到，把我们分在艾家村第26队林和鸣队长处。当大队长知道我是助产士，将他曾用过的一套平产接生用器械送给我，为我以后工作方便不少。

初到红会医疗队时，感到很新鲜，大家都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带船形帽、帽上还有红十字会徽。夏天穿短西裤、衬衫、行动起来方便自如。

红会医疗队是为后方医院伤病员服务的。我是刚离开学校初出茅庐的小护士，在大姐姐们的关照下，很快地适应了环境，胜任了护理工作。并感到虽在战争时期，医护设备容有不足，但医疗队的医疗、护理各方面都有一套正规制度，要

求也较严格。医生每天上午都巡回查病房，按内外科病情开出医嘱。伤病员们根据不同病情，有特殊的、一般的护理。伤病员的饮食分干饭、软饭、流汁等。每天上班有次序的进行换药、测体温，按医嘱做治疗、发药等。护士有值班制度，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的。

我在26队不久，就调到第71队去。71队是配合卫生人员训练二分所，搞护病学组示教工作。来受训的学员是各后方医院的校、尉级军医，护病示教为铺床、换药、测体温、发药、灌肠、灭虱洗发及预防褥疮等一套护理法。当时，各地的医疗队是为后方医院伤病员服务的，卫训所的学员又要在后方医院实习内外各科的诊断、治疗、动手术等，三者互相配合。

1942年初夏时，日寇进犯江西鹰潭，弋阳方面吃紧，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都转移。我71队与26队也一同离开弋阳，转移到福建邵武去。大家只能翻山越岭，徒步经陈坊到光泽。途中我患了痢疾，在大家相互照顾下，到达福建邵武。由于出门没有经验，我的全部行李都丢失了！好在时值夏季，没有被子、棉衣也可以过。到了邵武，后方医院及第26队就照常开始工作。而71队只剩下三、四人，队长丁××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管我们的生活。多次询问没有确切的答复，无奈，我们到建阳第三大队部去请示何大队长。他给我们临时安排到崇雒一个伤病医院去工作了三个月左右，再调回邵武第二教导队林和鸣队长处。与老同事们又会面了，工作性质与以前一样。训练任务来了就去卫训所护病学组，一般都在后方医院搞护理工作。在那战争年代，我们医疗队女同志多，年轻的多，下了班大家在一起聊聊，结结线衫（那时没有毛线都用棉线），工作上，生活上和睦团结，好像没

有什么寂寞无聊的感觉。

1943年10月丁春华携上X光机调到江西铅山五都三战区第19队去，我亦同往。在19队需要助产士，陈生白队长就叫我当了接生员，搞产前检查，外出接生，产后访视。有时遇到一夜有两三个分娩的，大都是平产。也有个别难产，我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当时我也找不到可以帮助指导我的妇产科医师，又不能不管，就凭一点书本知识和在校实习时看到过的难产手术，谨慎小心的干了起来，产家还非常感激我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出格”了！

我在红会医疗队二次被编余，一次在第二教导队时，我们三个新进去的被编余了，不过队长已把我们安排到卫训二分所护病学组去了，一切照常，只是在卫训所领薪罢了。第二次在19队时我又被编余了，因助产士在三战区是需要的，我在卫生处报了军医的名，仍在19队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全体人员一同来到杭州，我回到了老家，结束了我的流亡生活。

回忆在红会医疗队近四年时间，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不一般的。我跨出护校门就到了红会医疗队，一个青年学生在战乱年代里，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上接148页）

医疗卫生工作者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救死扶伤，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虽然他的工作极大部分是为国民党部队服务，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但是他的无私忘我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的，他的贡献应予以定论，他的事迹宜列入史册。

红会六十四医疗队情况

刘廷杰

我是在一九三九年被征调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来到救护总队部所在地图云关后，即编入总队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学习。训练总所设有军事大队部，管理前来学习的军医。这些军医是由各大战区调派来的。我们被征调来的也参加到训练总所学习，时间大约三个月，主要学习战时医疗急救和战时卫生工作，还学习一些军事课，过的也是军事化生活。我在训练总所学习大约有两个月，即分到湖南长沙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大队部医疗队工作。

图云关救护总队部的房屋建筑很简陋，宿舍、办公室、病房、实验室等均为草房，却有一个从当时情况看颇具规模的手术室。由于接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助，这里药品充足、医疗器械较齐全。来这里治疗的伤病人员，均由各地部队转入。

救护总队部医疗机构设置，具有一定规模，设有内科、外科、生化科、放射科、护理部，并设有教务处、秘书处、训导处（国民党下设党部）等，还有一个小图书馆，都是国外捐赠的外文图书杂志。

救护总队部除办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外，还办有放射科训练班，由放射科专家荣独山负责（现任上海医学院放射科主任）。原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余世法就是在这个训练班毕业的。

救护总队部总队长林可胜是个华侨，在国外学的医学，

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主任教授。他在国外有一定的信誉和号召力，接受不少美国和其他国家医药器械及经济援助，也有许多外籍医生来华参加抗日战争救护工作。在救护总队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教授。记得医教部主任是荣独山、内科主任周寿恺、外科主任张先令、骨科主任屠开元（现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生理教研室主任柳安昌（他先在贵阳医学院，是以后调来的），其他一些人已记不起来了。

救护总队部下设几个救护大队部，安排在各大战区。第一救护大队部设在西北地区（记不准确），大队长是万福恩教授（已故）；第二救护大队部设在湖南湘潭（？），大队长彭达谋（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去台湾）；第九救护大队部设在湖南长沙，大队长第一任林竟成（同济医学院毕业、现任武汉同济医学院卫生教研室主任教授），后由中队长唐文铭（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现在广州）继任，林竟成则去湖南东安任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五分所主任。

大队部下面设有几个救护医疗中队。我记得第九大队部下设四个医疗中队。我们在图云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学习结业后，我和国际援华医疗队队长傅拉都（Flato意大利人？）和陶维德、何乐经（苏联人）四人即分到湖南长沙第四中队部（后改为第九大队部），傅拉都和我又分到六十四医疗队。这个医疗队在靠近前线的一个小镇上，有队长一人、医生二人。下面又分为两个小队，每个小队有医护员四人，其中护士一人，卫生员一人。傅拉都协助我带领一个小队工作，他带有翻译，经常下部队了解医疗工作情况及提出一些建议。

当时，我们队有一个卫生助理员负责灭虱工作，并设有

小规模灭虱站。因当时患回归热的病人较多，部队药品缺乏，都是由红十字会供给，开展灭虱工作对防治病起到很大作用，而且费用由医疗队拿出。卫生员还下连队指导卫生工作和开展卫生教育，如建立野战厕所、饮水消毒等。这些卫生工作，需要宣传教育并得到部队领导支持后，才能顺利开展。一般是先建一个厕所作示范，然后进行推广。饮水消毒的工作较困难，官兵们都不愿饮用放漂白粉消毒的水，需经反复宣传教育后，他们才愿意饮用。

傅拉都和我们相处三个多月后，到其他救护队去了，换陶维德来和我一起工作。随后，我们搬到师部医院协助工作，并为师部办了个医助训练班，由我和陶维德以及队里的护士授课。课目有护理、急救、内外科、环境卫生等一般基础知识。学员由各团、营调来，也招收一些其他方面的新学员。各小队住地不固定，当一个部队卫生建设有些成绩后，根据需要再调换一个部队。

国际援华医疗队在 frontline 工作约半年多后，总队长林可胜和大队长彭达谋到前线召集傅拉都等征求意见。后来傅拉都等外国医生，随同林总队长撤回到贵阳图云关，再未返回战区。

第四中队改为第九大队部后，我所在的医疗队即改为九十三中队。一九四三年林可胜去职，由汤蠡舟担任总队长，我即辞职去湖南东安第五卫生人员训练所担任外科教学工作。

记六十四医疗队

吴宏宇

同济医科大学林竟成教授，嘱将抗日战争期内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医疗队工作情况，撰写成文。因为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情景模糊，即一鳞半爪亦非易得，且一队难以概括全貌。考虑再三，以总队结合医疗队的情况，写成此文，以供参考。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总队部初设于湖南祁阳的椒山坪，1938年底迁贵阳图云关。总队长为林可胜教授。林氏原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就学于英国，获英国生理学博士学位，在国际生理学界颇负盛名，在国外华侨、特别在东南亚华侨和美国华侨中有很高声誉，在国内医学界亦为知名人士。一个成长在海外不会中国话的学者，出于爱国热忱，毅然放弃了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教授的优厚待遇和恬静的生活，走上抗日救护的工作岗位。擎臂高呼，从者数千，不仅国内医学界热烈响应，纷纷结集在他的领导下，听候指挥；就是国际上一些同情我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医师和爱国华侨，也不计较艰苦生活和微薄待遇，前来参加医疗队和其他工作。海外华侨还积极开展募捐活动，筹集到大量的款项、医疗物资、救护车和运输车等，不断地运到救护总队部。有的华侨还愿充当驾驶员把车开来参加救护工作。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对林可胜的医疗救护工作的无私援助和积极支持，使他很快地组成了装备比较完整的医疗队、护理队、防疫队、救护车和运输队、X线组等共计

八十多个队，奔赴到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个抗日战场，开展救护、防疫、医疗等工作。

救护总队部下设医务、总务、财务等部门，附设有医院、药材库、运输队。义肢工厂、汽车修理厂以及工作人员宿舍等。原来是荒僻的图云关出现了一大片建筑群，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医务部门由荣独山教授任医务主任，下设高级技术指导员，他们一面下医疗队进行指导；一面对战伤、防疫、卫生等措施进行研究，并编印了相当手册一类的《内科规程》、《外科规程》、《护理规程》、《环境卫生规程》等具有实用意义的参考书发给各队应用，颇受欢迎。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医疗队的某些成员进行培训，并为部分知识青年开办了护理员培训班，使医疗队的人员素质有所提高，医疗队的数量也增加到一百个以上。

救护总队有鉴于部队军医水平较低，于是成立卫生人员训练所，由林可胜任所主任，抽调军医进行短期培训，使能适应战时的医疗救护工作，在取得初步成果后，又逐步增设了五个分所。此后，国民党把训练所和分所改隶于军政部，称“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各分所在全衔下加“第×分所”。

救护总队下设九个大队，大队下有中队，再下为队。队以医疗为主，有少量的护理队，以后又把护理队并入医疗队。至于防疫队、X线组、救护运输队则属于大队部，队数不多。医疗队人员，早期约15至20人，其中医师3至5人，护士及护理员10至12人，此外还有事务员、炊事员、勤杂工等。接近前线的，因交通不便，又需要及时运输伤病人员或及时就地抢救，所以配有10人的担架队、一匹马和马夫。

医疗队要保持机动灵活，药材的配备比较简单，但基本

上能进行治疗和对创伤的处理，包括抢救、骨科手术等；此外还配备一架美国出品的显微镜，可以开展常规化验。如当时我所率领的第64医疗队，驻在湘北汨罗江岸长乐街（属湘阴县）的一个师野战医院，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担负着有20多张床的重伤病员的治疗工作，同时还分出两个组到前沿阵地协助医疗工作。力量分散，工作比较紧张，药材消耗虽大，都能从大队部得到及时补充。

除了医疗工作外，我们还常在第九大队大队长林竟成教授领导下，和第49医疗队一起，为所在的国民党一个军举办了军医短训班和协助连队改善环境卫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有培训和环境卫生改善的计划，都由林竟成教授根据实际情况，经与军医处的领导商讨并获得军、师级领导支持而后亲自制订的。短训班分期集中了各团和野战医院的军医，结合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授课内容，做到课堂与实际结合。主要内容有：战伤的处理，包括止血、扩创、固定以及休克处理等，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军队卫生，伤病员的护理等。少讲理论，多谈具体应用。示范之后加以复习，便于巩固，也得到锻炼。野战医院军医还到医疗队的手术室担任助手。因此，他们在培训后丰富了医疗卫生的处理方法。

在改善部队环境卫生中，着重抓了：（1）改善饮水，要求先过滤再煮沸，过滤因地制宜，设计了几种土砂滤井或砂滤桶；砂滤后水质仍差的加漂白粉消毒，并测定余氯。

（2）改善厕所卫生和粪便处理，做到厕所无蝇无臭味，处理粪便及时、合理，厕所窗门有防蝇设备（一般用竹篾制成的土纱窗，门内有一条暗道）。（3）注意厨房卫生和食品卫生，要求厨房内无蝇，食品新鲜清洁。（4）注意营房卫生和个人卫生，保证有适当的通风、照明和清洁整齐等。方法

先在一个连队试点，并发动官兵献策，土法上马，在不花钱只出力的情况得到改善。通过组织参观，加以推广。然后以师为单位，组织检查评比；再由全军组织评比。检查内容定出具体项目和标准要求，每项定出分数，依总分多寡分出高低。这项工作涉及到各个队的荣誉，都愿积极开展，一般搞得较好，成绩也颇明显，部队的患病率有所下降。这个部队的环境卫生得到改善，经救护总队部的检查，邻近的第三大队（在江西）和一些医疗队前来参观，甚至在贵州安顺的国民党军医学校的教务长也闻风而来，都给予好评。

药品器材的供应虽能及时，但也偶有脱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得自行设法解决。记得当时64队急需石膏绷带而一时供应不上，野战医院又不备此带，于是购得生石膏，炒熟后制成石膏绷带。又如一次回归热流行，除发动部队灭虱外，临床上需要涂片镜检确诊，而瑞脱氏染剂供应脱节，则改用美蓝代替，取得同样结果。白细胞计数的醋酸缺少时，则用当地的白醋代替。诸如此类，使在前线的医疗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自林可胜出掌救护总队的六年（1938—1943）内，所用的经费和药品器材等均来自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赠，据说捐款达六千六百万美元（在当时可说是一项很大的数字）而从未用过国民党的一分钱、一粒药、一块纱布。由于林可胜工作成绩昭著，在国内外的声誉日隆，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党中一些人的妒忌、中伤，又利用他派医疗队到八路军、新四军协助医疗工作的机会，说他思想“左倾”，有“通共”之嫌等罪名，逼使他于1943年辞去总队长之职。

林可胜逝世已十多年了。他在抗日战争中，率领二千多

（下转141页）

我在红会救护总队的经历

徐 植

首先应该说明：第一，我是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救护总队工作的。在一九四二年前的情况不是亲身经历，如有与其他同志报道有抵触处，应以其他同志报导为准；第二，我在红会不过是个中队长，接触不广，这篇报道大半是我所在中队的情况，仅此一斑，未必能代表全部红会的活动；第三，事隔多年，仅凭回忆写来，难免事实前后颠倒，所有人名几乎完全忘记，有的连姓都想不起，只好不写了。

当时红会总会在重庆小龙坎。关于红会总会的组织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主要负责人是潘秘书长，据说此人曾在美国呆过，英语说得很好，其他就一无所知了。

救护总队部（以下简称总队部）在贵阳图云关。从羽高桥沿马路上坡不远，就可看见总队部的牌子。总队部马路的对面是第一诊所，沿马路上行是材料库、运输科等，再上面便是“员工疗养室”。山坡上有许多草房，都是职工们搭盖的临时宿舍。

当时的总队长是胡兰生。在胡以前是林可胜。林生于外国，在国外生活很久，中国语文较差。据说当时各医疗队给他写的报告，需用英文，否则不看并罚重写。但他颇具爱国热肠。当时的抗日中心是延安解放区，他特派两个医疗队到延安去为伤病员服务，并及时补充药品、器材，连美国捐赠的“罗斯福布”都给队员们做衣服带去。据说当时用“罗斯福

布”反面做衣服，是延安队先搞起来的，以后内地各队也纷纷仿效。据说蒋介石对林的这种做法很不满，但对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蒋一向依靠美国人，而林恰恰是‘美国’“名流”所敬佩的人物。传说蒋介石曾有一次决心整他一下，被宋美龄阻止了。

副总队长叫汤彝舟，曾做过东南医学院的教务总长。他长于外科，为员工们做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手术，结果都很好。他常年住在图云关统理一切事务。胡兰生不常来，我在贵阳的几年中，只见他来过一次。

总队部的组织我不大清楚，只知道有医务、材料、人事、总务、运输和财务等几个科。医务科长马玉汝，系南通医学院毕业。此科最大，一切大、中、区队及总队部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属此科管辖，因而人员也最多（以后改为业务处）。材料科长赵人俊，系同济医学院毕业。该科主管一切卫生器材、药品的调配与报销等业务。总队部有个材料库直接归他管，各大队也有材料库，但由各大队和材料科双重领导。其他各科的情况，由于接触较少，就不清楚了。

大队的数目，是根据战区数设立的。最初有四个大队和一个预备大队（医务科长兼大队长）共五个大队。以后战区增多，扩充为九个大队。大队部的组织我不清楚，只知道第四大队长叫舒道隆、第九大队长叫林竟成。

我于一九四二年夏季到贵阳。当时贵阳正流行“霍乱”。我到总队部医务科时，见墙上挂着一幅贵阳地图，上面插着许多小旗子。我问科内同志：“这是干什么的？”他们说：这是疫情分布图。科里每天有人去收集疫情情报，根据患病人数和地点，在地图相应位置上插上小旗子，就可以看出疫情分布情况，以便推断出发病的原因。你看，小旗大部分集

中在大南门的南明河附近一带地区，说明本市“霍乱”的流行与饮用河水有关（那时饮用自来水尚不普遍）。因此，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办法，预先配好一定浓度的漂白粉溶液，守候在取水码头上，见有人来挑水，就在他的水桶里放上一勺漂白粉溶液。果然，贵阳的“霍乱”很快就被控制住了。这说明总队部除指挥各大队所属中、区队做好前线“救死扶伤”工作外，总队部本身还协助地方卫生防疫部门扑灭当地疫情和开展环境卫生工作。

我所在的十六中队最初是在“贵阳师管区”工作。师管区的任务是集中所属各地的新兵略加整训后，送往前方。由于新兵从各地步行而来，旅途劳累，病者甚多，加上管理人员的克扣，伙食很差，导致营养不良，病上加病。我队队员们对此很有意见，于是向总队部反映，又由总队部向师管区交涉。结果，把病兵伙食费全部由病兵领来自办伙食，病兵逐渐减少了。这也是我们为新兵谋福利的一个具体事例。

送走一批新兵后，我们中队就无事可做了。恰巧这时从外地开来一个后方医院，该院吴院长到总队部请求协助。总队部就派我十六中队到该院协助工作。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该院把所有医疗工作都推给我们中队，他们院方只办理行政管理事务。吴院长对我中队人员极力拉拢。他屡次拉我去吃馆子，都被我拒绝了。记得有一次，他的上级（大概是军政部）派一个专员来视察。吴院长大忙了一周，忙着整理内务和大搞卫生，最后大摆筵席请客。他邀我作陪，我推辞不脱，只好奉陪。席后他们要打麻将，我推说不会，先告辞走了。

吴院长虽然“能干”，但不是用在关心伤兵身上。那时，正值寒冬季节，伤兵们的棉衣、被子爬满了虱子。我们看病时总

是穿上两件白大挂预防，也多次用蒸煮灭虱，但虱子太多，一时难以肃清。这时贵阳正流行斑疹伤寒，院中也发生此病，我虽极力预防，也难以避免，在图云关疗养室住了一个多月院，才幸免死亡。

后方医院开走后，师管区又来了一批新兵，十六中队又回到师管区工作。这时抗日战争国军节节败退，湘桂一带难民纷纷向贵州疏散。总队部派我带领一区队人到都匀就地为难民治病。另一区队仍由区队长宓泰治带领，在师管区工作。我到都匀后即设立诊所。难民们内科方面的病多半为上感和疟疾。这时是冬季，没有蚊子，难民们的疟疾是夏秋季感染，未得到彻底治疗而复发的。外科多半是下肢外伤，皮肤病多半是疥疮，于此可见难民们平时生活之困难，与逃难时之艰苦了。

直到“黔南事变”的前夕，我们才准备回贵阳。那时传说敌人已到独山，人心慌乱，一夕数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我们苦无交通工具，只得各人分别携带公家药品器材，步行回筑。走到火车站时，正值站上人员疏散，临行前焚烧仓库以免资敌。一时火焰冲天，浓烟滚滚。逃难群众误认为敌人已到，惊慌万状，将所携带行李什物弃置满地，迅速奔跑，一时呼叫啼哭，秩序大乱。我队队员们不明真象，也将所带公私各物随地抛弃，致使药品器材损失殆尽，殊为可惜！

步行毕竟缓慢，傍晚才到达马场坪。我们在路边空房中住了一宵，次日拂晓上路，走出数里时，遇到第四大队的汽车，才搭乘回到贵阳。这里，可说明两个问题：一、红会的医疗队，没有总队部的命令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撤离工作岗位的；二、总队各大队之间是相互关怀照顾的，如这次我

们遇到第四大队的汽车时，车上虽然已很挤了，但他们仍然欢迎我们上车。

到贵阳后，许多机关早已疏散，总队部也把部分重要文件送往遵义，惟汤副总队长、马科长及医务科的王从炎股长还坐镇图云关。其时贵阳到处是难民，各影剧院都住满了人。总队部派十六中队全队在中华电影院设诊所为难民治病。以后难民他去，又派十六中队接管图云关第一诊所和疗养室。这时我在图云关才得较长时间的居住，也正是这时，我才对总队部有了一些了解。

不久日本投降。总队部的人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不过当时大家对日本投降的原因是认识不清楚的，大家一致认为是一颗原子弹的功劳。记得当时我信口吟了几句诗：

八年抗战历艰辛，倭寇投降正义伸；

核弹两枚成棒喝，促他猛省识迷津。

这说明我当时的认识也和大家一样，只是解放以后通过学习才知道了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

总队部开大会庆祝抗战胜利，正值总队部秘书江晦鸣结婚，两件喜事一同庆祝，分外热闹。不久总队部将迁南京，据说迁南京后即将解散，大家相处日久，不胜依依惜别之情，于是在图云关开了一个晚会，并发给每人一本纪念册。以后总队部又派我接管大西门社会服务处的诊所，该所属红会和社会服务处双重领导。该诊所在红会总队部迁南京后，即完全由社会服务社领导，我就算脱离红会了。

救护工作四年

邓德尊

一九三八年夏，设在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长沙招收救护人员。在“芦沟桥事变后”、上海沦陷，日寇飞机也已闯入湖南，我们十分愤慨。当时我正从平江县回长沙探望母亲，见到红十字会招生，就去投考。因我有湖南省卫生局所办的长沙县卫生院妇婴卫生训练班的毕业文凭，又是平江县卫生院妇幼卫生助理员，即被录取。

我们在长沙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学习内容包括救护常识、军事训练、宣传抗战等。在我们受训的一个月中，武汉失守、长沙大火。我们随红十字会撤退，坐火车到祁阳。受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湖南零陵红十字会第四大队第十七医疗队工作。队长周家仪（女），在十七队工作一年多，主要救护运来的伤病员，因当时附近战事不多，伤员也不多，多数来的是部队的病员，大都患有霍乱、梅毒、疥疮。另外，我们也对当地老百姓开展家访，有什么病就给他们治什么病。常见的病有痢疾、霍乱、花柳病、疥疮等，我们除发给药品外，还散发卫生宣传材料。

一年多后，我被调到四大队的第四十四医疗队（是总部荣独山发的调令，调令现还保存着）。这个队在广西全州，队长王兴国（男），是外科专家，队员有吕珩、邓廷康、刘宏大等（现仍联系密切）。当时医疗队是在临时的手术棚中进行外科手术，我做医佐工作。工作包括手术中的助手及术后护理。几个月后，医疗队调到大队总部所在地柳州。在柳

州伤员增多，手术量也增加了。此时，我结识了现在的爱人丁振岐，当时他在柳州红十字会汽车修理所任所长职务。

一九四〇年，红十字总会从各队抽调人员去贵阳总会训练班学习三个月，我第一批被抽调去学习。学习内容有医护技术、公共卫生、严格的军事管理、军训。结业后仍回原队，加强队里的公共卫生工作。我回队后，又调吕珩去贵阳图云关总会训练班学习。

当时红十字会人员有自己的制服和工作服，药品和医疗器械也比较齐全，这些都是海外爱国华侨及国内抗日人士都助的。我们医疗队中，大学、中学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互有，文化程度虽不同，又来自各个地方，但大家都能团结捐助，积极性很高。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候有伤病员来，就什么时候接待治疗，大家都积极主动地干工作。一有空闲时间，就抓紧学习。我们几个文化程度低的年青人在文化程度高的同事帮助下，自学数理化和外语。那时我就打下了中学的文化基础，为以后能进入大专程度的中央高级护校学习创造了条件。

医疗队的工作独立性很强，在收治伤病员的常规护理以外的时间，都由自己安排，并要应付随时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在全州时，日本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飞机一来，大家抬着重伤员，带着轻伤员离开木制的临时病房，到田野的沟里躲空袭。个别上了石膏的重伤病员不能动，所以要派人在病房值班。有次同事吕珩、陈雪贞两人在做病人半流质饮食时，房子被日机炸弹击中，吕珩上背部中弹片受伤；陈雪贞双腿被炸骨折，房屋炸坏，人员受伤，照片现仍保存着。除了救治伤病员外，医疗队经常到老百姓家宣传抗日救国、预

（下转166页）

红会救护总队与卫训所的培训关系

姚仁里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阳图云关是个富有朝气、生机昂扬的地方，也是一个大批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云集的中心所在地。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就设置在那里。其他尚有盟军援华医疗机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贵阳陆军总医院等单位。虽然单位众多，但却以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的医疗卫生技术骨干为中心，对各单位的工作开展，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救护总队的一些主要医疗技术人员如像，荣独山，张先林，周寿恺，周美玉，屠开元等很多人，同时又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主要教师，又是贵阳陆军总医院各科室的一些负责人，各单位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很难予以截然分开。一切医疗，教学培训安排与计划无不出于他们之苦心筹划，真有如一个单位之感。那时我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第一期分期军医教育班的学生，对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培训工作方面有一些了解，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特作如下回顾。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由军政部所管辖。但在培训计划和管理等各方面，均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和贵阳陆军总医院有着密切关系，主要教学人员大多来自这些单位。当时的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就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的所主任。分期军医教育班的创办就是他提出而举办的试验性教育。该班

招收初中毕业及高中肄业学生，学制为八年，在校学习两年后，分配到部队见习一年，再回学校学习两年，再返部队见习一年，最后两年在校学习和留医院实习。如此反复培养训练，既掌握理论知识，又有了实践经验，这样可达到医学院毕业水平。这个计划由于抗日战争胜利与相同机构合并而未全实现。卢致德任所副主任，主持经常性工作。所内有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两个体系。学员大队为对在职军医进行复训和提高的工作，为短期训练性质，每期培训六个月后回原单位工作。学生大队为养成教育，除有分期军医教育班外，还有高级护士教育班，初级护士教育班和检验班等。现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荣独山教授当时就是军医科的科长，以后又由林绍文博士接替；周美玉任护理科科长，检验班则由现在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林飞卿及叶天星教授负责培训。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生活条件很差，学生情况就更差了。学校除在僻静的山坡上修了全是通铺的宿舍住房外，道路和环境的修建和培植都是由学生自己亲手建成。打赤脚，穿草鞋，能有一双当时的安顺铁钉底子皮鞋就算很不错了。由于时常有缺粮现象，很多时候吃饭也常是半饱状态。条件稍好一点的就靠家庭接济了。夜盲症和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在学生中都有发生。虽然生活是如此的艰苦，但是在这样一个有朝气、有生机的环境中，无论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救护总队或贵阳陆军总医院，都有着一种较为良好的工作和学习风气。因之还是培养了一批批有好学精神和工作能力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

在学习条件方面，师资的力量是很好的，老师们热心教学，爱护学生，也很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如周寿恺、张先

林、荣独山、林绍文、柳安昌、周美玉、林飞卿、李光华等主要老师，均经常亲自为学员学生讲课，并激励和振奋大家的学习热情。这为学生认真读书，增长专业知识和技能，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当时中文教材很少，很多课程都靠老师编写讲义或翻译教材。教学中又循循善诱，唯恐大家学得不好。如初始学习显微镜的使用（当时显微镜还是比较稀少而又贵重的仪器）及基础课如组织学、生物化学及人体解剖等的实习，指导老师无不在学生身边认真指点，严格要求，务使循序渐进，认真达到学会掌握使用和全面理解为目的。他们从不计较自己的辛苦和疲劳，也不是为了那菲薄的生活待遇，而是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而努力的培养各种卫生技术人员。因而老师们也很受学生的尊敬。但是他们对学生的学习要求也是很严格的，有的课程每两周一次小考，同时每三个月必有一次大考，若此时考不及格则被淘汰退学。

学生的学习也非常努力和认真。那时学校虽能自行发电，有电灯，但是照明度很差，有如点蜡烛似的，并且还是定时送电熄灯。为了学好功课，就是熄灯后大家深夜仍还点着细细的油灯在铺上复习。晨间，很早又在宁静的山间复习功课和学习了。生活与学习条件虽是很艰苦，由于学习机会很好，也就不觉得怎么苦了。并且还因此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风气。就这样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先后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培养了大批的医药和各种卫生技术人员，为祖国的需要作出了它的贡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卫训所于1946年迁上海江湾，与同时迁去的军医学校合并改为国防医学院，林可胜又任该院院长职。

红会救护总队除对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培训各种医药卫生技术人员作出很大努力外，由于林可胜总队长不仅是国

内，同时也是国际上有名望的学者和爱国人士。很多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为了支援我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医药捐赠器材物资，都是直接寄给林可胜分配使用的。同时这些医药器材物资，一部分又是在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扰，直接派车运往陕北解放区的。那时在救护总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贵阳陆军总医院内，有不少的进步人士，有的还很有专业技能知识和声望。但是他们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工作和教学都非常认真，很受学生敬重。他们的言行是学生学习的表率。这在读了解章文晋同志写的《关于抗战时期贵阳中共红十字会特支的一些情况》后，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当时贵阳图云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还是那样的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景象。有那么多为祖国的存亡不辞辛劳努力教学和工作的白衣战士。这是因为那里已有了党的领导和指引。文章中他这样写到“我在贵阳除林可胜外，与一批中、高级医务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等也保持密切关系，使他们了解同情我党政策，一些高级专家如外科主任张先林、x光专家荣独山、防疫专家施正信、卫生工程专家过祖源、内科主任周寿恺等都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贵州卫生史料1986年1期30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那里有了党的指引和党的阳光照耀，那里的事业就能兴旺发达，就能为人民造福。抗日战争时期的图云关和那里的所有医疗卫生单位，就是这样的地方。它为祖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医疗卫生战线方面做出了它的一定贡献。

救护总队卫生材料总库工作简况

于怀卿

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卫生材料总库迁到贵阳图云关后，需要紧迫处理由海外捐赠已运达贵阳的卫生材料，就在图云关公路右侧山坡上，因陋就简盖起了几座竹泥巴墙茅草顶的大房子，开始工作。

当时主要的负责人员，总库长由总队部卫生材料股主任陈璞教授兼任（陈璞在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药典编委会秘书长），下设总务组组长许崇德，副组长凌世雄、陈宗芳等。储备组组长于怀卿（储备组在1940年以前为制作组组长刘干卿原武汉某护士学校校长）。制造组组长前后有陈国信、杨善淦、程连珪（现任贵州科学院副研究员）、赵天睿（现任江西医学院生化教授）等人。组长以上人员都系药学科，系毕业的技术人员。

总务组下设总务、卫材出纳、仓库等三个部门。仓库主任黄政仁，负责整件卫生材料的保管。卫生材料出纳（收发室）负责人贾清远、孙某（中共地下工作者），负责卫生材料的收发和运输。总务负责人吴荣光，负责杂务和人员生活。当时生活物资极为缺乏，蔬菜副食品都要派汽车到安顺、惠水等地去买。

储备组当时分为药品系：主任前后有陈淑真、张向全，保管员前后有吴悠、谢培、张鸣三等。敷料系：系主任秦美丽，保管员张倡苹。器械系：系主任韩真全，保管员德文洁。此外药品、敷料两系各有练习生40余人，器械系有练习生3—5人。名系练习生在系主任和保管员的指导下，按

照《红会卫生材料标准表》的规定整理和分装药品、装备标准箱。敷料系是根据标准表规定的规格大小卷绷带卷和折叠纱布块，做棉花杆。做好后再按规定数量分包消毒，然后再装标准包。器械系也是按照标准表所规定的品名、规格、数量将器械擦洗上油后分门别类分装不同的标准箱。标准箱内都附有所装药品、敷料或器械的规格、数量详细登记表，装时须经系内负责人核对清楚方可钉牢加封。送往仓库储存，以备装车运往战地应用。储备组1943年撤消，各系改为药品组、敷料组、器械组、组长由系主任升任。

《中国红十字会卫生材料标准表》（以下简称标准表）是当时按照战地各种不同卫生单位的任务所需药械、敷料的不同规格数量制定的一本卫生器械手册。标准表的内容基本上符合各单位的要求，同时也减少卫生器材的零乱现象，而且标准箱内物资都已为战场急用做好准备（例如敷料已做好纱布块和棉花杆用时极为方便）。所以当时标准箱制度颇受战地欢迎。标准表内药品、器械、敷料都用英文字母代表。例如：药品用C（Chemicals）代表，标准箱C₁是常见病医疗药品，标准箱C₂是外科救护消毒药品（符号与内容是否一致记不清了），标准箱C₃、C₄……则为眼科用药、牙科用药、防疫用药等等。敷料用D（Dressings）代表，标准包D₁是换药用和包扎用敷料，标准包D₂是手术用敷料如各种手术衣、手术单子，D₃、D₄等标准箱则有石膏绷带等。器械用E（Equipments）代表，标准箱E₁是换药用器械，标准箱E₂是手术用器械，E₃、E₄等标准箱则为眼科器械，牙科器械等等。标准箱外面只标明代表符号和号码，不说箱内的内容和用途。制好的标准箱则由总库运送到接近战地的卫生材料分库（分库一般跟随医疗大队），按期给红会各医

疗队补充，必要时也发给部队卫生单位。

制造组主要是利用当地原料，制造紧缺药品。例如：烧石膏不便久存，则由制造组临时烧制后使用。部队疥疮患者很多，则可制造升华硫黄和硫黄膏等运往前方应急使用。前方眼病增多，则制造硫酸铜、硫酸铜棒等。总之，按照当时紧缺的情况，自行制造一些来补充，起到不小的作用。

各种卫生器材的处理手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属各级医疗队当时所用药品器材，全部由国外捐献进口，运到贵阳后即原箱卸入仓库，然后由储备组各系保管人员会同仓库主任开箱清点，分别登入各主管系的药品、敷料或器械的总帐内。仓库主任也登入本库储存药品敷料器械帐内。储备组还要根据清点的品种、规格数量造表由总库呈报总队部。总队部经卫生材料股核对无误后，则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名义，给捐赠单位出收据。

储备组各系根据每次装备标准箱的数量，将所需药品、器械或敷料列表向仓库提取，仓库则根据各系提货单在库存数量内出帐。各系提回之药品、器械、敷料经过整理分装，再按照各种标准箱规定的品种、规格、数量装备成标准箱。已经装入标准箱的药品器械敷料的数量，就从总帐内出帐。同时登记所装标准箱的个数（各种标准箱内的药品、器械、敷料是固定不变的，则另登记）。储备组每月按照点收和装标准箱的支出数量，作为药品器械敷料总帐的收支项目，按月造表由总库向总队部（卫生材料股）呈报药械敷料的收支及结存情况。标准箱的制作数量也同时呈报。

标准表以外的药品器材，除留给本会各专业队使用外，多余部分也可按军事或社会各医疗单位的申请，酌予发给各单位应用。各单位的领收手续必须完备。申请需经总队部批

准方可发给。本总队所属各大、中、区医疗队所需标准外药械，则可造表由下而上的申请，经总队部批准，可直接到总库领取。标准表外的药械则根据各单位领取收据在总帐内出帐。

在1941—1942年期间，卫生材料总库曾接纳一位美国老药师来库义务服务。该药师名艾逸士 (Aeyirs)，系美国某地一个私营药房的经理。终身未结婚又无子女，为一孤寡老人。他年逾60岁已达退休年龄，即自行歇业，并将他药房内所剩药械全部捐赠给援华会，自己也申请来华服务。他到达图云关后，正当他所捐赠的药械也陆续运抵总库，我们即会同他本人共同点收。他发现在运输过程和库存期间毫无缺损，他对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负责精神，大为赞誉。他在贵阳的工作期间，由于初来中国一切都觉得新奇。但是他不懂中国话，在工作上、生活上以及他要到各处逛逛的时候，都要我们给他做翻译，当他看到少数民族的服装和听到少数民族的语言时，都要我们翻译给他听，但是我们对这些也不懂，无法给他翻译，憋的大家哈哈大笑。他不适应中国的饮食和生活，搞了半年多就病了，又由于他年龄也高了，所以就劝他回国了。

1942年以后，作者离开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材料总库，以后的情况希知道者补写下去。以上我所写的当时总库情况，有错误的地方，希望了解者予以纠正。

参加红会 X光队工作一点回忆

丁春华

我原是在南京教育界工作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侵占了我们大好河山，华北各省相继沦陷、并节节逼近华东。不断的轰炸，疯狂的烧杀掠抢，奸淫妇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生命财产横遭摧残，南京轰炸的悲惨景像，历历在目。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激起我中华爱国青年的义愤、纷纷组织起来，为抗日救国贡献一切力量，下定决心，抗战到底！当时我与大家一起向大后方进发，辗转安徽，武汉等地。沿途多次遭受敌机的轰炸和机枪的扫射等袭击，虽幸免于难，但目睹我们的无辜同胞被炸得血肉横飞，甚至炸死的悲惨情景，更增加了我们对日寇的无比憎恨！

我终于在1938年到达长沙，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 X 光队，经短期紧张的学习操作后，适应时局的急需，我一人携带 X 光机和发电机各一架，奔赴江西前方，到医疗队所在兵站医院或后方医院，为伤病员照 X 光。当时医疗队和伤病员，都迫切地盼望 X 光机的到来，能进一步在临床上检查，诊断。因此，X 光机一经到达，就受到大家的欢迎。一般 X 光透视仅能作初步的诊断，特别是骨折取子弹等方面，但也检查出肺结核等内科病症，得以及时进行隔离治疗。

由于抗战时期的医疗设备有限，尤其是 X 光仪器等缺乏，不能满足各地医疗队及伤病医院的需要。我们 X 光队采取巡回办法，轮流在各医疗队工作，调动是频繁的，任务是

艰巨的，X光机和发电机都很笨重，在运输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必须努力克服，才能及时的完成任务。宁愿自己辛苦，只要那里需要，我就奔向那里，从不推卸规避而延误工作。

记得有一次要到万安红会医疗队去，必须经水路乘轮船前往。交通班船于深夜才到万安，该船将于翌晨就要开走，虽经再三交涉，也无济于事。我人地生疏，一人无法起运X光机，于是摸黑寻找该医疗队，并连夜设法搬运机器，才未误事。为了医疗上的急需，顾不上个人的疲劳，便立即安装机器，开展工作。看到伤病员能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动手术等，解除他们的痛苦时，我也感到欣慰。

1942年5月鹰潭吃紧，我在江西弋阳第26队工作。当时后方医院、伤病员都在撤离，26队也全部撤出到福建邵武方向去。这条路只有翻山越岭才行，要经过光泽、陈坊等地。全队人员徒步行走，要转移X光机，的确有很大困难。要翻过高耸云霄的“云际关”，谈何容易。大家都发愁，有人认为X光机太笨重，很难翻山过关，建议就地埋掉，不要丢给敌人用。我则考虑再三，不同意这个办法。我的决心是人在机在，我决不能弃之不管，再艰难也要把机器运过关。我就空身一人先打头阵，亲自翻山探路，摸清山道情况，作到心中有数，并作好抬机翻山越岭的一切准备工作。经队长同意，决定由我护送机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只要有了决心，就可以开动脑筋。在山高且陡，山路又狭又滑的情况下，我与抬机的民工一起过狭路时，临时架竹排加宽，上陡坡时，则前面二人拉，后面二人向上推动，我则时前时后谨慎小心地照顾，不能让机器滚下山涧。一天的紧张战斗，终于顺利地过了“云际关”。这次的运机过关，对我印象很深。我

虽担了风险，但是，完成了任务，在福建的伤病员用上它的时候，受到了人们的赞许。

在巡回工作中，运输机器，常采取水陆并进。有次（在何处何地，已不能记忆）要经过湍急的浅滩，必需用竹筏运载笨重的机器。在押运途中，出现多次险情，有时水满齐腰，有时搁浅，我竭尽全力稳站竹排上，用粗绳拉牢木箱（装机器的），终于渡过险滩，安全到达目的地，机器经整修检查后，运用正常。

X光机在医疗诊病上，必不可少。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养好机器，排除千难万险，让X光机为抗日救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从而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都被解散。于是我将完整无缺的X光机上交，完成了我应尽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打下了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基础。

以上点滴情况，只是我对40余年前参加红会救护总队工作的一些回忆。时间长久，年老记忆很差，很多事情无法详细说明，仅作参考，希见谅！

（上接155页）

防疾病知识等；空闲时间，就抓紧自学。生活紧张，但大家情绪高昂，团结友爱，互帮互学。在红十字会的四年时间里，我学到了比平常要多得多的知识和经验。

一九四二年，我和吕珩离开了红十字会四十四队，去重庆考入国立中央高级护校，至今没有离开本专业。

回忆贵阳陆军医院

杨锡寿

图云关在贵阳市南郊，距市区约五公里，山高路陡。只有一条粗糙的小路相通，除了长途汽车外，在图云关上的机关职工和居民进城，主要靠小马车或步行。

关上树林密布。山窝里有一片不大的平地，这里搭起了几十栋茅草平房，及一幢较大的飞机形的瓦平房，这就是当时的“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其附属医院“贵阳陆军医院”。在医院的对面，隔着一条公路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也是一片几十栋茅草房，隐蔽在密密的树林中。沿医院左侧向冒沙井去，另有一条小公路（现今已改扩为通往湖南、广西的主公路）直通龙洞堡。从医院到这条公路，是一片狭长的平地，满布帐篷，这就是当时的美军二七野战医院的营地。他们的后勤、车辆及人员，都驻在这些帐篷内。野战医院与贵阳陆军医院合作，病人都住在同一栋病房中。在医院后面的山坡上，是卫训所的药品器材库（抗日胜利后联勤总部接管为军医署药品库）。这样在图云关关上关下，浓绿的树林里，形成了一个战时卫生机构的小“城镇”。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着不下四五千人（包括职工、家属及学员），有中国人、美国人、个别犹太人，还有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爱国华侨，在我到图云关以前，据说还有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各国专家。因此这里不但是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医疗卫生界的一部分精华，也是民主爱国力量的荟萃。领导这几个单位的总负责人就是国际知

名的生理学教授，爱国华侨林可胜博士（Rober Lim）。他既是卫训所所长，又是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还是贵阳陆军医院的创始人。

我是1945年元月才到图云关的，当时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半年的学生，担任内科助理住院医师，所以我只能简介一些有关陆军医院的情况。

（一）一般情况

贵阳陆军医院成立于1944年。抗战时期属军政部军医署管辖，抗战胜利后属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管。到1947年改为贵阳总医院，1948年改为第九总医院，1949年又改为海陆空军第五总医院（以下叙述均称贵阳陆军医院）。当时是西南大后方国民党政府军医署的两个大型陆军医院之一（另一个设在重庆，名重庆陆军医院）。贵阳陆军医院的前称叫“战时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称贵阳陆军医院，但实际仍为卫训所的实习医院。卫训所的建制比当时地方上的医学院要大得多，人员编制也多，因此一些在陆军医院的高级医务人员均属卫训所编制。卫训所的学科设备也较一般医学院齐全，有大学专科班，专科轮训班、公共卫生班、药学班、护士班、护理员班、还有战地救护班等。贵阳陆军医院是林可胜博士亲手培植的一所综合性的教学医院，主要专家教授大都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也有一部分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级专家。据我们的记忆各级医师有来自全国各地十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有协和医学院、上医、中正医、圣约翰医学院、贵医、苏医、军医学校、同济医、华西大学医学院、中山医、齐鲁大学医学院、昆医、浙江医专等，还有美国人）。它的任务是解决战时各地后方医院无法诊疗的疑难重症，同时负责培训军队各级各类的医务人员。1945年初与

美军第27野战医院协作后，医疗任务更加繁重，规模就更加庞大，确可称是40年代抗战后方一所设备先进、人才济济的正规教学医院，在贵阳地区来说与当时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中央医院，贵州省立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相互协作，经常联系，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医疗中心。

（二）主要人员和设备概况

1945年1月贵阳陆军医院（亦即卫训所实习医院由茅草房迁入新建的飞机形砖瓦结构的大型平房，当时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有

院 长 杨文达（协和医学院毕业，已去台湾）

医务主任 荣独山 （协和毕业，放射学专家，现在上海第一医学院）

内科主任 周寿恺 （协和毕业，解放后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已故）

外科主任 张先林 （协和毕业，已去台湾）

内科主任 陶恒乐 （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现任北京医院内科主任）

骨科主任 屠开元 （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现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妇产科主任 熊荣超 （协和毕业，解放后在大连医学院）

儿科主任 陶 涿 （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现在北京）

眼科主任 张祖棻 （浙江医专毕业，美国留学，）

检验科主任 叶天星 （东南医学院毕业，现在上海）

护理部主任 周美玉 （协和高级护校毕业已去台湾）

药房主任 秦远芳 （现在重庆）

总务主任 李心谦（已故）

当时在医院的中青年医务人员，现在大都是全国各大医院或医学院校的专家教授或骨干力量。如外科住院总医师董名声，现任河南医学院副院长，耳鼻喉科教授；内科住院总医师龚念慈，现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内科教授，长海医院院长；内科住院医师许月娥，现第二军医大学教授；放射科住院医师孔庆德，现第二军医大学放射科教授；内科住院医师尤大栋，现北京总后 302 医院主任医师，肝炎病专家；外科住院医师朱通伯，现同济医科大学骨科教授；放射科住院医师颜小琼，现同济医科大学放射学教授；检验科医师黄绛珠，现贵阳医学院微生物副教授；内科住院医师冯刚，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神经精神学教授；放射科住院医师龙名扬，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放射科教授；检验科医师朱无孝，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微生物教授；检验科医师陈鸿珊，现北京中科院抗菌素研究所病毒室主任研究员；内科住院医师任守中，现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内科住院医师武立加，现重庆第七医院院长；理疗科主任冯玉书，现第三军医大学理疗科主任；放射科主任石斯同，曾任遵义医学院教授，已故；内科住院医师袁盛瑞，曾任湖北医学院内科教授，已故；内科住院总医师尤大镛，曾任总后 301 医院主任医师，已故。

目前还在贵阳四十四医院任职，或已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有饶海贤（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金宗彦（内科学主任医师）、黄国材（眼科学主任医师）、钟心亮（妇产科主任医师）。现在安顺 73 医院的有饶体桢（外科主任医师），贵阳公安医院的谢尊恺（内科主任医师）。

另外还有一些骨干力量如金开鼎、屠基永、刘秀景等人

已在国外,还有内科住院医师欧洲、程竹仙两人现仍在昆明工作,王康仲(在遵义卫校任教)。

贵阳陆军医院中的护理力量亦很强,大都是一些知名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生。如中央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生梁多瑜、高剑纹、马振玉、张瑶卿、王文溪等十余人;湘雅高级护校毕业生李嘉谷、郑秀平、梅葆菊、叶冬碧、杨瑜、徐立微、李怡瑜等十余人;贵阳医学院高级护校毕业生侯素波、段兆年、任桂森、刘毅等人;同济高级护校毕业生有石瑞华、周琼英、宋转玉、张风仪等人。以及大部分卫训所护士班毕业的护士。

以上仅仅是我本人能回忆的贵阳陆军医院1945年到1948年期间在院工作的部分主要骨干力量,遗漏的一定很多,决不是全部编制。

当时贵阳陆军医院主要医疗设备,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内最先进的。计有X光机两台(一台200毫安、一台50毫安),能作一般透视、照片和胃肠道特检;有比较完备的微生物、生化检验设备,不但能完成当时临床需要的微生物、免疫学、生化等检查,还能搞些研究工作;有较完善的图书馆,特别是外文医学杂志,因为林可胜博士与国际上有联系,外文书籍杂志进入卫训所的较多较快。加上各科均有高级专家领导全国各医学院毕业生互相竞争、学术空气、学习空气极高。

病房是一栋砖瓦平房,但设计合理。每个病房40张床位,全院共6个病房240张床位;36张床位的普通大病房,分成两个病室,四张抢救小病床分设在两个小房间。护理办公室设在大病房中间,护理人员可透过大玻璃窗观察所有病人的情况。护理办公室两侧为临床检验(由实习医师作三大常规检验及脊髓液、胃液分析、血沉等特殊检查),及医师工作

室，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在此写病历及读书，工作联系十分方便。

当时的生活设施拿现在的眼光看十分简陋。病房门口为开水间，用白铁大壶烧水供应病人开水。每个病人只有一个小茶壶，由病房工人经常冲开水，护士就用水壶喂病人服药到口。冬天病房取暖在当时的贵阳也算是先进的，每个大病房各用两个大汽油桶改装成火炉，烧木炭（木炭价昂贵，但均由美军27野战医院供应）。一个病房有一个班长，四个看护兵，由护士长管理，负责这个病房的清洁卫生及为病人服务等工作，并有一兵值夜班。

（三）贵阳陆军医院的工作情况

贵阳陆军医院从名义上看是国民党的军医院，但因为是林可胜博士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中的卫生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它与国民党政权机关有截然不同的两大特点，其一为进步性，其二为学术性。

林可胜博士，福建籍，英国留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林教授长期侨居国外，不会说普通话，因此与他交谈必须说英语。当时陆军医院（卫训所、红十字总队部）向林博士写报告也是用英文（同时也用一份中文报告）。林博士是一位爱国的华侨学者，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当时他领导卫训所（包括贵阳陆军医院）外，又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总队长。红十字会是国际组织的一部分，在红会救护总队部工作的专家，又都在卫训所任职，他们都是爱国的，也是热心科学技术的，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在林博士国际威望影响下，各地华侨纷纷捐款，赠送物资，支援祖国抗战，并有大批南洋各地华侨参加红会工作。林博士也是美国医药助华会的负责人之一，因此卫训所和红会的经费、物

资、车辆和图书仪器，不少来自国际支援。在这些单位的技术人员的技术津贴，出自美国医药助华会的基金(AMAE)。其中有些主要技术骨干，还直接领取美金津贴（不受国内币制波动影响），稳定了技术队伍的基本生活。虽然住茅草房、吃粗粮，在图云关上大批技术人员，还是日夜辛劳，无私地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当时贵阳陆军医院的规章制度，工作作风都是十分严谨的，学术空气是高的。在各科正直严肃的专家领导下，病案讨论会，病例研究会，读书报告会，教学查房，专题报告等，几乎每天都有举行，促使青年人不断学习，争取上进。我们这些住院医师，人人工作紧张，学习认真，不是在病房观察病情，处理治疗工作、书写病历，就是在图书馆参阅资料。主治医师、主任医师检查病房时，随时提问，如果你张口结舌答不出来，或是病历书写不切合病情，就会受到训斥和责难，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十分丢人的事。因此我们这些医师只知道两件事：一是爱国打日本，做好医疗工作；二是学习业务技术，争取成为专家。

1945至1948那一段时期，据我所知，当时在贵阳的湘雅、贵阳两所医学院，在虹桥的中央医院以及在安顺的军医学校，这些单位的专家教授，常互相应邀讲学讲课，搞学术交流，或与重庆、昆明的医学专家学术经验搞交流活动。1945年冬天北京协和医学院美籍外科主任教授娄克斯，就在贵阳陆军医院讲学和手术示范（我本人斜疝就是示范手术之一）。林可胜博士也在医院作过学术报告（讲题为胆色素循环）。就在这个图云关上，在贵阳地区这块西南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的医务人员，也为新中国积蓄了一些医疗卫生的有生力量。

(四) 与美军第27野战医院合作情况

1945年初，贵阳陆军医院迁入新病房，即与美军27野战医院搞协作。直至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野战医院撤走，我都在医院病房工作。

因为只是一个野战医院 (Field Hospital)，他们的技术力量并不强。院长兼内科主任只是一个少校，一名主治医师是个上尉，其他参加我们病房工作的就只有2名护士（男护士）和几名护理员和士兵，外科有一个主任是中校。这几名医师资历均不深，学识有限，临床经验也不足。虽然他们也来查病房、做手术，但医疗技术和学术水平均比不上我们陆军医院的主治医师。但这个医院有两点是值得提出的；

第一是基本设备尤其是检验科设备比我们陆军医院要齐全（指40年代）。他们能做比较完备的生化检查和微生物培养，还有暗光显微镜；其次就是药库中药品充足，各个病房均配足了常用药品，各种维生素（当时维生素供应在陆军医院供应是困难的）、护士发药换药均可在病房药柜前完成。此外就是图书杂志、特别是美国新出版的杂志，寄来得比较及时，对我们的学习提供了方便。手术室设备也比陆军医院齐全，在当时就可以作全部上腹部手术。至于干血浆的应用，就全部由美军医院供给，我们住院医师用药处方不受任何限制，全凭病人需要。这些当然是因为他们的财力比陆军医院强多了的原因。

第二是他们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高，等级观念强纪律性好。一些在病房工作的护士及工人，只要我们医师一开口叫作甚么，就马上去干，干完了就主动向医师报告情况。化验、照光等检查，只要医师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开医嘱，马上完成，不受时间限制，而且很快得到结果。临时开

医嘱、服药，病人马上就可以得到。特殊治疗也只要医师作出决定，一般五分钟内即可执行。

当时在这个医院工作，住院医师不能离开病房，在图书室或回宿舍都要向护士长交待，病人的病情变化随时要观察，随时作检查，及时给治疗，不受时间约束。当时作为一个住院医师有四怕：一怕病情变化，观察不及时，延误治疗；二怕病历完不成写不好；三怕上级医师提问答不上来；四怕学习新东西跟不上，比别人差。我的感觉是当医师比当学生要苦得多，紧张得多。

（五）抗战胜利到解放前的贵阳陆军医院

抗战胜利后，贵阳陆军医院已改名为贵阳总医院，由联勤总部领导。院长由张祖棻接任，医务主任杨名时，总务主任李心谦，内科部包括小儿科检验室由尤大镛负责，住院总医师杨锡寿。外科部包括放射理疗、五官、妇产等科由金开鼎、屠基永负责，住院总医师朱通伯，检验科由黄绛珠负责，放射科由石斯同负责，五官科由饶海贤负责，理疗科由冯玉书负责，护理部主任王志清，手术室护士长为刘耀明，药房主任秦远芳。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专家，都在1946年上半年，先后离开贵阳去上海，在林可胜博士领导下创办国防医学院工作。

1948年上半年，金开鼎、屠基永、尤大镛、杨锡寿、朱通伯、黄绛珠等也先后离开图云关去上海或去美国。

此后内科主任由练梅清负责，外科主任马志千，护理部主任李文芳，内科住院总医师先后由冯刚、谢飞伍继任，外科住院总医师先后由康继光、武立和、钟心亮继任，内科住院医师有程竹仙、欧洲、游启昌、王康仲、徐佑堂、金崇彦等，外科住院医师有饶体楨、刘树屏、戴恩光、李清、刘寿

之、黄国材等。

贵阳陆军医院自开办以来一直到贵阳解放，除以上所述各级医师、前后有不少更迭以外，还一直有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实习生参加工作，其中派实习生最多者要算当时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及后迁上海的国防医学院的学生。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除院长张祖棻只身去台湾外，其他人员、设备基本上完整保留，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

此稿请曾经二位同志函44医院钟心亮主任及贵阳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副教授黄绛珠，补充一些材料，特此致谢。

难忘的岁月

——记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医疗队在缅甸

汪犹春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贵阳南门外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总队长兼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林可胜奉命前往缅甸，部署为与英国部队并肩对日作战的我远征军伤患收容、医疗护理工作。当即组成了三个医疗队，派上海医学院毕业的三位青年医师计苏华、严家贵和龚念慈领队；一个救护车队，由运输股修理所长张世恩为车队长，配备了南洋一带回国投效的华侨司机，机匠韩福禄等若干人。运输股主任胡会林、华侨外科医生王贵恒和我三人随从林总于四月五日起程。满载着医护人员和医疗器械的车队除经昆明时稍作停留外，一路加速，没几天就出国境到了缅甸腊戍。红十字会腊戍办事处主任曾大钧接待我们，林总即赶往前线向远征军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报到请示（史迪威过去在北京美国大使馆任武官时，和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理学专家、教授林可胜是老朋友）。

林请示回来，传达了立即要办的几件事：（1）推进西保，那里华侨集中，红十字会仰光办事处（主任陈朝俊）已撤退在该处，可取得便利。（2）西保附近山甘达夫的一座土司别墅已洽定作临时收容医院，三个医疗队即刻前去布置预备好手术室。（3）取得西保地方官、商协助，马上招标

建造以竹子为主料的几个简易医院备用，越快越好。（4）等西保任务做得差不多了，应在眉苗租房作办公地点，那里离前线较近，消息灵通，联系方便。到了西保，把三个医疗队安顿在土司别墅后，我们找到了红十字会仰光办事处，该处陈朝俊、王祖箴等都是贵阳总队部会计课老同事。这里的华侨给林总介绍了一个会讲英、缅语和中国北方话的香港大学生何育林作翻译员，还介绍了一个熟悉缅甸境内路线、驾车技术较高的小轿车驾驶员马来亚人王瑞同（这两人后来都回到我国大陆工作）。当我们找到营造业主签订合同并付出第一期款开始动工时，我们在西保的人员和车辆全部迁移到了眉苗（近曼德勒）。这里是缅甸避暑胜地，风景优美。林总、胡会林和我先一日到达。我们租到一个本地女教师家的余屋作为办公室和住宿，她会讲英语，并承包我们一天三餐（西餐）。女房东受过高等教育，和我们和睦相处。汽车队的车辆就停放在附近空场上，司机、机匠等的给养由英军兵站负责补给。

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远征军在前线某处连续打了两个胜仗，日敌损兵折将，大伤元气。消息传来，令人振奋！敌人从仰光大量调兵增援，急求反攻。我军则严阵以待，迎头痛击。

这时眉苗召开紧急会议，蒋介石亲临参加。会后透露消息，前方英军士气不振，不敢与日军拼搏，往往拖住中国三十八师孙立人部队，掩护他们向西撤退去印度。因此不免留下多处缺口，给日军北进以可乘之机而牵动战局。为此林总于四月二十日夜里要我作伴，叫王瑞同驾驶小轿车去前线请示史迪威将军。沿途军运频繁，越接近前线，检查盘问岗哨越多。夜十二点才到目的地，我和王瑞同没下车。我注视着

林总与史迪威将军两人站着用英语谈话。我第一次见到史迪威，他是个高个子，推光头。将军谈话的姿势既严肃又常摆手，似乎战局紧张显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大约二十分钟后，两人握手，又互相致礼告别。林总上车后，沉默寡言。回到眉苗，快天亮了。

天一亮，林总立即召集全体人员讲话。内容大意是：由于日军增援了机械化快速部队，已开始从缅东部绕道北进腊戍噶町，以隔断中国远征军归路。因此，三个医疗队带伤病员回国，其他收容所卫生大队，行动另由兵站卫生处通知。运输股主任胡会林因检查国外内运红十字会物资完毕，已先期回国。至于西保四周的简易医院工程只得放弃了。

四月二十三日，一切准备就绪，由张世恩领队起程径去腊戍回国。不料王贵恒医师突然来报告坏消息，说敌人快速部队就要到腊戍了，要我们改道密支那去云南腾冲。说罢，林总命令马上开车西行。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眉苗的中国人。途中已听到曼德勒方向的隆隆炮声。

过了伊洛瓦底江，一打听：大桥快要炸毁了，没有开火车，公路又不通汽车，大家傻了眼。怎么办？有人嚷着：

“江边不是有条大轮船吗？”一个司机说：“请张世恩工程师上船检查一下。”张工程师飞快地从江岸跳上船头，仔细检查后，大声报告：“总队长，轮机还是热的，大概是船老大怕敌人来抓差跑掉了。这条船是烧木头发动的，叫大家在岸上多找些木料来就可以啦！”林总问：“谁来开啊？”张答：“当然是我啦！”众人异常兴奋，一忽儿功夫就找来一大堆木料。上船后，大家自觉地组成一条燃料输送流水线。船沿江边航行，开始还很顺利。林总十分警惕，密切注意两岸动静和天空。忽然听到远处有飞机声，接着发现十几架日

本机群过去了又折回来，他立即命令船靠岸。大家下船后都匍伏岸边，一会儿敌机扔下炸弹，燃起了火，原来都是燃烧弹。我们每个人的耳、鼻、嘴里都有硫磺烟味，全身都受污染。敌机走后，我们清点人数一个不缺。船经过清洗后，继续行驶。傍晚到达喀什，由此去那巴可乘火车直达密支那。我们都可惜遗弃了好多辆外国侨胞赠送的红十字会救护车，更痛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

我们为减轻负担，把私人的行装压缩到最低限度，连夜步行到那巴乘火车。火车第一节车厢装着远征军兵站仓储的弹药，其余车厢是中、英、缅、印掉队的伤病员，还有不少机关单位避难的人员。林总和我两人上了最后一节车厢。行到半路，突然发生了撞车事故，第一节车厢的弹药全部毁掉，押车官兵数人遇难。经查明，原来是被日方收买的缅奸买通前方小站火车司机，把一列空车开到我们运行的轨道上来造成的事故。一日数惊的乘客们乱糟糟地没了主意。有个英国下级军官看到林总领章上是一颗金星（军医监少将衔）就跑来行军礼，恳求林总召集众人商议。林总义不容辞，首先率领十余人到车头相撞现场察看。有人建议，我们被撞的上行车头出轨倒了，但下行车头仍在轨道上可用。林总问：“谁会开火车？”一但红巾包头的黑脸大汉答道：“I Can（我会）。这位大汉上车头仔细检查后，就试着开了一段倒车，又开回原处停下，下车后很有礼貌地请林总下令叫大家快上车，并同时挥手高呼“get on！”当天下午我们到达了密支那到云南的第一大站莫岗（孟拱）。

莫岗有滇缅铁路局中方人员。我们下车后就打听消息，据说能否北上，要等下行车开来后才知道是否可另开区间车。于是，我们把行装集中在月台上等待消息。傍晚，从密

支那开来的区间车带来了坏消息：日军快速部队即将占领密支那，目的是要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归路，加以歼灭。

归路既被截断，林总作出最后决定：“上野人山，去印度，再回祖国。”当晚，请准滇缅铁路局中方人员协助派两辆卡车送我们西去孟关办事处。该负责人告诉我们可去新背洋，那里有英军补给站，领取粮食再上山，我们只好照此行动。到新背洋时已是深夜了。

新背洋畸形的热闹，好似一个乡镇集市。这里有军方的补给仓库，还有出卖骡子给上山的人驮粮食的；有出卖劳力为上山的人用头顶行李被盖的（以印度人为多数，他们用头顶负重运输）；有出租大象的，但要价很高。大象背上安装有坐人的木框子，能在密林里穿行，过河时，坐在木框里的人不会被水打湿衣服。

林总派人到军方补给站领了二十袋军粮，又买了十匹骡子，每匹驮两大麻袋粮食，另外雇了十几个印度苦力顶运行李，这些人是要逃回老家去的，不讲价钱，说好到了印度随意赏钱。一切就绪后，天一亮我们就浩浩荡荡上了野人山（那加山）。

林总、王贵恒和翻译何育林在前开路，张世恩和我作伴。林总问我随身带了些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我带了一件棉大衣，下雨时当雨衣（这里雨季几乎每天下雨）、夜里当被子，两只大口袋里分别装了糖和盐，还有两盒火柴放在胸口处防潮，有了它，可以生火，也能吸烟，另外还带了两磅军用压缩饼干。林总听了说：“真有你的，亏你想得周到。”一天的路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道路弯弯曲曲，难以计算走了多少里路。天黑了，就找个有水有树的盆地过夜。吃饭时，汽车队的炊事员煮一大锅粥，大家就用粥下干粮，有

少数印度苦力也吃我们的粥和干粮。这样走呀走，道路难行，速度也越来越慢，遇到泥泞山路，一天只能走八、九里。到第七天，我们见到了军政部第一七七收容所吴凤荪所长的队伍。据吴所知，我们三个医疗队和全体伤病员乘汽车早就通过密支那回国了。一七七收容所缺少交通工具，重伤的伤员多，用担架抬，来不及到腊戍，也赶不上取道密支那。吴所长边说边叹气。从这天起，我就和收容所本部的王军需、张副官等在一起，因而得到他们很多照顾。这个所竟然用担架把重伤员一直抬到印度边境的利多，沿途受到外国军民的赞扬。

一七七收容所人多办法多。他们规定上午半天赶路，下午提早整休。在停下来时，张副官就督促士兵们用缅甸刀砍竹子和摘大芭蕉叶，盖起许多避雨防露所。炊事班搭灶搞伙食，进餐是先伤员后官兵，井井有条。夜里分组背对背围一大圈睡觉，实际是闭目养神而已。每个圈有值班警戒，防止山里豺狼虎豹的侵害。我们没有见到老虎，但夜里能听到老虎吼叫。山谷里，“孙悟空”的后代多，一次群猴占据了我们必须之路，逼着我们在猴群中穿插过去，但是你不惹它，它也不惹你。

吴凤荪从林总那里回来后告诉我：“他向林总汇报了一七七收容所撤退的经过情况。他称赞担架队能吃苦，是救死扶伤的好模范，并夸奖我领导得好。我们临分别时，他还叮嘱我，遇到红十字会掉队的人员要加以帮助”。

在野人山走了半个多月，我没见过野人，沿途倒见了些死人和“活死人”。“活死人”，是指躺在路边饿得一动不动的单身汉，过路人拿脚拨一下，他会张着嘴要吃的。有一次阴天下雨，我很疲倦，山坡上有个竹皮茅草搭成的三角形

窝棚，里面黑魑魑的，就低头进去和衣（穿着那件当雨衣被子的棉大衣）而睡。第二天亮光射进棚里，才看见左边躺着个僵尸。野人山，可能是外国人的俗称。记得在莫岗时，有个山东老乡（他在缅甸经营丝绸生意）说，什么野人？其实是山上有个少数民族“克钦族”，现在战争时期，他们看到这么多军民涌到山上来，怕大祸临头，躲到深山老林或山洞里去了。

我在山中走了二十天之后，追上了张世恩一行。老张对我讲了我不在时发生的几件事情：

1. 驮粮食的十匹骡子已有五匹摔死在山沟里了，余下的五匹也难保不出问题。

2. 顶运行李的民工现在只有二人随行，一个是给林总带东西、另一个是给张世恩带被盖的，都比较轻松。其他民工也许途中出了事故，有的或许体弱病死了也说不定，到了利多大概就知道了。

3. 林总昨天被一架小飞机接到新德里总督府。听说来迎接的是印度军医署长，是林总当年在英国爱丁堡医科大学当教授时的学生。

4. 听说再有四五天可到目的地。前面不很远的地方有英军设立的接待站。

果然，又走了五天到了英军接待站。我们吃饱喝足了，就在用长木棍排列成的统铺上睡觉。将近一个月了，我们都没有睡个好觉，睡在这硬棒棒的铺上也觉得很舒服，一个个打起了呼噜。第二天一清早，大家吃了早点，神清气爽地步行来到终点站——印度阿萨姆省的多利起点火车站。上了火车，很快就到达玛格列特站下车。这里设有数不清的白色帐篷，我和张世恩被接待住进一个两个铺位的军官级帐篷，由

英国女护士看护。护士小姐告诉我们，这里是军区司令部特为从缅甸撤退来印度的中国军人设立的短期休养所。来的伤病军人另行安置。

在休养所住了七天，我们又乘南下的火车到迪布鲁加尔。这里是印度北方避暑胜地，也是北区边防司令部所在地。听说林总从新德里回来，受到司令官礼节性欢迎仪式的接待，并陪同检阅了边防部队。我们一到站，就受到英军联络官员罗克上尉（Capt. Rock）接待，并请张世恩和我二人坐上吉普车送到军官宿舍。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先我们到达的远征军兵站卫生处长杨治白，一七七收容所吴主任、王军需、张副官等。罗克上尉相约，今后每天上午他亲自来接我到车站，接待从利多送来的中国官兵，以便分别安顿。

林总从新德里回到迪布鲁加尔后，借到一位茶园主（英商）的别墅两间房屋，作宿舍和办公室。我们到达时，林总已去加尔各答莱姆加（Ra merca n）中美合办新兵训练中心，筹备卫生处事宜。他留下指示，说重庆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蒋介石表兄弟），已来此主办我国军队一切补给工作。如果部长有所吩咐，要我和吴凤荪所长尽力办妥。几天后，俞部长派黄秘书来传话，他要召见我和吴所长。我二人当即前往。俞部长见到我们很高兴，交代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委座（指蒋介石）有密电来，杜聿明的部队在撤退进印度深山老林里时，被疟疾和痢疾传播，急需特效注射液和药片。因此，派我们即去丁江机场附近的我国内运物资仓库，找周处长查提货单，取出这种特效药即送机场，交美空军投送，越多越好。俞部长最后说：“我已关照西南运输车队派吉普车送你们去，完成任务后，回来告诉黄秘书就行了。找出的药品交周处长，由他去丁江机场找美空军办理。那天我

们一直忙到傍晚，找到了五箱针药。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从利多来的中国军人没有了，车站接待工作结束。此后，我整天在林总办公室里整理报销单据和帐目。有天午后，远征军三十八师孙立人师长来拜访林总。孙师长是美国著名军事学校西点大学毕业生，他与林总相识很久了。两人用英语交谈，我在一旁听到了下列内容：

（1）这次到国外参战是失策的，上了美国的当。英国军队退出香港，放弃新加坡；仰光失守后，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我的部队常被死乞白赖地要去支援，等到我们把日军打退，派人去联系，英军已向印度方向撤退了。（2）戴笠趁我出国之机，把我管辖的税警团派他的辑私署特务接管了。孙师长言下不胜气愤。其他有的我听不清楚，有的因他们英语流利，我来不及听懂。

林总为了充实莱姆加训练中心的卫生工作力量，又从贵阳训练所调来马安权等人，他本人也去那里视察协助了一段时期。

到七月底，林总和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代表郑宝南一同，从加尔各答回来。他俩去丁江机场向美空军主管要求给以方便，让我们搭乘去昆明的飞机回国。料想不到次日清早就有架满载炮弹的大型运输机要去国内，主管军官问：“你们敢不敢冒险？”回答是“OK”！林总从机场回来，立即吩咐我整理好东西，要我一同回国。回到宿舍，吴所长、张世恩等同志都祝我一路平安！我太兴奋了，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林总和郑代表乘一辆卡车来到军官宿舍，装上简单行李及吴所长、张世恩等送行人员后，疾驶丁江机场，一架运输机已准备好随时起飞。几分钟后，我们三人向

送行者告别登机。机仓内装满了大炮弹箱，我们就坐在炮弹箱上相视一笑。在将要飞到密支那上空时，忽听高射炮乱射，我们的飞机也尽量升高。好在我们是独机飞行，日军大概认为不值得派战斗机攻击。过了一会儿，领航员在前窗口喊话：“过了云南驿，快到昆明了！”我们起身相互握手祝贺脱险。不多时，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派来张菊苓和一辆红十字车接我们。我们被接送到泰和街太和酒店开了两个房间。当天下午，林总去黑林铺谒见江南兵站总监陈劲节将军汇报工作，我随行作补充翻译。辞别时，陈总监关照，重庆方面有电讯嘱转告林先生即日飞渝述职，当面交给买好了的飞机票。回到太和酒店，林总交办了一些事：（1）去见红十字会总会理事王晓籟，要回他路过贵阳时向红十字会总队部借用的小轿车（林总用的）；（2）带上他的行李速回贵阳。

三天后才从王理事那里要回了车子，司机是上海人张某。八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们起程，临行时，一位消息灵通的原总队部老同事沈经农搭便车，和我作伴回贵阳。到达图云关时，已是万家灯火。我到总队部见到了还在办公的总务股主任张祖棻。我谈了经过情形后，就派工友把林总的行李搬上山交老胡保管，我也带了我的行李上山和久别的妻子儿女团聚。一个才岁半的小儿子天真地拉着我的衣角，笑嘻嘻地似曾相识的叫了我一声“爸爸”。

林可胜教授在抗日战争 期间的卓越功绩

吕运明

林可胜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和教育家，他热爱祖国，不辞辛劳和生命危险，亲自参加救死扶伤，抗日救国，他为了培养生理科学的年轻一代和发展我国的生理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日夜辛劳。我们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爱国和治学精神，继承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

林可胜教授 (Robert R.S.Lim) 祖籍福建，1897年10月25日出生于新加坡，卒于1969年7月8日，享年71岁。

林教授191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2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被聘为讲师，1923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爱丁堡分会会员。1924年他赴美芝加哥大学进修。在著名生理学家卡尔森(Aj Carlson)教授实验室与艾维(A.C.IVY)合作，进行胃液分泌研究，成绩卓著。1925年林教授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主任教授，并为该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执行院长职务。在该院一直工作了12年。在此期间，他奋发图强，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把我国的生理学研究推向世界水平。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肆侵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林教授义愤填膺，奋起抗日。1932年喜峰口战役，他曾带领一支医护队伍前去进行战地救护，深为日寇所忌。1937年“七七

事变”后，林教授爱国心切，毅然只身南下，参加西南大后方的红十字会工作。由于他的国际声誉，得到了国外进步团体和个人以及爱国侨胞的广泛支持。募到大量财物，使得他所领导的救护总队迅速扩大，并在贵阳组织救护总队部以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各大战区设立分支机构。这样救伤和培训工作相配合，在伤员病号恢复健康过程中，医学卫生人员也通过实践得到了医学理论和技术上的提高。

在两大结构下设有汽车运输队、机械修配厂、发电厂、假肢厂、药品器材库及伤病医院。这些大小结构，均安置在图云关的大小山沟内，贵重及危险药品放在山洞内，由专人管理。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林教授在内，都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内，睡着双层铺，铺下为高低不平的泥地，铺顶盖着草席，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床上下小雨。如遇上几日下雨不停。山沟水灌入宿舍。泛滥成灾，生活很不方便。林教授为了救死扶伤，抗日救国，和大家一起艰苦工作，同舟共济，数年如一日，毫无怨言。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太平洋战争接着爆发，港九、广州被日寇入侵，相继沦陷，英军孤军奋战，寡不敌众，伤亡甚重，林教授令第三战区救护队（在闽北）和红十字会运输队，将伤残英军迅速运到图云关治疗和休养。这种国际主义救死扶伤的高尚行为，是我亲眼目睹的。

在此期间，日寇飞机轰炸贵阳城内大十字街，还常来侦察和轰炸图云关伤病院和卫生人员训练所。当时防空洞已建设完成，多数病员已转入洞内，少数未进入山洞的病人遭到日机炸伤，惨不忍睹。事后，林教授收集弹片，制成“元宝”，专人送到国际红十字会，控诉日寇侵华惨无人道的强盗行为。

林教授还是一位教育家，他一向重视人才培养，他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12年间，不但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研究生和进修生。因此，林教授的影响被传播到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学系以及一些研究机构。

林教授的一生是十分杰出的，他是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仁人志士。他的逝世是国际、国内生理界的大损失，引起国内外同仁深切悼念，美国消化生理学家戴文波特教授写了《林可胜》一文来纪念他，发表于 (Biographical Memoirs, 51—281. ~306. 1980 Nat Acad. sci)。

(上接198页)

校毕业，具有临床经验者，故沈阳总医院奉命扩大编制，多增加一组人事（总医院系二组编制），但医护人士，并无缺欠之虑，足见东北虽沦陷已久，人心响往祖国之热情，并未稍减，令人感奋，总医院中医护人事情形最差者，为徐州总医院，其各科主任竟有五个技术科是由陆军军官担任的，经查报，明令纠正后，始改由医师接充。

——原载“传记文学”——

林教授热爱祖国，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在任何战区的红十字会救护物资均按当时当地的需要，积极运送。在西北的救护医疗物资，常向延安八路军地区运送，在东南地区的救护物资向皖南和江北的新四军输送。林先生这种抗日的正义活动，遭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痛恨，他们想尽办法派人到贵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以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强迫所有高级医护人员及教职工必须参加国民党，同时秘密调查和搜捕中共地下党员。

据我记忆，当时在运输总队的章文晋工程师，就在那时秘密离开贵阳。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抗日，实质上是反共，当时就撤去林教授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队长以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职务，并限期要林先生到重庆受审，当时幸有国内一些知名人士竭力保他，得免于难。

1942年初，林先生被调到昆明担任远征军卫生总视察，办公地设在昆明市内大绿水河居民区内。我不久也离开贵阳去昆明协助林先生工作。我们同住在一间不到十八平方米的屋子内。将此屋一隔为两半。一半作为林先生办公兼卧室，另一半为我和司机办公兼卧室，过道上放一小炉子做饭，司机兼任炊事员。林先生就在这极简陋艰苦的环境下，为抗日救国奔波、操劳。

林教授是一位爱国志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他领导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他任该杂志主编，于1927年正式出版。论文撰写以英文为主，附有英文提要。每年出版四期，直至太平洋事变后，方中断出版。该杂志在国际上声誉很高，为国际几种主要科学刊物之一。他一生主要从事消化生理和痛觉生理的研究，并取得成绩。

领导战时救护之林可胜先生

陈 韬

抗战军兴，军政应变，刘瑞恒先生以战时急需，被征出长卫生勤务部，将卫生署、军医署纳入同一组织内，统一指挥，用收人力、物力合一运用之效。盖抗战初兴，人心振奋，国内外医、药、护理爱国志士，热情沸腾，磨拳擦掌等待号召，卫勤部适时成立，因此前来登记听候指派工作者，何止千百人。内中一人后成为军医史上另一位杰出人才，此即生理学家林可胜先生。林氏原籍福建，乃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先生之长子，生于新加坡，就学于英国，乃国际生理学权威。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闻名于欧美。抗战开始前任职于北平协和医院生理系主任，为人富于思想，博学多艺，其能力之强，精力之旺，责任心之重，非常人可比。久居海外，爱国情切。“九·一八”后古北口之役，林氏曾组织协和学生救护队，率队亲赴战地服务，有人才、有装备、有训练、有作业系统、有工作热诚、更有业务之实效。曾于教学时屡举以告学生云：世界各国第一流医生均为军医，服务军中，我国岂可独异，因而为中外人士所敬重。

七七事变后，林氏潜出北平，急趋南京会晤刘部长瑞恒。经漏夜之研商，乃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筹组救护总队部，兼任总队长。规模庞大，计划恢宏，总队部辖九大队八十四队，内分救护队、医疗队（包括外科手术队，内科医疗队）、护理队、X光队、防疫队、及卫生工程队。每队设备齐全，技术人员十五至二十人，以深入战地，辅助

军医救伤医疗为入手，而以协助发展战区防疫保健增强兵力为主题。此一工作目标，因政策之正确伟大，与忠国无私，于林氏六年卸任后，与继任者所更订政策比较，则显而益彰。因更订者竟将救护总队之巨款，在大医院与医护人员集中之重庆，建立一座十分豪华的红十字会总医院，并将医疗队重点，移置于各大都市，服务于空防救护业务。此等措施，外在虽易于表现红会工作成绩，但无形中，实削弱对我忠勇将士及时之救伤医疗防疫保健之机会。其对于维持前方军力损失之大，实非数字所能计者，政策得失，攸关国家命脉，足资殷鉴。

救护总队部所有医、药、护理及医事人员，均系征召国内外素质较高，同奔国难爱国忠义之士。待遇极微，仅足维持单人生活，惟服务热情，气贯山河。其才能之优，绩效之大，精神之振奋，行动之无私，成为风尚。风之所向，足使军民对我卫生人员增高莫大信仰。此一风气之鼓励，对我军医日后发展潜力，加强甚大。林氏思想之纯正，行为之务实，能为中外学术界所推崇者系由于此。此乃林氏参加抗战，对我军医人力辅助，士气振奋，贡献之一。

救护总队之卫生药品器材的经费，端赖国内外平民与忠义之士支援与捐助，其中以美国平民为最多，并由美国医学界人士，组织美国医药援华会，筹划医药装备，热诚支援。此类捐赠随工作成果与表现日有所增。林氏每年必一次或二次携带救护总队工作成果、图表、影片、照片飞往美国，作广泛之报导。总计林氏六年任内，捐款达六千六百万美元。此一数字，今日视之，或不为奇，当抗战时期，实乃一庞大数字。当年政府向美国贷款，一次亦不过一千五百万美元耳，故此一捐赠，对我国家战时医药卫生辅助甚大。内中药

品器材，于救护总队部驻地贵阳图云关，堆积如山，只奎宁丸一项，竟以吨位计，分送各师军医使用。据报有走私流入市场者，乃建议停发。林氏认为不可，并称犯法者，总队部无法制止，但奎宁丸虽走私流入市场，究在吾国境内，其遏止疟疾效果之力量仍在。八年抗战，吾国前后方疟疾未酿成灾，此一观念有以致之。林氏之思想与胸怀，由此可见一斑。此乃林氏参加抗战，对我军医物力辅助的又一贡献。

上海军事转进，南京失守，京沪两地医护人员至汉口者达千人之众，群起声请参加战地工作。卫勤部委托林可胜先生筹设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于长沙，分批予以战时医护防疫训练，并就地编组防疫大队分驻各战区，执行防疫工作，直隶于卫生署。训练所由林可胜任主任，陈韬为大队长兼总务组主任，其他主干，均由救护总队部指导员调兼：计组织组主任由协和毕业攻公共卫生马家骥兼任、护理学组主任由协和护理系毕业攻公共卫生周美玉兼任、内科组由协和毕业攻内科周寿恺兼任、外科组主任由协和毕业攻外科张先林兼任、卫生工程组由美国北卡州大学毕业专攻卫生工程的过祖源兼任，师资整齐，均系一时才俊，有实习场、有示范室，教学认真，纪律严明，精诚团结，气势如虹，在在都是兴旺形象，此一形象日后形成“图云关精神”。

抗战日深，伤患益增，后方医院亦日形拥挤，设备既简陋，人力更不足，中外人士颇有烦言。蒋委员长于使团方面，得悉林氏成就，因手令其兼事军医训练，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遂增加军医班，并更名为内政部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联合训练所。不久长沙大火，转迁湖南祁阳，再迁桂林，终迁贵阳荒山中之图云关。为适应军事需要，又改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专训军医官兵，计有看护士兵班、军

医尉级班、军医高级班及军医分期教育班。因需大量教学人员，外科组增聘同济毕业留德骨科屠开元、协和毕业汪凯熙为高级教官；内科组增聘辽宁医学院毕业湘雅医学院内科主任吴执中兼内科教官；放射科聘请救护总队医务股长协和毕业攻X光及物理学科荣独山兼任主任、钱家骥及顾菊珍为教官；预防医学组聘请协和公共卫生科容启荣、香港大学公共卫生科施正信分任主任及高级教官；护理组增聘协和护理系龚棣珍、齐鲁护理系孙秀德分任高级教官；卫生工程组改聘哈佛及交通大学毕业卫生工程师刘永懋及倪世槐分任主任及高级教官；生理组聘协和毕业攻生理者柳安昌任主任；生物学组聘康乃尔毕业林绍文、协和进修之梁序穆、许织云与沪江之王申望为主任及各级教官；化学组聘协和李冠华为主任；检验组聘华西之陈文贵及协和之林飞卿为主任及高级教官；卫生勤务组聘徐步安为主任、马安议为高级教官，所有师资人才乃日趋严整，为国内医药界所重视。为便于战区军医训练起见，乃于陕西褒城设第一分所，由严智钟先生任主任，二年后因车伤，调陈韬继任，另于浙江上饶设第二分所，由湘雅毕业刘经邦任主任；继于贵州黔江、湖北老河口、湖南东安分设四、三、五分所，由协和毕业彭达谋、马家骥、同济毕业林竟成分任主任。各分所处均驻有红会救护总队之大队部，师资与设备均可交互协助，故各分所医护教官十分健全。以第一分所为例：外科、内科、骨科、眼科则由协和毕业之万福恩、汤泽光、袁印光、潘作新分任主任，而辽宁医学院毕业外科孙大光、马志千、支永振为高级教官，内科孙文正、杨枫为内科高级教官、谢景奎为内科教官，护理部主任以曾任协和医院护士李秉芳担任，清华毕业曾任北平卫生局第四科科长卫生工程师王树芳为卫生工程组组长，

工程师陈贻谋为教官。有关教学人员，各分所相似。例如四分所外科范乐成、内科朱文思，均系协和毕业而学术有造诣者。所以摘要叙述其姓氏学历，因这些人士，抗战期间，激于爱国热情，及响应林可胜氏之号召，不问待遇，不计处境，尽忠职守，热心服务，均成为军医界日后教学与临床领导人士，对部队军医自有其莫大贡献；而对军医医疗临床之成就，深为军民所赞誉，其声誉日隆，亦赖此批人士之真才实学有以致之。故知其详不得不述其实，以启来日之追思。

训练所教学内容，除四年分期教育班次，按正规医专分期施教外，其他各班次，均以各科规程 (Standing Order) 为依据。已完成之规程计有内科规程、外科规程、护理规程、环境卫生规程。所有规程，系经由各科专家十余人，针对战时及战地医治军民伤患所常需，受训学员能负荷者，细心研讨，列举必要之诊视或规定及处理程序与方法，写成后再经各科增删，译成英文，经林氏亲自审核，再译成中文付印，前后用时一年。此项规定编订，万分谨慎，一切应乎事实，适合短期训练者接受，其绩效甚高，不愧为专家智慧之大成。例如发高烧者：1. 禁即服退烧剂；2. 取血片；3. 送附近医疗队检验；4. 送灭虱站沐浴灭虱；5. 听候医疗队医师指示处理。战时因体虱传染之斑疹伤寒，及回归热死亡率与传染率均甚低者，乃实效之一。战时部队之饮水消毒、深浅坑厕所、爪哇氏厕所、互沐浴站、十字焚火炉、砖砌焚火炉，成为传播术语，部队中防止流行病的实施，使传染病得获相当控制，亦应归功于环境卫生规程教导之效。

抗战时期，部队激增，各医疗单位亦随之日增，军医学校毕业同学，以及其他医学院校参加军医工作者，与实际需要数量相差甚远，大部分医疗卫生工作，仍赖短期训练之军

医充任之，故训练所连同五个分所共训练将近两万人，泰半服务于前方，深入各部队，具有图云关旺盛服务精神，再配合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医务队技术支援，形成一种新生力量。而林氏又以救护总队长及训练所主任，双重职责与地位，每月必以大部分时间巡视各战区，亲自督导，就地解决问题，跋涉于深山丛林与前方无路区中，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各受部队长尊敬而更获得多方支助。此乃林氏参加抗战，对我军医战地医务，实地贡献最显著者。

林氏作上述贡献时，正其声望与成就日高，而救护总队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驻在地荒山上之图云关，在二山中之坡地，均已陆续建筑成群，有救护总队队本部，有训练所，有办公室，有教室，有示范场，有陆军医院（实习医院），有卫材库，有汽车修理厂（救护车二千余辆）有义肢工厂，有自用电台。规模庞大，竟惊动敌机数度来袭，而组织、物资与经费，更吸引了野心人之企图。林氏遂不得不因谤，在万人萦怀心情中，辞去红十字会总干事及亲自创造之救护总队，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亦委托严智钟先生代理。而林氏遂远去昆明，就任远征军军医总视察。林氏虽退出其所手创之救护总队部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两处庞大事业，但其爱国之热情及贡献国家之雄心，并未稍减。军医总视察，在一般衡量，本是一时休闲安置，无力量足以发挥作为。林氏则不然，以其最高智慧与耐力，又构成一新局面，使远征军之军医，成为深山丛林中忠勇将士健康之保障，防蚊防疟之先驱。林氏首先推荐协和医学院毕业少壮有为薛荫奎医师，任远征军军医处处长，并成立第六训练所于昆明，组织远征军军作业，贯输服务精神，并征调协和毕业杨文达、外科汪凯熙、李庆杰、交通大学戴根法及李新民卫生工程师前往赞

助，不久即成为远征军卫生中心，为远征军军医带来一股新气象，中外将领无不称赞。而林氏之科学、哲学、医学根基纯厚，其思想、其见地。其气质，更为英美人士所推崇。贤者多助，故林总视察，在远征军内声望日隆。远征军抵达印度时，印度总督郊迎四十里，所迎接者非其他人士，乃军医总视察也，总视察何许人，乃国际生理学权威英国皇家科学院士林可胜博士也。联军之推崇，导致国内之重视，任总视察未及一年，即被蒋委员长调升为军医署长，主掌全国军医事业。

林氏以一介平民，激于爱国热忱，赤手组织庞大救护总队，号召众多国内外医护人士，捐入大量经费与卫材，参加战地辅助军方救护工作，继而组织战时卫生人员训练，加强战时军医力量，再由参加远征军出长军医事宜，由其经历，由其贡献，由其声望，军政双方暨最高统帅，均予重视与支助。而前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大部响应林氏之号召来自国外华侨从事义务服务。林氏去后，因政策之改变，该队效忠国家人士，多返回侨居地，原属于国内之人士，亦有部分星散于民间。林氏就任署长后消息传出，大部又归来，而军医界平添一批学术精湛、服务热情来自海外及民间之医护人员。此批人士，后多成为军医教学及各总医院各科主持人员，使我军医学学术水准日增，声誉日升，而社会地位日高，为政必须得人，由林氏足以证之。

军医人力，逐渐增强，而医药卫生器材，由林氏策划，亦得美方大力支援，战时军医业务日有改进。林氏初步计划，以加强战区医疗中心为首务，以医疗中心为战区军医训练医疗作业。卫材供应总枢纽。先于各战区训练分所所在地分别设立总医院，由分所人力支助，使人力、物力得以相互为用。重庆

首都所在地，由卢致德署长任内，已设立重庆总医院外，另于贵阳训练总所所在地，成立贵阳总医院，由协和毕业杨文达任院长。继而于汉中城固第一分所所在地成立第三个总医院名汉中总医院，由一分所主任陈韬兼任院长。原拟继续成立其他战区总医院，因胜利而中止，改由以“剿总”或行辕驻在地继续成立。计有中央南京首都总医院，筹划成立时，院长由二分所主任刘经邦担任，嗣由军医学校二分校主任景凌霄接任。东北区沈阳设沈阳总医院，由一分所主任兼汉中总医院院长陈韬调任。西北区西安调汉中总医院改称西安总医院由副院长辽宁医院毕业刚时升任。华北区设北平总医院，由二分所主任刘经邦调任。重庆总医院原由同济医学院毕业林竞成担任，因留美进修医院管理，继由原任一分所骨科主任协和毕业袁印光担任。贵阳总医院改由原任救护总队部总务股长浙江医专毕业张祖棻调任。上海总医院由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王士成出任。青岛总医院由浙江医专毕业王维调任。广州总医院由留德张勇斌调任。台湾台北总医院调五分所副主任同济大学医科毕业吴国兴升任。华中区于徐州设徐州总医院。总医院中，沈阳总医院原址系日本关东军一级陆军医院，规模颇大，建筑宏伟。有自用之发电所与水厂，日用煤炭，夏季每日三十吨，冬季每日五十吨，病床一五〇〇张，设备齐全，接收后仍保完整，堪称一流医院，由陈韬任院长，因陈氏系辽宁医学院毕业，因得辽宁医学院人力、物力之支助甚大，而东北医科院较多，医师人数多于内地，久被日人压迫，爱国心切，军医待遇虽低，但应征者，均以服务军医为荣。计沈阳总医院医师百余人，护士三百余人（另佐护若干人）除辽宁医学院毕业占半数外，其余亦均系其他院

（下转189页）

回忆周寿恺主任

杨锡寿

周寿恺主任（福建省思明县人1901年生），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医学博士，1946—1948年留学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在内科学领域内，基础渊博，擅长内分泌学，对科学管理、人才使用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当时人们都称他S.K.Chow、或简呼S.K）。他一生为人，艰苦朴素，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工作认真。他的精力充沛，愉快热情，特别是身体健康（五十来岁的人，从贵阳到上海，从未见他穿过棉衣）。但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患急性阑尾炎未能得到及时合理治疗，在广州逝世。

周主任毕业协和医学院，即在协和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及主治医师。抗日战争时期，随其老师林可胜博士来到贵阳图云关工作多年。当时他是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兼贵阳陆军医院内科主任，同时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内科学指导员，时才36岁。

1946年初，周主任又随同林可胜博士去上海创办国防医学院，任该院内科主任教授（少将军医监）。上海解放前夕，曾随林可胜博士去台湾（国防医学院迁台），不久即返回大陆厦门。解放后去广州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岭医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成立中山医学院，周寿恺任学院副院长。

我随周寿恺主任前后（从贵阳到上海）共四个年头，特别是上海国防医学院时，我担任内科住院总医师与周主任朝

夕相处，接受其作风的熏陶，对医学教育，感受良深。这里将能记忆的几件事回忆记述如下：

周寿恺主任管理下的内科工作（包括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及上海江湾上海总医院两个时期的综述）：

（一）教学查房。周主任必须亲自主持，每周一次，决不可少。病例由住院总医师预先选定，住院医师报告病历，主治医师讲解诊疗经过，并系统阐述发病机理及治疗原则，然后由其他主治医师提问补充，主任总结。这种查房方式，既达到教学目的，又可以突击检查各级医师的工作和学识水平。同时对病人也能明确诊断，决定治疗方案，特别是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学习的重要形式。

（二）病历讨论会。每月上旬举行，讨论上月全部出院病历，由住院总医师作出全面总结，计出各项基本指标，提出有特殊教学意义的病案或在诊疗工作中存在问题的病案进行讨论。这是一场严谨的业务检讨会，一般需要半天时间。它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1）学习特殊病案的经验；（2）总结一个月的成绩和缺点；（3）开展业务工作上面对面的批评和讨论；（4）主任可以全面了解一个月的工作和各级人员的业务水平。周主任十分重视这种会议，每次都亲自主持。

（三）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而且铁定在星期三夜晚七点至九点。在贵阳图云关时，读书会就在他办公家中举行。当时住院医师集体伙食欠佳，周夫人就亲手做新鲜蛋糕招待。周主任主持会议，报告的题目一般先期由周主任指定（主治医师以上可自选题）。主讲人必须广泛收集国内外有关文献，进行翻译综述，其他人可提问或补充，周主任本人同样参加论讲。这种读书会既亲切又严肃，可以经常提高医学基

础和明确新的概念。

(四) 临床病理讨论会 (C. P. C)。每月一次，内科主办，通知全院各科参加。选择死亡后尸检的病历，或内科诊断不明后经手术证实的病例，开展临床分析和病理讨论。周主任亲自主持，多由主治医师以上人员发言。这样的讨论会，对住院医师提高很大，取得的经验既实用又具体。当时周主任认为，争取疑难病例死亡后尸检及临床病例讨论会的深入，是衡量和促进一个医院临床诊疗水平提高的最好方法。

(五) 不定期查房。常规每天上午查房，是主治医师严肃的责任。周主任每天上午根据住院总医师的汇报，抽查重危病人及疑难病例。主任查房，主治医师及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必须都陪同前往。这种不定期的突击抽查，实际也是对各级医师的考核。在这种情况下，住院医师必须保持每份病历完整，熟悉每个病人情况。主治医师也不敢不按时查病房，对病人的诊断治疗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在周主任的影响下，全科各病房的早晚查房制度坚持得十分严格。

(六) 严格规章制度。贵阳陆军医院的内科，写成文字的规章制度并不多，上述的五条就是铁定的制度，也是检查制度的方法。在当时不是把条文贴在墙上，而是周主任以身作则，坚持制度。主治医师也跟主任一样，严格要求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很少发现有不遵守制度的现象。偶有发现，主治医师就即时纠正。如果被周主任发现，就连主治医师一道受批评。因此，所谓制度也就是常规必须按时完成的工作，如：

(1) 病历书写。所有新入院的病历，包括三大常规，必须在次日上午主治医师查房前完成，重危病人每天或随时都进行记录。每个住院医师一般管10—12张病床，不管一天，

入院几个新病人，也不管有几个危病人，完成病历及进行记录，是不能拖延和打折扣的。

(2) 住院医师每晚必须巡视其所管病床的病情变化，住院总医师巡查各个病房，了解全科病情，同时指导重病治疗。次日上午八时，周主任上班时，住院总医师必须向他汇报全科重点病人情况，及科内发生的行政，和人员工作情况。

(3) 住院医师星期六夜晚与其他夜晚一样，必须巡视病人。星期天上午十时前，必须在病房工作。任何时间离开病房必须向护士长或值班护士说明去处和时间。周主任同样在星期天要来突击巡视病房。

(4) 各种业务活动和会议，全科人员必须准时参加，中途不准离开。周主任以身作则，我跟随他几年。从未见到过有人无故不参加会议。

(5) 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实行二十四小时负责制，并轮流负责门诊部急诊值班。

(七) 对患者一视同仁。不管是在贵阳图云关上，还是在上海江湾总医院，对待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只要是病情需要，周主任在诊断治疗服务上，都要求一视同仁。他告诫我们说，医生对病人是职业关系，要讲究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诊断治疗不容许有半点差错或拖延，以病情为主，不因职位而别。记得在图云关时，不论是中国士兵或美国官员，住进医院就一样对待。在上海江湾时，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住院（病房是上级指定的别墅式小楼），蒋介石亲自过问，指定周主任负责医疗。周主任派主治医师丁农（此人已去台湾）主治，派我协助管床。周主任吩咐我们看病要穿白大衣，戴口罩，以示与他是职业性接触。周主任定时查房，在他眼里总长与士兵都是病人，诊断治疗按原则办事，服务态度基

本一致。

因为上海总医院是当时国内最高级的军医院，国民党的将领、大官经常来检查看病，一般周主任并不亲自出马，最多指定住院总医师去对付，尽可能按一般门诊病人对待。只不过将官以上人员，上面规定在时间上给予照顾。记得当时来找周主任看病又转到我手上处理的，就有何应钦、李玉堂、柏文蔚、黄伯韬、胡魁等人，都是兵团级以上人员（中將以上）。除何应钦是当时的军政部长，由国防医学院副院长卢致德亲自陪同来找周主任外，其余都按门诊挂号，提前诊断，周主任不容有更多特殊。事实上，在贵阳图云关及上海江湾，几个单位的领导人都是林可胜博士。林可胜完全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爱国知名教授，是国际上著名的专家。他本人就是（中將）军医总监。因此国民党的一切官员，在他眼里也只是一个病人来求医。在他手下的人，都承袭了他的作风。周寿恺主任就是林博士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周主任也是这种人，只知道抗战，事业、学问、工作。周主任是我们当时年青人可敬的老师。

（八）选拔人才，大公无私。周主任在培养人、教育人、使用人、引进人、辞退人这些事务中，我都没有察觉有任何私人成分，更谈不上“开后门”。就凭他日常在工作中深入了解，对他下属的医务人员的好坏取得第一手亲自观察到的印象，来公正处理人事问题。在当时（包括图云关、上海江湾）医院各科用人的权力，完全在科主任手上，医院领导不过问。在内科也就是周主任与陶桓乐主任（现任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关于陶主任的医疗作风，我也准备另文介绍）共同商量，通过主治医师会议决定，即报由医院任、免、升、留。每年七月内科人事稍有更迭，包括各级医师的去留，住院总医

师的更迭、提拔，实习医师的考核等。在我亲身所见、亲自办理的过程中，没有听说也没有经手过有求情、送礼、请客等现象。业务好的就留、就提，业务差的就降、就走，也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和不愉快的麻烦。当然我说的也是只我亲自见到在林可胜博士领导下，周寿恺主任的用人方式。也就是说他以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专业家，在人事工作上的作风是无私的。

总之，我在周主任身边工作几年，朝夕相处，但每次与他接触谈话，就感到有一种敬仰、严肃、亲切、紧张的情绪，一见面就谈工作、谈学习，而且冷不防地向我提问，还不时地到我的住房观察我的生活。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谈完工作后，在他的实验台上，有一块马蹄磁铁。他用一张厚纸放在磁铁上，然后撒上铁砂，形成一个放射形的磁场，他猛不防的提问：What is this? 我立即回答说：Magnetized field(磁场)。他满意了。问题虽不难，但来得很突然。这样的提问，周主任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随时会像考小孩一样向你突击。内容包括医疗方面、常识方面、生活方面的他本人学识比较渊博，生活丰富，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小市民气息。记得1948年国民党政府也实行过夏时制，周主任就要问“夏时制有什么意义”，当时确也难得回答完满。周主任告诉大家说这是“Day life severing”。这三个字就包含有珍惜时间、节约用电，提倡早起、增进工作效率等。周主任是一个令人见而起敬的学者。我这里只讲他对人、处事、管理科室、培养和珍惜人才的部分，没有涉及到他的学术成就方面。

编 后

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为了纪念和表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国际援华医疗队，卫训所等医护单位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我们特编辑出版这一专辑。

当年，在贵阳图云关，群山环抱中，大后方的医疗救护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等单位就座落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内外华侨）医学界的专家学者，苏联、英国、波兰等八个国家组成的援华医疗队在这荒芜空旷的山间，渡过艰难的岁月，作了大量有益于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工作。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得到医疗和护理；世界各地援华的成吨医药物资经过这里源源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向各个战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等单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书征编过程中，许多当年在红会救护总队工作的同志给了我们热情的支持，特别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沈新路同志、中华医学会施正信教授、同济医科大学林竟成教授，他们热情赐稿，翻译资料，提供线索和图片，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